

五七丛书

五七疑雲

——破解反右派运动密码

申淵 著

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作者：申 淵

編輯：岳仁泉

發行人：武宜三

出版社：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地址：6H,Blk 12,Ph.1,Kingswood Villas,HongKong

電話：852-95733657

電郵：wuys099@gmail.com

出版社牌照號碼：39763663-000-09-08-3

香港總經銷：香港田園書屋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56號二樓

電話：852-23858031

傳真：852-27702484

<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

臺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2-82275988ext166

傳真：886-2-82275989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10年7月

國際書號：ISBN 978-988-1880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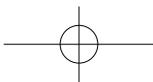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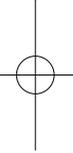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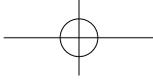
定價：HKD 90元

TWD 36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五七學社出版公司調換。

釐
清
真
相

還
原
歷
史



目 录

序言	7
反右運動若干統計數字	13
一、紅色恐怖史	17
二、中國共產黨的封建主義性質	28
三、反右和六四同出一轍	38
四、劊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錯位	49
——邓小平、彭真为什么反对为右派平反？	
五、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的哼哈二將	63
——柯庆施和李井泉	
六、中國右派知多少？	74
七、反右運動與清黨	83
——中共建国后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党内斗争	
八、反右運動中的反地方主義 和地方民族主義鬥爭	106
九、軍隊裏的反右派運動	123
十、民主黨派中的第五縱隊—中共特別黨員	139
十一、宗教界和少數民族的反右派運動	155
十二、誰奪走了他們的青春？	173
——大中小學生中的反右運動	

十三、慘遭處決的右派份子	188
十四、被迫自殺的右派份子	206
十五、為右派量身度造的勞動教養制度	244
十六、中共搞運動的手法	254
十七、挽回反右運動的歷史追憶	271
十八、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紀念活動花絮	283
十九、早期海歸派的命運	288
——三錢的故事	
二十、三代黨內右派縱論中共內鬥	299
二十一、轉型正義和右派平反索賠	321
追記	334
附錄 資料來源與參考書目	336

序 言

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發佈的建國六十周年宣傳大綱中，依舊將反右運動和餓死數千萬人的大躍進列為偉大成就加以宣耀，而對於文革浩劫和六四屠城則閉口不提，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以及一九八九則是兩段空白的歷史。中宣部宣傳大綱充分反映了中共對於歷史事件採用封殺打壓和欺騙說謊的兩手政策。這兩手政策應該承認是行之有效的。大陸上的中國人已經不知道五十多年前的反右派運動為何物；餓死數千萬人的政治災害借禍於天災，冠以『自然』二字，美其名曰『自然災害』或蘇修逼債。中共偉大、光榮、正確（偉光正），永遠不會犯錯誤。光榮永遠屬於自己，錯誤永遠歸咎別人。這便是中共獨裁專制的蠻橫辯證法。

不久以前，德國主流影視媒體開闢了《普通人寫歷史》節目，題目叫《讓我們一起寫德國歷史》。發動普通老百姓以普通人的身份寫出自己的『歷史見證』。德國許多城市的街頭巷尾出現了一些《故事屋》，一般祇有十平方米，裏面有一張工作臺、二把椅子和一套錄音錄像設備。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裏錄下自己所見證的歷史，並可以帶走錄制的 CD 或光盤。精彩的内容會在電視或電臺中播出。在納粹鐵蹄下生活過的年近九十老人赫爾曼講述一個德國家庭的歷史，記述

序言

他父親和幾位叔叔一個個怎麼變為兇殘的納粹黨徒。他的一位叔叔舉報了一位具有一半猶太血統的好朋友，慘遭納粹殺害。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學生說，這樣寫出來的歷史要比歷史學家編寫的歷史真實得多了。

戴過右派份子帽子的著名翻譯家董樂山翻譯的《第三帝國興亡—納粹德國史》的句首，引用了桑塔亞納的名言：『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一個人如此，一個政黨或一個國家更其如此。中共歷代統治者用種種合法與非法手段，堵住知情者及其後人的嘴筆，讓人們忘記歷史真相。今天更用經濟表面繁榮掩蓋醜惡的過去，以一俊遮百醜。

試看今日大陸封殺媒體互聯網、祇許報喜不許報憂、打擊異見、告密舉報、陽謀詭計、封殺媒體、截取電郵、竊聽電話、窺探隱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而言之，五十多年前的階級鬥爭手段，今天仍然橫行不法，暢通無阻。所不同的是，擁有了現代化的技術手段，竊聽封殺居然從大陸境內擴展到全世界每個角落。

一個承認並正視自己錯誤的民族才是偉大的民族。德國人正視自己的錯誤，堂堂正正地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因此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諒解和尊重。前蘇聯和東歐集團掩飾和堅持錯誤，終於受到歷史的懲罰。昨天的蘇聯是今天的中國，難道我們不該記取這個前車之鑒引以為戒嗎？

恩格斯曾經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個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看來中國共產黨早已忘記了自己老祖宗的教誨了。

五七受害者、歷史學家謝韜曾說：『科學的發展觀必須是建立在科學的歷史觀上，沒有正確的歷史觀就不可能有科

學的歷史。所以，總結、反思歷史是我們中國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務。』中國大陸已步入權貴資本主義的後極權時代。統治者維持極權統治的方法是用欺騙和封殺的手段，繼續維護毛澤東這座神龕，讓人們頂禮膜拜。因此必須麻痹人民的思想意識，讓人民忘掉過去，或者錯誤地認識過去。

『釐清真相，還原歷史』是研究一九五七——五八年發生在中國大陸所謂反右派運動的五七史的主要目的。由於中共統治集團篡改、偽造、封殺、歪曲歷史，使浩瀚的五七史僅僅揭開了冰山之一角。在中共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份子中，已為人們知曉的不到大約一千人。

中共視為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把質量和數量看成是辯證統一體。質量建立在數量的基礎上，沒有數量難以構成質量。五十五萬多個案決定了反右派運動的性質。五十五萬多名官方認定的右派份子中，99.99%屬於錯劃，全國只剩下九十六名搞『對』的，未改正者祇有0.0018%鄧小平何以得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結論呢？

時至今日，人們對反右派運動還存在很多根本性的疑問，有待深入發掘。諸如：

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真實意圖何在？

反右僅僅是整肅知識份子嗎？

引蛇出洞的陽謀僅僅用在反右派嗎？

諱莫如深的中共黨內高層反右派真相如何？毛澤東為何把地下黨出身的高幹列為反右派運動的重點？

中共黨內和軍內挖出多少右派份子？

軍隊反右重點是什麼？

序言

毛澤東為何把反對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列入反右派運動？

為什麼中共特別黨員在民主黨派和宗教界的反右運動中起第五縱隊的作用？

告密文化是黨文化嗎？

為什麼說勞動教養是為右派份子量身度造的？

中共搞階級鬥爭採用什麼手法？

反右和六四有何關聯？

反右派運動究竟整肅了多少人，五十五萬多，一百三十萬還是三百萬？

年齡最小的右派祇有十二歲，中、小學生中有右派份子嗎？

現在尚有多少活着的右派？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現狀如何？

中共為什麼在官方文件中仍稱五七受難者為『前右派份子』、『涉右份子』？他們目前仍舊是中共的專政對象嗎？中共為什麼堅持不為右派平反？

大陸右派的平反索賠工作，大陸和臺灣的轉型正義如何對比？

筆者編著的四卷本《五七右派列傳》敘述了具有代表性的一千三百十八名右派的個案。在近八年的搜集資料過程中，逐漸發現這些案例所披露的實情，已遠遠超出了官方和民間對反右派運動的認知範圍。上述疑問便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和形成的。有了問題必然會去尋求答案。筆者在二〇〇七年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前後，在港臺報刊和互聯網陸續發表了一些文章，試圖表述筆者某些與眾不同觀點。《五七疑雲》

將這些文章修改補充後，輯錄成集。各章節既有獨立性，又有連貫性。冀求拋磚引玉，集裘成衣，期引起各方注意，深入探索反右派運動奧秘。

中共今天繼續打壓封殺大陸幸存的五七右派弱勢群體，涉右書刊一律查禁。最近北京查封了右派自費出版的《往事微痕》；各地禁止前右派聚餐；嚴禁前右派出境赴國外或港澳臺參加學術紀念活動。凡此種種，充分證明強大的中共國家機器何等懼怕貧病交迫、風燭殘年、根本構不成威脅的前右派群體。中共患上了歷史恐懼癥。

其根本原因還是害怕暴露真相。人類反抗暴政的歷史，就是記憶戰勝遺忘的過程。大陸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統治者因為心中有鬼，不願說或不敢說，而且也不准受害者開口。中國歷史為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所忌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歷代統治者一貫採用愚民政策，作為馭民的手段。中共亦不例外。

『成則為王，敗則為寇』。歷史為勝利者所擁有，當然也為勝利者所書寫。中共的一黨專政建立在欺騙和謊言的基礎上，為了維護極權統治，將歷史當作面團，隨自己的需要任意捏弄。反右派運動便是中共力圖掩飾和篡改的一段歷史史實。中共將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篡改成爲一部斷代史和朦朧史。

五七史研究工作者的艱苦任務便是要釐清真相，還原歷史，把統治者別有用心地顛倒、篡改、偽造、塵封的歷史，重新恢復原貌。這個任務不僅限於五七反右派運動，而且還應該包括被中共顛倒、篡改、偽造、塵封的全部歷史。當歷史恢復真相之時，也就是專制獨裁政權垮臺之日。

序言

《五七疑雲》縱向評述和剖析反右派運動的若干疑點。
《五七右派列傳》則主要橫向敘述了一千三百十八位右派個案。因此這二套（本）書亦可視作相輔相成的姊妹篇。本書各章節是在三年時間內分別寫成的，引用資料可能略有重覆之處，尚請讀者鑒諒。

2010年7月10日



毛泽东观看大字报



交通部批斗章伯钧



1957年毛泽东检阅国庆游行中的

反右标语



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反右领导人邓小平和彭真分列毛泽东左右手。

反右運動若干統計數字

一，全國

1957 年小教以上知识份子总数：5500000 多人；

官定右派总数：552877 人；

包括内控右派、中右、反社份子总数：1300000 人以上；

其中党员 200000 余人，行政 13 级以上高干 285 案，省部级 110 人，29 个集团性案件。

军队 30000 余人（含党团员）。

民主党派 9000 多人，民盟 5173 人，佔民盟总数 15.6%；上海民盟 1500 多人，划右 605 人，佔 1/3；

少数民族 5000 多人，右派兼地方民族主义份子 1500 多人。

二，部分省市

北京市 右派 68000 多人（包括中央机关、军直总部、民主党派中央）；

上海市 右派 55000 多人，佔官定右派总数 1/10，上海人口佔全国 1/80；

天津市 右派 5410 人，中右 8000 多人；

四川省 右派 50000 多人，中右 50000 多人，各种反社、

反右运动若干统计数字

坏份子 400000 多人；饿死 812 万，佔全省人口 11%；

甘肃省 右派 54000 多人，佔全国 1/10；人口 1200 万，佔全国 1/50；

广东省 右派 36808 人，其中右派兼地方主义份子 1/3；

河南省 右派 70869 人，佔全国官定右派总数 15%，党内右派 23000 人，佔全省右派 15%；信阳地区右派 8696 人；

云南省 右派 10731 人，中右 10000 多人；昆明市右派 1820 人，中右 4000 多人；滇东北 11 县县级及以下党员干部 2000 多人；

安徽省 右派 31472 人，反社会主义份子 7500 多人；

吉林省 右派 9000 多人；

福建省 右派 7100 多人，中右 4584 人；

内蒙古 右派 3731 人；

浙江省 右派 13563 人；

山东省 济南市右派 2894 人，青岛市 4608 人；

广西僮族自治区 右派 14304 人；

全国劳动教养右派 150000 余人，佔官定右派总数 1/3-1/4。

三，部分學校

全国大学生总数 820000 人，右派 40000 多人，中右 40000 多人，佔大学生总数 11%；

北京大学 8000 多人，右派 716 人；中右 700 多人，佔大学生总数 15% 强；物理系右派学生 155 人，佔学生右派总数 8.9%，教工 2.8%；枪毙九人（一人死缓死于狱中）；

清华大学 右派学生 571 人；

西南师范学院大学生 4000 多人，右派 800 多人，佔学生总数 18%；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师生右派 157 人，佔全院总数 16%，其中学员 12%，讲师以上 37%；

上海交大大学生 4000 多人，右派 330 人，佔学生总数 7%；

北京地质学院大学生 8000 多人，右派 407 人，中右 400 多人，佔学生总数 10%；

兰州大学 师生右派 195 人，佔全校人数 8.1%；学生右派 127 人，佔学生 7.01%；

山东大学 右派 149 人；

华东师范大学 右派 285 人；

广东师范学院右派 216 人；

武汉大学 右派 430 人；

吉林师范大学 右派 700 多人；

东北财经大学 右派 126 人；

中山大学 右派 193 人；

山西大学 右派 157 人；

重庆建筑工学院 右派 119 人；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薛尚实以下 2/3 党委委员划右派；

四川省五八届高中毕业生 10000 多人，划三、四类（右、中右）3200 人，佔毕业生总数 1/3；成都市高中毕业生 2657 人，三、四类 585 人，佔 22%；

上海电力专科学校（中专）37 名右派，未成年学生 12 人，3 人自杀。

反右运动若干统计数字

四，右派年龄

全国最小右派 四川达县十二岁小学五年级生张克锦
(1946-)，劳动教养7年；

全国最老右派 1，宁夏吴德正大阿訇(1851-1959)，
划右时107岁；

2，江西永修真如寺住持释虚云大师(1840-1959)，
划右时118岁。

一、紅色恐怖簡史

紅色恐怖自何時始

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始於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國共分裂，國民政府開始清黨，中共在白區損失 98%，中共幾無立錐之地，黨內精神接近崩潰。中共按照蘇聯和第三國際指令，為清理門戶，仿照 KGB 模式，成立中共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簡稱特科或紅隊。其任務是用血腥手段清除中共內部的叛徒、特務、動搖變節份子，殺人如麻。紅色恐怖起源於國共分裂和黨內鬥爭。從此階級鬥爭及由此而生的紅色恐怖貫穿於中共全部歷史。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隊隊長顧順章在武漢投向國民政府，周恩來、康生把他全家老小八口人滿門抄斬，連保姆和嬰兒一起滅口。中共用借刀殺人、出賣同志的方法來對付黨內反對派和不同政見者。中央領導何孟雄、羅章龍、王克全不同意六屆四中全會決議，另立中央非常委員會，對抗周恩來、王明。周恩來把情報出賣給國府，將三十多名黨內不同政見者一網打盡，包括左翼五作家柔石、殷夫、白莽、胡也頻、李偉森、馮鏗。事後周恩來找羅章龍談話，羅正色道：『是你們出賣了他們。』王克全指着周恩來鼻子潑口大罵：『你周恩來是赤佬，出賣同志。』

红色恐怖简史

毛泽东上井冈山，学习《水浒传》中晁盖火拼王伦的办法，诱杀农民领袖王佐、袁文才，鹊巢鸠占，佔山为王。毛泽东开始杀人了。在上井冈山以前，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定了湖南农村的『痞子运动』，为红色恐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共掌权以前，重大的红色恐怖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主要有：中央苏区富田屠杀 AB 团事件；鄂豫皖苏区大规模捕杀干部、将领；陕甘宁边区暗杀刘志丹和地方党干部；消灭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延安抢救运动。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发生的富田事变是毛泽东大规模杀人的开始。毛认定江西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内有 AB 团份子（Anti-Bolshevik）。AB 团原来是早已不存在的国民党内仅七八人的小派别。毛泽东借口清除内奸，消灭异己，争夺党内领导权。逮捕处决省苏维埃全部人员一百二十多人和红二十军副排级以上干部七百多人，除二



槍斃犯人



槍斃女囚犯



一名即將被處決的女青年

人外全被杀，士兵闻之哗变，毛泽东派人镇压。洪湖西红三军肃反杀了一万多人。此后，全国各苏区掀起肃反高潮，滥杀无辜党员和军官。处决七万多 AB 团、二万多改组派、六千二百多社会党。自一九二七至三六年中共将根据地设置在江西省时期，江西省的人口自二千多万骤减为一千多万人。

红军长征到达川陕地区，由出发时的近十万人，被毛泽

东一路折腾只剩下一万多名精疲力竭、衣衫褴褛的伤弱病残。而在四川由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有十万多人，兵强马壮。张国焘北大出身，资历、地位均在毛泽东之上。陕甘宁边区的刘志丹的地方势力也比毛泽东的残兵败将强得多。毛泽东设计用告密陷害、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等卑劣手法，瓦解了西路军，即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有 1/5 的官兵被打成 AB 团，主力四个师共十二个团的干部全部被杀。只剩下王树声等几个人。毛泽东把西路军逼向国军和地方军阀设下的重围，借刀杀人。张国焘被迫出走，彭德怀、李先念、徐向前等投向毛泽东。

对付刘志丹的地方势力，先用肃反削弱他们，刘志丹本人也遭逮捕审查，受尽酷刑。毛泽东假惺惺出面做好人，放出刘志丹。刘在 frontline 背后中弹牺牲。毛泽东重演井冈山佔山

红色恐怖简史

为王的历史，控制了陕甘宁边区。

一九三七年红军败退延安，毛泽东在延安立足未稳，他首先要巩固自己的领导权，清除王明、周恩来等异己派别。

当时有十万不明真相的抗日热血青年竞相奔赴延安。毛泽东借口这些人鱼龙混杂、成份不纯，发动了整风抢救运动，



驗明已處決犯人的正身

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和『整风领导小组』。仅中央党校二千五百人中，就揪出特务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人。抢救运动中，枪杀八十多人，受刑讯逼供后开除党籍六万—八万人。然后进入党内高层的整风，排斥异己。与以后反右文革的手法一样，运动由下而上、由外及里最后触及问题核心，解决领导权问题。无辜群众作垫脚石，为树立毛泽东专制独裁统治做牺牲品。逼供信由此开始。

中共掌權後的紅色恐怖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夺取政权后，中共运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作为武器，红色恐怖一浪高过一浪，文化大革命把中华民族推向覆没的边缘。自中共执政至二十世纪末五十年中，中国大陆非自然正常死亡人数据不



鎮反中逮捕的「反革命份子」

同版本估计，约为七千五百万人左右。

旨在发动农民参军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有三千万地主富农被剥夺土地，其中二百多万未经法律程序被杀。约一亿地主富农家属子女打入另册，沦为政治贱民。而不久之后的农业合作

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又把农民的土地夺了回去。

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中共先后派志愿军入朝一百二十万人次。战死三十多万，冻死饿死三十多万，共计死亡七十多万。美军仅阵亡五万四千二百四十六人。志愿军被俘二万八千人，一万四千多人志愿赴台，六千六百多人经绝食坚决要求回国。回国后大多数人以叛国投敌罪沦



朝鮮戰場被俘志願軍

为叛徒或历史反革命份子。

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五三年十一月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动道会门(例如圣母军、一贯道)运动,杀、关、管



古寧頭戰役被俘共軍集中管理

三百万,消灭各种反革命份子二百四十万人,毛泽东自称杀了七十万。他在此一时期下达的文件指示中,一片杀声,充满血腥味:『再杀一批』、『处决一大批』、『要大杀几批』、『应当放手杀几批』。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

一九五一年『开国第一冤案』—武训传批判运动、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一九五六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运动都死了不少人。期间还发生了『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反马寅初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事件。

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创『以言论治罪』。接踵而至的『肃清一切反革命份子运动』,有四百多万人受到审查。其严重的扩大化随即平反,反右中又推翻,受害者划为右派,如此反覆折腾。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运动,官方认定划右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上内控右派、中右

份子、坏份子共计一百三十余万（工农不划右，工农中的右派称为坏份子）。受株连的亲戚朋友、上下属逾几百万人。大批右派倒毙在劳改营和劳教营。与反右同时进行的清党运动，清洗了大批中共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

在反右补课和清党的同时，又进行了中共建国后的第四次肃清反革命份子运动。



人民公社大鍋飯



造成大饑荒的三面紅旗

反右运动的后果之一是中国大地盛行阿谀奉承、欺天罔地的浮夸之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导致全国大饥荒。二〇〇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档案，在一定范围内作有限的解封。解封

红色恐怖简史

材料披露：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区饿死五百二十二万人，其中城市九万五千八百人；

一九六〇年，全国二十八个省区饿死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其中城市二百七十二万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饿死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其中城市二百一十一万七千余人；

一九六二年，全国饿死七百五十一万八千人，城市一百零柒万八千人。

据中共体制内辛子陵上校著的《千秋功罪，红太阳的殒落》一书中指出，四年总共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历代发生的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自然灾害，总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人。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中共统治中国四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二千一百二十九年死亡人数总和。

期间尚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几十万；批判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高岗、刘建彤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文化大革命使红色恐怖臻至极点

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拉开序幕。历时十年的浩劫又由以下无数小运动组成。

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发动

红卫兵扫四旧，打砸抢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抄家一千万户以上，打死和自杀人数在二十万以上，伤残近百万。历史文物，文化古迹几乎破坏殆尽。

二，全国大中学生大串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赤脚医生运动，造成全国生产瘫痪，全国八千万青年涌向农村，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三，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清理对象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或九类份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任何造反派和群众组织不经法律程序，均可用群众专政、隔离审查、关牛棚的方法，任意逮捕关押和拷打审查怀疑对象与无辜群众，有五十多万人死於清队。毛泽东说：『好人斗好人，误会。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好人，光荣』。

四，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开始便严重扩大化，中共首创『以思想治罪』。大批枪杀政治犯和思想犯，总共死伤四十余万。

五，自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发生八大红色恐怖事件：

1，一九六七年清除『五一六』份子和『联动』份子运动，矛头针对走资派的高干子弟和不听指挥的造反派头头，关押审查数万人。

2，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北京『大兴县大屠杀』，杀死五类份子三百二十五人，其中二十二户满门抄斩。

3，一九六七年青海省『二二六』事件，青海『八一八』造反派屠杀一百六十九人。

4，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内蒙古『内人党大血案』，

红色恐怖简史

中共党员、干部、农牧民、知识份子被杀五万人，三十四万人遭逼、供、信打伤至残，总共打击数百万人，占内蒙古人口 1/5。

5，一九六七年八至十月湖南省『道县大屠杀』，五类份子及其家属被杀近万人。

6，一九六八年七至八月广西『宾阳惨案』，五类份子及二十三种人被杀四千余人，二百多户灭门。

7，一九六八年七至八月广西『四二二』惨案，不同观点造反派被杀近十万人。

8，一九七五年春，云南省沙甸『伊斯兰共和国』冤案，回族村民被杀一千余人。

此外还有『九一一』林彪外逃事件，一九七二年的野营拉练，一九七四年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孔批周运动，一个运动紧接一个运动，红色恐怖一浪高似一浪。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国民经济损失达八千多亿。在十年文革期间，立案审查受迫害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 17.5%，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占总数 75%，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76%，中央军委副主席 86%，全国三届人大副委员长 70%，副总理 87%，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省委书记 75%。批斗迫害一亿人，占全国人口 1/9。』叶剑英的估计是大大缩水的，真实死亡人数远高于二千万。

文革后的大屠杀发生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和镇压法轮功。因这两件事的死亡伤残人数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有待历史见证。

毛泽东一心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热衷於『革命输出』。中共的红色恐怖随同『革命』一起『输出』。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九三〇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丑剧，致使四百五十万华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及其家属亲友遭到镇压，五十多万人被杀。印度尼西亚华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柬埔寨人口八百万，有二百万柬埔寨人和华侨被中共眷养的波尔波特的『红色高棉』虐杀。华侨逃到中共使馆求救，中共外交官居然置之不理。

纵观中共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和专制暴戾的历史，是一部杀人如麻、血迹班班的红色恐怖史。其根源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封建法西斯属性所决定。

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接见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六位发明人中的唯一美籍华人朱传渠博士（1919-），他的夫人荣智珍是中国最大民族资本家荣氏家属的成员。朱先生回忆道，邓小平一见到他就说：『朱先生呀，你看这怎么好呀，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犯了罪呀！对不起人民呀，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人民一旦知道了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就会起来推翻我们。』

2009年2月16日

二、中國共產黨的封建主義性質

二〇〇八年岁末年初，中共隆重而高调地纪念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扬声中，我们可以听到从北京发出的体制内另一种声音。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写的批判中共党内封建主义性质的文章，便是这种声音的代表。他颇有感触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马上就要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话要说，纪念那些最有感触、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他认为最有感触、最有意义的事情，莫非是鞭挞中国共产党内根深蒂固的封建法西斯流毒。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如是說

中共太子党领军人物、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中共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近年来发表了好几篇令人瞩目的文章。《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和《忆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华国锋》已为人们熟知。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一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近作《叶剑英谈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文中，把他的思想观点借叶剑英之口，借故喻今，点出中共的封建法西斯性质这一重要主题，並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胡德平凭借其特

殊地位，在以上三篇文章中，善於运用中共党内元老的话，包装自己的思想观点，为他所用。

胡德平在文中说：『第一个正确指出四人帮社会阶级本质的中央领导人是叶剑英。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份子」。』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词中第一次披露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所造成的灾难性损失的详细统计数据。四人帮的台前幕后指挥是毛泽东，批判四人帮即批毛。胡德平虽然没有点出毛泽东的名字，但是不必点明，明眼人一看就心中有数了。

他的这一篇文章之所以令人瞩目，不仅是因为他是胡耀邦的大公子，

而且他是在职的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的有份量人物。《北京日报》在胡文的按语中说：

『一九七八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



胡耀邦接見劉賓雁

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叶帅在这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强调克服封建主义是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篇（指胡文）应该很好回顾、学习、纪念的重要文献。』

在文中，胡德平开门见山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一个

中国共产党的封建主义性质

错误，就是把自己、把无产阶级专政概括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毛泽东这个自我吹嘘的比喻里，马克思不过是件漂亮外衣，秦始皇才是实质内涵。事实上，应该说希特勒加秦始皇才更确切。希特勒加秦始皇就是封建法西斯。

他借叶剑英之口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对这样一个社会，不但需要革命——武器的批判，同时还要文化——批判的武器。批判的武器之一，就



岷江上的女纤夫

是欧洲启蒙主义创导的自由、民主、人权。资产阶级要利用，社会主义也不能排斥。但在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封建生产关系，并对从孔夫子

一直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文化作出全面科学总结之时，绝不能把封建社会形成的皇权至上的专制制度、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君父观念的伦理纲常、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人身依附的宗法关系的次生形态，移入当代社会，移入共产党内。』谁能有权把封建主义移入当代社会，移入共产党内？自然非毛泽东莫属。

中共脱胎於封建社會

胡德平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经历了两千多

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此外还有二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和中国人的思想长期禁锢在封建礼教中，得不到民主与法制的启蒙教育，也是封建主义植根在中共党内的原因。

随便给党内反对派扣上『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顶帽子和动不动给不同政见者按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做法，给人以『成王败寇』的感觉。『这



批鬥彭德懷

种情况非一朝一夕所致，自一九五七年反右以来，一直如此。』胡德文借四人帮之口，不无讽刺地问道：『今日之中国才是资本主义呢！谁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谁在和美帝国主义开展经贸合作，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算不算资本家？』

胡德平对民主和法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消灭了社会上的等级现象，社会主义民主应在此基础上逐步消灭阶级。在这方面，我党既有补课任务，又有开拓前进的历史责任。』他又一次借用叶剑英的口说：『只有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

的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他进一步阐述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他说：『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在国家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民主、自由，都有行使自己民主自由的权利。任何民主都有其公开、透明、公平的程序。这些程序都要和法律相配套。』他的看法与《〇八宪章》中所指出的『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他说得比较委婉而已。

笔锋一转，胡德平指向了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三十年后的现状。他借中共党内另一位元老李维汉的话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用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流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

对于全国人大体制，胡德平借用叶剑英说的十二个字来评价：『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屍位素餐。』他直言不讳地说：『说起来也怪，一九五四年第一部宪法诞生之前，我国倒是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婚姻法》。宪法出来以后，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民法》、《刑法》等重要法律，却一直没有制定出来，更遑论什么《物权法》了。』

胡德平分析了当前的社会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党在肃清封建主义遗毒，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如在不少人的头脑中，还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颠倒了群众和公仆的关系，人治重于法治；对人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的意识还远

远没有到位；很多地方存在的人身依附、官本位、以权谋私等现象並未得到有效遏制；以言代法、执法不公、选择性办案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仍有相当的市场。这些老问题应抓紧时间解决，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新时期的众多课题又不断扑面而来，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何产生许多惊人的权贵资本？对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团结、引导、帮助、教育？就说三农问题吧，现在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社会课题。城乡二元结构，工农利益的巨大反差是什么问题，说严重点就是社会等级问题。』社会等级就是产生权贵阶级和贫富差距的根由。

由於胡德平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局限性，有些话往往不能说透，也不便说透。譬如中国共产党的封建主义属性，暨是土特产，又是舶来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和卢布革命带来了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本来就带有封建法西斯性质。俄文中布尔什维克是多数派的意思，相对於少数派孟什维克。中央集权、群众运动、个人崇拜、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原装进口货，恰好与毛泽东『朕即国家』的封建皇权思想土洋结合，一拍即合。中国民风未开的愚昧土壤便成为其潺生繁殖的温床。

胡德平曾提到『进口货』民主集中制，但点到即止，没有展开。所谓民主集中制的三大原则『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是毛泽东封建集权思想的高度概括。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不时抡起民主集中制的三根大棒，以权代法、以势压人、镇压異己、封杀媒体和不同声音、破坏民族政策、压制地方利益，造成贫富不均、社会严重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在政治体制上有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封建主义性质

区别，有什么进步呢？追逆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也源出於此。

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蹒跚而行的跛脚老人，背负一付沉重的封建法西斯十字架，踟躕在一条迷茫的路上。他那条支撑经济的大腿貌似健康，而那条政治改革之腿却已经完全瘫痪掉了。历史上，德国铁血宰相卑斯麦、斯大林、希特勒都



批鬥資本家

有过在专制政体下，片面发展经济的少数成功先例。然而他们的最终结局人人皆知。

毛澤東的神龕

毛泽东的神龕是封建主义的象征。清除中共党内封建主义流毒，必须搬走毛泽东神龕。什么时候从天安门城楼摘下毛像、什么时候毛头在百元人民币上消失、什么时候毛屍滚出天安门广场纪念堂，便是中共改变封建法西斯性质之时。

一九八〇年胡锦涛在甘肃省建委副主任任上，在中央党校青训班学习，认识了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的胡德平。胡德平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系。两胡是中央党校同

班同学，很快成为知己。胡德平曾带胡锦涛去过自己家中几次，与胡耀邦谈过话。胡耀邦对胡锦涛有过知遇之恩，曾带他去考察江西共青城。之后，胡锦涛很快登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宝座，便一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

一九九三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墓。他在墓前佇立良久，突然高声呼叫：『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二〇〇五年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胡锦涛本来准备隆重纪念。不料遇到中共元老们的反对。只能由曾庆红出面，低调进行纪念活动。

由於这一层关系，可知胡德平的背景硬朗，这也是他敢於发出不同声音的原因之一。胡德平曾经被誉为中共第一太子党，颇有乃父的思想作风，向来以大胆敢言著称。一九八四年他参与创办武汉出版宣扬思想解放的刊物《青年论坛》，並亲自为创刊号撰文《为自由鸣炮》。六四前后亦遭到过整肃。

最早指出中共封建主義屬性的人

最早指出中共封建主义性质並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的是划为右派份子的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1908-1964），浙江宁波人。他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在担任浙江省长期间，遭到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打击报复，诬陷他搞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反对民主集中制。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公然支持江华搞独裁。毛泽东说：『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毛泽东又说：『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

中国共产党的封建主义性质

对反对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该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他以浙江省为例，向到会的书记提出问题：『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

沙文汉在划为右派份子后，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从行政六级降为十二级。赶出原住所，监视居住。他在不断写检讨书之余，作为一名民主斗士，决定寻找中共党内乃至中国社会生活不正常的原因。他决定从『死人的政治』着手，从源头找起。研究中国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各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与成因。

自一九五九年起，沙文汉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制度，查找大量历史资料，於一九六三年夏完成八万多字的《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通过不容置疑的史实，在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胆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封建主义属性问题。

他论证道，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君主的。他指出中国私有制的特点，主要是氏族或『国族』所有制，即以国家的名义拥有一切。这种发展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只形成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即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现代社会的主体。

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必定是『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延续至今的特点。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一切政治现象都与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环境不可分割。中国封闭的、家族式农耕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特殊现象。

沙文汉从更深层面上认识和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在传统上一贯实行专制和皇权统治；为什么中华民族偏向保守，极易表现出对上盲目服从和皇权神圣的忠君奴性；为什么历代统治者总可以用『集中』、『统一』为由压制民主、排斥异己，实行独裁统治？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也包括他自己为什么会深深陷入这场政治运动的原因。

一九六三年底，他五十六岁英年早逝。病中作诗舒怀：

莫說沉痾久未愈，但看形影日枯衰。
孤燈夜永油將盡，老馬路遙力不支。
夢裏少年猶意氣，望中功業豈狂癡。
人生得失毋需計，畢竟事成總可期！

中国共产党七千八百多万党员並非鐵板一块，毛泽东早就引用陈独秀的话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其百怪』。进入胡锦涛的第三代领导时代，中共党内和体制内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而且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他们完全清楚，封建主义歹毒在中共党内一天不清除，目前的跛足改革便难以为继，和谐社会只有依靠欺骗谎言与暴力镇压才能勉强维持下去。一旦体制内的民主派或有识之士集结起来，而且同体制外的基层群体相结合，必将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垮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的堤坝。

2009年1月8日

三、反右和六四同出一轍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国一代伟人赵紫阳与世长辞。赵紫阳原名赵修业，河南省滑县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八年二月加入中共。长期从事地下党和地方游击队活动。曾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九四五年后任中共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后随军南下，建立桐柏解放区。中共建政后历任广东省、中南地区、四川省党政领导工作。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七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一九八七年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夕，被中共十大元老用非法手段赶下台，从此长期遭到软禁，直至逝世。

国人惋惜他没有留下遗嘱或回忆录，将睿智的远见卓识留传后人。读罢在赵紫阳逝世二周年纪念日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掩卷而思，十分感谢宗凤鸣先生和香港开放出版社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将赵紫阳的思想遗产留传於世。

纪念反右五十周年，《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便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便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与三十三年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学生爱国运动，其起因和根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中

共及其历代统治者均视以知识份子为核心的中产阶级为洪水猛兽，採取封杀剿灭政策，以巩固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反右壓倒初生的中產知識階層

从反右到六四，足足跨越了三十三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曾出现文革十年大倒退的断层。其间邓小平几起几落，沉浮於中国诡秘的官场宦海。他被毛泽东捧为接替刘少奇的接班人在先，邓、林争宠於后，林（彪）上邓（小平）下。邓小平被毛泽东打翻在地，列为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式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文革后期他被迫写出检讨保证『永不翻案』，又被毛泽东重新启用。

毛泽东把中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阶级敌人渊源已久。日本学者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与中共出版《毛选》，逐一进行对照，发现《毛选》动过大手术，比较原文，作了大量修改。一九二五年



趙紫陽六四前夕探望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共向来捧为《圣经》。但在《毛选》中刊登的文章，作过大量修改，删节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出版的《革

反右和六四同出一辙

命》半月刊、一九二六年《中国农民》二月号和一九二六年《中国青年》三月号以及以后陆续出版的单行本上的这么一段话：

『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毛泽东在原文中将以下之社会群体列为『中产阶级』：
『高等知识份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人。这个阶级的慾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

毛泽东把这一类知识份子分为左翼和右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份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

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原文的结束语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当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在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作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其政治生涯开始，就对中国知识份子有很深的成见，把中产阶级看成『革命的对象』。

由於在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和日本，需要团结除他们以外的所有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延安时期必须与国民党争夺知识份子，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说法才略有变化。一九三九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知识份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可是说法虽然改变了，对知识份子的仇视和迫害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和紧接着的『抢救运动』使大批投奔中共的知识份子惨遭打击，『抢救』出一万五千名『特务』。甚至连『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

毛泽东一贯仇视中产阶级的立场没有显露出来，并不说明他对知识份子属性的认识有了转变。待到即将夺取政

反右和六四同出一辙

权，毛泽东便准备转移斗争矛头了。早在『七大』的报告中，他指示全党『开国以后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即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邓小平紧跟毛泽东，执行仇视知识份子的政策，在南京解放后大整以知识份子为主的地下党就是明证。他诬蔑地下党中有两条心、半条心和一条心的人。在南京市二千多名地下党员中，揪出近四百人遭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取消候补期等各种处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由毛、邓共谋，联手压制了刚刚抬头的中产阶级。一九八九年六四学运，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挥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动用坦克碾压了中产阶级与中华民族的希望。毛、邓二人强烈的专制皇权思想承袭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中华民族习惯於皇权统治，任何时代人们都盼望能够出现一位具有威望的开明皇帝来统治自己。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三百三十一位皇帝的统



六四擋坦克的勇士

治史。照理说，溥仪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位末代皇帝。

然而事实说明，中共第一、二代领导人毛、邓才是中国真正的末代皇帝。中共第三、四代接班人江、胡虽有毛、邓的愿望和野心，却不具备毛、邓的威严和帝王气概。自古迄今皇位的争夺都是鲜血淋漓的。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直至毛泽东、邓小平，哪一个朝代不是如此充满血腥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起，直至反右、文革、六四，以知识份子为核心的中产阶级始终都是历代统治阶级用以排除异己、巩固皇权、君临天下的整肅对象，同时又是利用对象。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赵紫阳和宗凤鸣对此有一段对话：『由於长期的封建统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君、臣、父、子，伦常礼教形成的依附性、奴隶性；再加上党强调「驯服工具论」，使人的个人价值，个人自主权，个性的发挥统统被扼杀。』

这种皇权思想和帝王意识並非完全出自毛、邓的个人意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固然对他们有强烈的影响。然而更重要的是由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所决定。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赵紫阳在谈话中曾批评列宁的『领袖专政论』。他说：『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党是代表人民的；但是在我国的实践中，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却自以为「我就是代表党」，反对我就是「反党」、「反人民」。』

赵又说：『形成这种意识的来源，还是渊源於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但这套「领导人就是党」的学说是由列宁所创立的，並不

反右和六四同出一轍

是马克思。我就是代表社会主义；反我就是反党，就是反人民，就是反社会主义。从而使主要领导人及领袖走向个人专政。』

赵紫阳在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明确地指出：『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巩固一党专政。』一九五七年初毛泽东刚刚提出双百方针，便在一份《情况汇报》上杀气腾腾地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是不是共产党该下台了？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六四打壓了剛崛起的中產階級

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赵紫阳用切身感受，以十分坚定的口吻说：『邓在政治上坚决走的是党的领导权要集中，决不能分权，这一点是丝毫不能改变的，也绝不能动摇的。』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赵紫阳在谈到六四定性时说了这么一段话：『但我在去朝鲜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提出要向常委汇报，声称情况严重。常委会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正是人们所说的谎报军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来，说学生要搞全国性的大串联，要求建立组织，说大势不好。我去朝鲜以前在北京，他们不跟我讲，也同意学潮实际上在平息的判断。他们在常委会上却又把情况说得特别严重。李鹏主持会议，他作总结：「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第二天他们去邓那里汇报，邓一向对学生闹事游行反感，他听李鹏一讲，觉得问题严重，就发表了这样的断言：「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一场动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这个『四二五』讲话后，李鹏立即通知各单位传达，接着又发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激起四月二十七日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把矛盾激化了。



六四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

反右和六四有其历史的相似性，毛泽东和邓小平也有个人独裁的相似性。赵紫阳说邓小平『反对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反对毛泽东当「太上皇」，但又把自己摆上了「太上皇」的位置，实行「垂帘听政」。』一九九三年九月五日赵紫阳又说，『老一代的思维方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就认为要颠覆我们。这样一来，本来不是对抗性的就搞成对抗性了。有的人把学生的话收集起来，往这儿送，往那儿送。往邓小平那里送，说矛头指向邓了，把邓激怒了。』

邓和毛的个性十分相似，那就是『直率和倔强』（赵紫阳语）。邓说过：『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邓和毛一样，说话又带很大的随意性。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富的是自家人，高干子弟。

毛、邓的一九五七年反右和邓在一九八九年镇压学运，从根源上分析，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实质上都是中产阶级。赵

反右和六四同出一辙

紫阳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三日明确地说：『一个社会如果形不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广大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针对中国的社会现状，赵又说『……这种畸形发展的市场经济，加大社会分配不公，走向两极分化，不能形成广大的中间阶层。』、『只有形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有了大批企业家，有了大量经营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类专家，这样，才可以稳定……否则，两极对立的社会是稳定不了的。』赵紫阳的这番话十分精辟地指出了中国社会不稳定和不和谐的症结所在。

中国历代统治者把镇压有头脑有思想而又耿直敢言的知识份子，也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作为巩固政权的首要举措。中共第一代掌门人毛泽东精通『资治通鉴』和帝王驾驭之术，从根据地虐杀『AB团』、延安整风开始，历经知识份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胡风以言论治罪、反右文革和文革中的一打三反以思想治罪；第二代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六四镇压学运；第三代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和把资产



批鬥右派分子

阶级自由化思潮
『消灭於萌芽』
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四代胡锦涛提倡向朝鲜古巴学习镇压异己、建立『和谐社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连

绵不断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全是用来制服知识份子和中产阶级的，致使中国社会畸形发展成为两极分化的宝塔结构。而现代发达国家的标志，是拥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使整个社会结构呈稳定的橄榄形。

赵紫阳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东欧、苏联和中国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那种社会实践说明，在落后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胜利后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赵紫阳认为：『在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并不具备，更谈不上成熟；硬要建立社会主义，必然会畸形发展，使社会主义变形……这就必然采取强硬手段，实行高压政策，甚至不惜动用镇压的办法，这就必然要强调专政，强化统治，搞个人独裁和制造个人迷信；同时对不同政见者予以批评或镇压，而斯大林和毛主席个人就这样走向了悲剧。』

缺少资本主义和历代统治者对知识阶层采取封杀打压政策，使中国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从而人民无法安定团结，达不到和谐社会。这就是赵紫阳在软禁中留传於世人的真知灼见。

中和谐社会的稳定基础是依靠强大的专政机器及其拥有的军队和维稳力量，打压和封杀软弱的中产阶级与弱势群体。而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靠的是强大的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佔人口比例近 80%；德国佔 62%；欧洲、日本、澳洲均佔 60% 左右；香港亦有 30% 以上的中产阶级。中共官方吹嘘号称中国已拥有 20% 的中产阶级，实际上仅有 7%。中国社会结构呈宝塔形，欧美发达国家呈二头小、中间大的

反右和六四同出一辙

橄榄形或菱形。

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经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完全证实了赵紫阳的历史预见。今天中国的 GDP 已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可是人均 GDP 排在一百多位，不如一些非洲贫穷落后国家。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宛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一方面是少数权贵阶层疯狂进行掠夺。0.47% 的人口占有全国 70% 的财富，一百七十九家国企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而另一方面 70% 以上人口只拥有 10% 的财富。中共宣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已达人口 20%，这个大大充满水份的百分比拥有多少社会财富呢？中国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从反右到六四』打压初生的中产阶级所带给我们品尝的苦果。

2007 年 2 月 20 日
修改於 2010 年 3 月

四、劊子手和法官在反 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錯位

——鄧小平彭真爲什麼反對右派平反？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场历史浩劫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账上，有人甚至臆测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帮兇。殊不知阳谋的真正帮兇是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分别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说是帮兇便宜了他们，邓、彭两人参与策划並具体领导了这场浩劫，紧跟毛的『战略部署』，亦步亦趋。邓、彭两人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阳谋』第二、第三号劊子手，因此也是元兇。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相知相識

先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係说起。毛、邓两人的关係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邓小平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毛泽东当时为中央候补委员，追随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到武汉。毛、邓共同参加八七会

刽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错位

议时初次相识，却无任何交往。

他们第二次相遇於江西苏区。毛受到王明路线打击失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受到批判。邓小平受牵连。中央苏区开展反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邓小平被撤职，妻子金维映改嫁李维汉，后生子李铁映。毛、邓也仅见一面而已。

在周恩来、李富春的保护下，邓小平仅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便被释放，贬到乐安县南林区当巡视员。不久恢复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参加长征和途中的遵义会议。此时毛、邓同时出现转机，毛逐渐重返权力中心，邓结束坐冷板凳。这一段往事便是两人嗣后结成政治联盟的历史渊源。

中共建国初期，邓小平历任二野政委、中原局书记、淮海战役前敌总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等要职。毛对他的评价是『人才难得，独立性强』。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毛将邓及其全家自成都用专机调来北京，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和财经委副主任，在周恩来外



毛澤東與鄧小平

出时主持国务院工作。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任中央军委委员（毛、邓两人均无军衔）。一九五五年四月四

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在反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的『新税制风波』、『高饶反党集团』事件等党内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紧跟毛泽东，因而脱颖而出。在高、饶败落、周恩来遍体鳞伤、刘少奇动摇接班人地位的诡异时刻，毛泽东暗中选定邓小平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毛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七届七中三次会议上说了一大段话，为邓小平评功摆好。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为邓小平那样，为一名他的下属说尽好话，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赞扬邓小平『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等等。

毛澤東欲立鄧小平接替劉少奇

邓小平在五十年代政治权争中，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接着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在毛泽东的策划下，邓小平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权力都集中到书记处。建立了党、政、军一元化的权力中心。邓小平做了五件深得毛欢心的大事：

- 一，毛不担任国家主席；
- 二，邓代表中央起草中央文件，仅邓一人可代表毛批文件，将刘、周凉在一边；
- 三，助毛推出『纸老虎』理论；
- 四，周的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归书记处；
- 五，笔指挥枪，军队归书记处领导。

叶剑英在一九五七年说：『除毛泽东外，邓小平虽然没

刽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错位

有元帅军衔，但他是帅中之帅，是元帅的领班。』邓在短短的三年里坐上直升机，连跳三级，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取代刘少奇的接班人。毛泽东的盘算並沒有明确表露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反右运动后期。

一九五七年底毛泽东访苏期间，向赫鲁晓夫通报自己将不担任国家主席。赫鲁晓夫便问有人接替你吗？毛泽东评论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朱德。说刘的长处是原则性强，短处是不够灵活；周是个老好人，喜欢和稀泥；朱年事太高，不能指望他办大事。唯有邓小平，『既有原则，又灵活。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欣赏之意溢於言表。

反右运动是邓小平仕途的里程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自诩为『大跃进』的『统帅』，邓小平为『副统帅』，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邓的接班人地位似已被毛确认。毛认为邓在思想上最忠诚，在政治上最可靠，在行动上最得力，跟得最紧。

毛澤東的前敵總指揮

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双百方针。但是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对此一言不发，没有表态。毛泽东转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这便是有名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主张强硬，不赞成鸣放。一九五七年二月，当毛泽东主张继续放手进行鸣放时，邓小平早已按捺不住，摩拳擦掌，准备反击了。

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於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關於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即引蛇出洞）阶段，反击右派（即定罪）阶段，

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接着他态度十分强硬地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罚和镇压的方法。』这便是毛泽东夸奖他的『原则性』。

『引蛇出洞』阶段从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至六月八日毛、邓决定在全国『反击右派份子猖狂进攻』。《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在经过长期的酝酿准备之后，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用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形式颁发的，标志反右运动的开始。继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领导下，成为全国反右运动的总指挥部，邓小平是这场运动的『前敌总指挥』。五月一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二日经邓小平授意和批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四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

在北京，自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毛、邓、彭部署下，举行了四十多次座谈会，二百多人发言，整理见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日夜研究，用简报方式向毛泽东汇报。五月中旬，根据各地大鸣大放的情况，毛泽东觉得应当收网了，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起初题目叫作《走向反面》，拟在《人民日报》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排出清样后，邓看了觉得过於露骨，建议毛在右上角批上『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样。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

刽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错位

为《中央政治研究室》，仅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毛欣然接受。充分证明毛是十分重视邓的意见的。邓亦敢於向毛提出不同看法。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於五月十五日。早在五月十四日，邓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重申了『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后算账』的决心。毛在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四日前，邓小平和书记处密切配合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使毛泽东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初步胜利。据《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介绍，毛泽东在五月十四日以前没有召开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议。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有参与此事。由此可以断定，『引蛇出洞』的重大决策完全由毛泽东和邓小平二人决定，书记处执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和邓在反右中的重要地位由此清晰可见。

六月六日，书记处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报告；七月十七日邓小平在青岛举行的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作了主题报告，对全国的反右运动做了说明和部署；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整风运动的报告》。在反右运动的各个时期，邓小平几乎每天定期向毛泽

东汇报反右运动进展情况，全面指挥和部署各阶段具体政策的核实和宣佈。反右的各项政策均由邓小平统筹安排下达。

其中，最好的证明是周恩来将所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有关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批『送小平同志审阅后送刘、朱、陈、彭、康、定一核阅』。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主持制订的反右斗争文件，必须先由邓小平审阅，再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批发全党。因为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总指挥，连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反右派问题上也要听从他的指挥。

六月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书记处发出《關於准许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份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邓小平的书记处代表中共中央於六月二十六日发出《關於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指示》。六月二十九日发出《關於争取团结中间份子的指示》，七月七日书记处转吉林省委《關於高等学校反右斗争的情况报告》，八月一日书记处主持发出《關於继续深入反对右派份子的指示》，九月二日书记处又发出《關於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

邓小平领导下的反右指挥部隔三差五地频密发出反右加温和扩大化的指示，唯独没有作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的政策，直到反右高潮过去，才放了『马后炮』。除了在数量上由起初的几千人，扩大到五十五万多人，加上内控使用、开除党团籍的中右份子，打击面达一百三十万。当时知识份子总共不过五百五十多万人。所以反右扩大化不得不算上邓小平的一份『功劳』。邓小平充分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然而与毛泽东思想路线上的一

刽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错位

致性，才是使邓小平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委以反右派运动总指挥重任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出於自身的政治理念，对毛的『阳谋』深刻领会，执行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反右运动是邓与毛在政治领域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合作。邓小平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一再指出『姑息养奸，养痍遗患』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危害性，充分发挥了他刚愎自用，不讲情面的强硬作风。将沙文汉、潘复生、欧百川、王翰、杨思一、陈沂、丁玲、孙作宾、冯雪峰、艾青、秦兆阳这样一批省部级高干定为右派份子，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毛泽东点头的。陈沂被打成右派后，陈毅听闻，感到惊奇和激愤，给总政主任谭政大将打电话。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啪一声搁下电话。陈毅说：『好家伙，人家那样一位重要的领导，我是元帅也奈他何！』原来陈沂的右派也是邓小平批准的，谭政才敢顶撞陈毅。

邓小平对待党内右派、他昔日的战友和同志，表现得『立场』特别坚定，做到了『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一九五七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大力批判所谓的『温情主义』说：『在反右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份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份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邓小平的角色错位

所以在二十年后，当胡耀邦提出给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

时，邓小平敢於说『不』！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说：『我们还改正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案件。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呵！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

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他又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分扩大化了。』邓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回忆道：『父亲始终认为，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对反右的『保留态度』，不能简单地归咎於他刚愎自用，不敢承担错误责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政治理念和统治模式上同毛泽东是一丘之貉，将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看作是对自己统治地位的挑战和进攻。所以抵死不认错，没有丝毫负咎感。天底下的刽子手从来当不好法官！

邓在文革中是受害者，因此他敢於打破禁区，反对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坚持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文革受害者平反。然而反右运动他是领导者，同毛泽东共同策划了『阳谋』，具体执行残酷逼害知识份子的政策。因此当99.99%的右派虽然都划错了，中央和地方仅剩下九十六名时，他依旧坚持『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花岗石脑袋进入棺材，贻笑天下。

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

劊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错位

议上，当谈到刘少奇平反问题时，又『顺便』提起反右派运动。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份子，反右派扩大化我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有勇气』轻描淡写地承认了一下错误，却没有勇气否定和平反。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必要的』、『正确的』判断是何等正确，在中央级九十六名著名右派爱国民主人士中，挑出二十七名最有影响的上层爱国人士，『拟予改正的二十二人』；硬生生地留下五位中央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加上林希翎共六人『不予改正』。『不予改正』的理由是『顽固不化，死不认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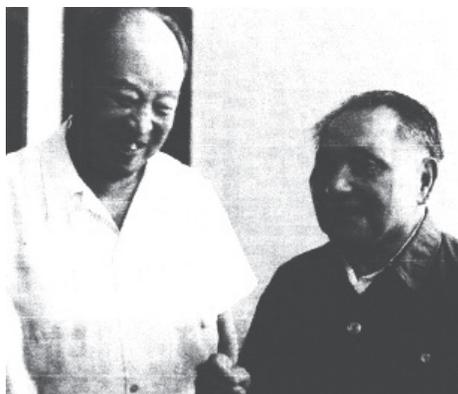
对于反右运动的错误立场，是同他在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镇压六四学运以及只搞经济不搞政改的『跛脚改革』一脉相承的。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赵紫阳在谈到邓小平的两个观点时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认定了的问题不会改变，因此对六四他不可能改变，他的悲剧也成了定局。』六四如此，反右也是如此。

可是邓小平毕竟做贼心虚。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抽掉了他的杰作五七年反右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的有关反右派运动的指导性的文章和文件。如果是『必要的、正确的』，何必要抽掉，见不得人呢！

彭真也是劊子手兼法官

五十年代进入反右时期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高岗、饶

漱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薄一波、邓子恢，一个个失宠的失宠，靠边的靠边，打倒的打倒。剩下没几个毛值得依赖的人了。彭真（1902-1997）原名傅懋恭，山西曲沃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五七年他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长的身份，担任邓小平的副手——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



邓小平與彭真

一职。彭真不负众望，把北京市搞成反右『样板』，全国重灾区。

北京集中了党政军各级机关和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工商联、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早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引蛇出洞』阶段，毛泽东已迫不

及待地早早定下了指标，交给两位前敌总指挥执行。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份子中，右派约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份子中约佔百分之五至十。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於百分之十。』

毛泽东善於把阶级斗争的抽象概念演化为数字指标，邓小平和彭真则把数字指标落实到具体人头。在五百五十多万知识份子中打出一百三十多万右派骨干、极右、右派、中右和内控右派来，邓、彭不折不扣地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信口开河定下的指标。彭真非但是第二号前敌总指挥，而且是天子

刽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错位

脚下的大总管。他在反右派运动中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一九五七年，笔者在北京是才进大学的二十岁学生党员，曾经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先锋队，入队入团入党，在『红旗下』成长，一心一意做『党的驯服工作』。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在毛泽东发佈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反右第一炮前夕，奉大学党委之命同二十多位党员学生同赴北京市委晋见彭真。彭真作了一个鼓动大鸣大放的报告。笔者认真整理了记录，上交党委。反右开始，笔者以团总支书记身份参加系反右领导小组。进入反右补课阶段，系里的党团员右派名额凑不满数，经党支部动员，笔者响应党的『号召』，

凑数成为党内右派和阶级异己份子。至於『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用放镜检查半天，找到的唯一罪证是彭真鼓动鸣放的记录稿，隻字不漏地记录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妙论。在核



文革初被打到的彭真

实笔者罪证时送去『彭办』。彭办退下的批文是：『未经首长本人审核，概不负责。』当年聆听彭真讲话的一批批高校学生全都中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圈套，当上了右派。

彭真把北京市的大学生整得最惨，清华、北大整班整班学生被打成右派或中右。笔者一位同学因高度近视看不清马

林科夫的胖脸而打成右派；某个班级的反右领导小组在研究如何完成右派名额指标时，一位成员因泻肚子离席上厕所而被他人推举为右派。那些思想清纯、天真无邪的热血青年，中了毛、邓、彭『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沦为政治贱民，株连九族，苦苦挣扎了五十多年。幸存者至少已是七十出头的耄耋老人了。难道他们没有资格彻底平反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有幸在党校学习时又一次聆听彭真报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制建设》。讲到五七年反右，他也是『必要的、正确的』谬论的坚持论者，只是比邓小平多加一个『及时的』。笔者望着他佝偻的身影，失去了当年搞『阳谋』时的那份趾高气扬。邓、彭万万想不到十年后文革开始，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也成了毛泽东的刀下之鬼。可悲他们牢牢抱住毛泽东这座瘟神致死不放手，历史是多么无情啊！

彭真是典型的山西汉子，身材高大魁伟。毛泽东一直欣赏和重用彭真，他不止一次地拿彭真的身材开玩笑，说过：『有大个子撑着，天塌下来都不怕。』可是彭真开始失宠於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县团级以上中央干部会议）。他在会议期间曾经议论过毛泽东。他认为不能说毛泽东一贯正确，没有错误。毛泽东这座高山『拿走几吨土还是这么高』。这句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怎能不让毛泽东耿耿於怀。

一九六六年初的文革前夕，他主持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在处理吴晗文章《海瑞罢官》时，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是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被撤销一切职务，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他是文革中第一个揪出来打倒的『彭（真）、罗（瑞卿）、

刽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错位

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头子。他的山西老乡薄一波说：『我的这位老乡，有三位亲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反右五十周年，中共的第三、第四代领导至今不敢碰触邓小平设下的禁区，同样是可悲的。迟早会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2007年6月5日

《議報》對本文所作的加注：美國記者 6.23 華盛頓報導

反右运动究竟有没有必要，究竟是不是错误，其实在这场运动五十年之后，历史已经铸下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答案。只是中国的官方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顺应时代和民意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那段历史予以重写。

『无论就社会稳定和经济实力而言，还是就国际安全环境来说，现在的中国早已走出了毛泽东时代，甚至也超越了邓小平时代，在面对反右这个历史问题时，邓小平时代所遇到的局限，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为了社会的和谐，增强凝聚力，中国有必要对类似的陈年旧账尽早做一个彻底的了结，否则就会继续被套牢。』

五、毛澤東在反右運動 中的哼哈二將

——柯慶施與李井泉

中共建国后，随着作战任务的完成，毛泽东为了安抚各路开国军头，将四大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辖地，加上林彪率四野南下后由高岗主政的东北，改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成立党政军三合一的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各路野战军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等要员论功行赏，便成为六大行政区的封疆大臣。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高（岗）饶（漱石）事件刚一定性，毛泽东为给各路诸侯削权，中共中央便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撤销大区一级党政军机关，各大区行政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一併撤销。反右斗争前夕，又恢复了大区军政委员会建制，改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 --- 中共中央 XX 局，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以加强中央集权和共产党一元化领导。

在反右斗争中，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们不负毛泽东所望，将全国最富庶的四大行政区的反右运动搞得天翻地覆，党内党外鸦雀无声，听任毛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哼哈二将

泽东发动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他们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彭真，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彭真在《刽子手和法官在反右和改正中的角色错位》、陶铸在《反右清党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已有介绍。本文主要剥开柯庆施和李井泉在反右运动中的丑恶画皮。因为他们反右有功，所以在随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两人连同谭震林，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柯庆施——毛泽东的好学生

上海的反右运动是由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领导的。人们尊称柯庆施为『柯老』，贬称为『柯怪』或『柯大鼻子』，因为在他那七歪八扭的脸上，长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鹰勾鼻字，不太雅观。此人当时深得毛泽东的恩宠，红得发紫。担任中共中央委员（反右后晋升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

据说他是当年曾见到过列宁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一九五〇年七月，石家庄市长柯庆施调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华北局书记聂荣臻联名致电华东局，电称：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早年，柯庆施更有不良纪录。一九三三年中央派他去满洲省委执行任务，

途中畏惧敌情开小差脱逃，谎称已去。延安整风结论中说：『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並欺骗组织的错误。』

这个人善於投机钻营。看准方向，仕途扶摇直上。二年后升任中共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四年陈毅调往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嗣后又兼任外交部长，柯庆施立即接替陈毅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后为华东局）、上海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柯怪左得出奇。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讨论个人崇拜问题时，他语惊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



柯慶施陪同毛澤東在上海看大字報

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个马屁拍得正中毛泽东下怀，心中乐得甜滋滋。原来他是接过周佛海当年吹捧蒋介石的话为他所用。难怪年长他九岁的毛泽东要尊称他为『柯老』。说话当年毛泽东六十五岁，柯庆施五十六岁。

柯庆施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一九五七年四月初在杭州同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嗅出了

毛泽东的『阳谋』诡计。回到上海，在上海地区积极贯彻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方针，反复动员各行各业解除顾虑，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从四月十六日起，他在上海召开『上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哼哈二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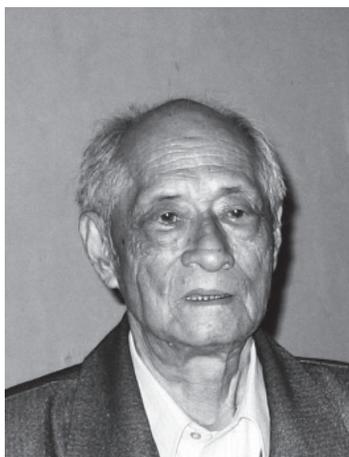
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传达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上海的知识份子上当了，相信了毛泽东和柯庆施的花言巧语，都很兴奋，打消了顾虑。有的认为可以大胆地『放』，大胆地『鸣』，大胆地说话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下旬，毛泽东来到上海，自己说『那时我是来点火的』。过了一百天，在七月初，毛又来到上海，这一次是来抓右派的。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煽动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漏夜到基层查看大字报，开座谈会，找人谈话，忙得不亦乐乎。

柯庆施紧跟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把上海搞成反右派斗争中的重灾区。全市打出右派五万五千多人，佔全国右派总数的十分之一，仅次于北京。而当时上海人口仅佔全国人口的八十分之一。上海完成的右派指标大大超过其他省市。在反右期间或文革前后被处决的知识菁英达数十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上海交响乐团世界知名的指挥陆洪恩、北大英烈才女林昭、宁死不屈的刘文辉、华东师范大学的王申酉。上海民盟一千五百多人，揪出右派自主任沈志远、副主任陈仁炳、彭文应以下共五百多人，几乎达三分之一。

毛泽东和柯庆施连十多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轰动全国的上海电力专科学校案打了几十名『娃娃右派』。中专生

的年齡相當於高中生，十七八歲左右，尚未成年，所謂『乳臭未乾』。他們不過貼出幾張批評官僚主義的大字報，便說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小孩子搞不明白，有三、四個人自殺了。



上海電力專科學校右派教師葉思九，寫出第一張批評官僚主義的大字報

據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在美國透露，林昭在一九六二年保釋回家時曾經說過，毛澤東和柯慶施親自審問過她。彭令范絕不相信這是林昭的『幻覺』或『妄想』。但是有關林昭的材料，包括她在獄中寫的血書，僅在上海市靜安區公安局就堆滿了一房間，這些材料有待『解密』。也有人说那些材料已經轉移到浙江某山區倉庫，因為林昭的材料屬於『國家高度

機密』，至少要塵封二十年。所以毛澤東和柯慶施是否親自審問過林昭的真實情況，難以重見天日。

柯慶施手下有一位政治秘書，名叫張春橋，在文革中成為四人幫的重要成員。曾經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此時嶄露頭角，他和小文痞姚文元一起，在報刊上狠批陳仁炳和彭文應。張春橋的門檻很精，不敢用真名發表反右文章，幾乎每一篇換一個名字，時而用『吳松』，時而用『常熟』。應該說，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是靠反右派發迹崛起的政治扒手。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哼哈二将

柯大鼻子不愧为老毛的好学生，把老毛的极左路线学得维妙维肖。反右运动把上海整得万马齐瘖，政治空气死气沉沉。紧接着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三面红旗使上海人民勒紧了裤带，民不聊生。上海自此走上了灾难不息的道路，这一切都拜助於柯庆施忠心耿耿地执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

柯庆施自己是知识份子出身，却一贯仇视知识份子。他对知识份子有个至理名言：『知识份子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紧跟毛泽东跟到骨子里去了，毛泽东仇视知识份子，他也跟着仇视。这也就是他在反右斗争中对知识份子如此心狠手辣的原因。

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四川成都猝然病死，只活了六十三岁。他是猝死在李井泉的酒席之后的。东西两大左王情投意合，臭味相投。一番畅饮后，就此一命呜呼，踏上黄泉。按照现代人的观念，六十三岁属於短命，不得好死。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通报销』。他又是康生一类的人物，否则活到文革，定有另一番精彩绝伦的表演。

西南左王李井泉

另一位毛泽东宠信的封疆大臣李井泉（1909-1989）人称『西南王』、『四川王』，统治西南和四川达十七年之久，像柯庆施一样，紧跟毛泽东，执行一条极左路线。而且他在中央极左路线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加倍偏左，左上加左。所以在反右运动后，四川人民又送给他一个雅号：『左王』。

李井泉除了极左，为人无雄心壮志，人品极差，生活作风亦很颓废，沉溺於麻将、扑克、桥牌；欣赏旧戏和香港电影；对漂亮女人情有独钟；不顾中央三申五令，带私人护士出游。他认为过去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吃了亏，年年少报二十——三十亿斤粮，向中央打埋伏。他在全国提早刮起浮夸风和共产风，将『天府之国』折腾成饥饿之乡，官方承认，四川全省饿死八百一十二万人。但在实际上，四川全省人口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一千多万，饿死的人佔全省人口11%以上。

使四川人民极为痛恨的是李井泉干的缺德事难以计数，罄竹难书：

在反右斗争中，他大整地下党，搞打击报复。别出心裁地在毛泽东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不成文的『凡对李井泉有意见者均为右派份子』。他东寻西觅，居然给他揪出了几个右派反党集团来。『张文澄五人右派反党集团』中张文澄是地下党出身，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长期在成都、重庆从事地下党领导工作，反右前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

一九五二年，四川省由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合并建省。中共中央已经内定李井泉为中共四川省省委书记，可是又要作秀，装扮成民主选举模样。那时中共全党上下盛行苏共式的『等额选举』模式，候选人不能超出选举名额。中共四川省第一届党代会筹委会提出来的省委候选人名单中竟没有一个地下党出身的人。李井泉原来是一野南下的晋绥干部，因此他掌权后采取『重用一野、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的宗派主义政策。张文澄等地下党领导按组织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哼哈二将

原则向党代会提意见，李井泉不予理睬。

等额选举结果，李井泉少了四票，他觉得有损面子。会后指示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赵苍璧用公安技术检查每张选票上的指纹，很快查出不投他票的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明朗和张文澄等人。李赤膊上阵，亲自分头召见四人，勒令写检查。在高压淫威底下，三人低头认罪，检查交代。唯独张文澄死不认错，拿出搞地下活动的勇气，顶撞李井泉说：『投票选举党的领导，选谁不选谁是「党章」赋予我的权利，我有什么错？如果要我认错，除非你修改「党章」。』这一席话呛得李井泉下不来台，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李井泉指示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非得把张文澄打成右派不可。』任白戈不敢怠慢，坚决执行上级命令，鸡蛋里挑骨头，罗织罪名，揪出了『张文澄五人右派反党集团』。其余四人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张文澄妻子《重庆日报》总编辑贾维英、《四川工人日报》总编辑汪岗和重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予，五人皆出身地下党。

他们五人还株连了好几百人，仅各大报社和厂矿就有二百多人划为右派，包括报社的业余通讯员。张文澄两位兄弟受哥哥牵连也划为右派。连同妻子贾维英，真可谓：『金榜题名，一门四杰。』李井泉报复张文澄与当年毛泽东把不投自己票的民主人士张东蓀打成反革命份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泽宽是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是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廖伯康是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他们批评李井泉的家长

式专横作风。给他揪出的还有地下党出身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以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和名作家沙汀组成的『三家村』。四川省共揪出右派份子五万多人，中右份子六万多人。四川省的知识份子较少，可见李井泉划右比例之高，在全国可与上海市、河南省、甘肃省比美。

在李井泉的直接指挥和领导下，四川省反右派运动取得『辉煌』成绩，受到毛泽东多次表扬。党、政、军、民各系统知识份子中处分六万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揪出右派份子五万另二百七十九人；中右份子五万多人；四十万群众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李井泉在反右运动中创造了多项全国纪录，他的『伟大创举』之一是在中学生中大抓右派份子，即反社会主义份子。

他向柯庆施『学习』，竟然拿未成年人开刀。他在一九五七年底指示四川各地，在中等学校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将中学生划分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大类，第三、四类即相当於中右份子、右派份子。同柯庆施一样，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开创了在未成年人中划右派的先河。这批未成年右派享受成年右派一样待遇，但不能享受摘帽和改正。直到二〇〇三年当年的未成年右派王建军、杨泽泉等人带头起来揭发内幕，写出《五八劫》、《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的年代里》等书，世人才了解反右派运动中还有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他的另一项伟大的全国纪录是他在四川达县揪出一个念小学五年级的全国最小的未成年右派，年仅十二岁的右童份子张克锦（1946--）。李井泉为毛泽东立下了不朽功勋！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哼哈二将

中共四川省巫山县委驱赶一百七十多名戴帽和摘帽右派，美其名曰『立功赎罪』，攀登巫峡悬崖峭壁，制作『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和『毛主席万岁！』两幅巨大标语，每个字佔地一千平方米。水、石灰、水泥等建筑材料从十几里外用背篓背上山，不少右派饿死、累死、摔死。

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回来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他故意不谈毛泽东已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揪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而是仅仅传达彭德怀的那封信，要大家表态。不少干部不知底细，中了他李井泉独创的『阳谋』圈套，表态支持彭德怀，被他一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在四川省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引起的大饥荒中，李井泉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突然宣佈全省粮票取消作废。饥民们以糠麸为生，全省流行浮肿病，混身皮肤肿得发亮。忍饥挨饿从口里节省下的粮票毁於一旦，引起四川省全省极大的民愤。

可是他並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要拿地下党为他垫背。他将华莹山游击队打成土匪；将《红岩》作者及地下党成员打成叛徒、特务、内奸。李井泉於四川各地在文革初期抛出大量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转移群众视线，以图自保。

所以文革开始，便出现『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可惜他的民愤实在太太大，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都不让他去避难。最后只好躲藏到北京西郊小王公行宫雜场院，与彭德怀、贺龙、彭真一起，受到『监护保护』。文革后再也不敢回到四川，掛了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空衔，直到终老。

著名作家白桦在他所著的《我所见到的胡右派》一书中评论道：『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变成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难！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

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个坐镇华东，一个独霸西南，不愧为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哼哈二将』。

2008年5月

六、中國右派知多少？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中华大地到底揪出多少右派份子，中共官方和民间谁都说不清楚。当年揪右派份子揪红了眼，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突破了政策底线，扔掉了条条框框。工农商学兵一齐动手，层层订指标，乱揪一气。最后一场混战，进入失控状态，导致严重扩大化。不仅反右运动如此，中共建国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最终都是这样收场的。这也是中共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原因。毛泽东宁左勿右的机会主义极左路践，在他早期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已经形成。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五十年来，右派份子的统计人数在不断变化扩大，右派份子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

右派隊伍不斷擴大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反右运动刚开始，中共中央文件《關於争取、团结中间份子指示》中说：『全国大约有右派四千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文件《中央關於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份子人数的通知》中说：『准备的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全国又划六千二百名右派。当时估计有十五万，中央向各地发出划右百分比。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三十万人，把三十万右派搞臭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份子帽子的指示》中称，全国揭发出右派份子四十五万人。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发中组部和中宣部《关于右派份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中说：『……在全国四十四万名右派份子中……。』

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的报告称：『整个反右运动中，有二百零一万三千三百余人被定为右派份子——，有七万二千七百多人被捕，二万二千一百多人自杀，有三千五百多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踪。』



天津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整风鸣放中的大字报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内称：『……至七月中旬，属于错划已经改正的有四十九万三千

人，佔所划右派份子的90%』。按此百分比推算，应为

中国右派知多少？

五十四万八千一百十一人。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的刘澜涛，在《改正右派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时共划了右派五十四万人，佔当时干部人数九百五十三万的5.7%』。

一九八九年叶永烈著《反右派斗争始末》提出，共有右派份子五十五万多人，中右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株连家属达数百万之众。

一九九〇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五七年划右派份子四十至七十万』。

一九九一年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丁抒著的《阳谋》中的数字是一百三十余万人。

一九九三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他说：『……错划了右派份子五十五万人』。

一九九三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中称：『五七年划右派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

一九九三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转引德国乌利·法朗茨《邓小平——中国的政治传奇》中的数据为：『五七年划右派八十万，株连二百九十万』。

二〇〇八年第七期《炎黄春秋》刊登李锐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關於划右人数，他写道：『现在公佈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五十五万多人，佔当时知识份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份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

达五十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於是他们被戴上「坏份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李锐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参与领导这次右派大改正工作，他的说法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

以上这些不同数据的统计有一个发展过程。虽然反右运动在一九五八年底已宣佈『胜利结束』，但是中共的左倾冒险主义刹不住车，有些地方在五九、六〇年还在揪右派，一九六〇



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政治运动的普遍规律。

综上所述，全国到底打了多少右派？比较集中的有四种说法，中共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美籍中国学者丁抒在《阳谋》中提出的一百三十多万、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报告』提供的二百零一万三千三百人以及二〇〇六年一月号香港《争鸣》杂志罗冰文章《反右运动档案揭秘》中提出的三百七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

对於最后一组数字，恕再引用罗冰先生的一段

派，一九六〇年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文件：『不经过省委批准，不得再划右派。』所以各地私自划的右派已经很难统计进去了，这也是中共搞阶级斗争、政

中国右派知多少？

原话：『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人，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定为右派份子三百七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学校教职工右派份子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七人，高等学校学生右派二万零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这一组数字经常有人引用，但亦有不少人提出质疑。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四组数字都有一定的依据，没有必要去作分析比较，判定谁是谁非。然而对于这么大的一场政治运动，打击迫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究竟划了多少右派份子，中共官方始终噤若寒蝉，对于各种数据，既不肯定，也不否认。正如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划为中右份子的张奚若教授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製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右派人數應以知識份子總數為基礎

但是任何一组数据，都离不开当年知识份子总数这条底线。发表在二〇〇八年第七期《炎黄春秋》上的李锐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一文指出：『当时界定的知识份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五百万人。』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说，中小学教

师以上的知识份子，约五百五十万人。

由上可知，当年知识份子数量在五百万至五百五十万之间是可信的。一九七九 -- 八〇年右派大改正时官方统计出来的当年划了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虽经缩水，大致可靠，这个数字已佔当年知识份子总数的 11%。然而该数据应当不包括中右份子、内控右派、拟右份子、漏网右派，工农中的坏份子，中等学校中的反动份子和反社会主义份子，也不包括受株连人员。如果把他们也统计进去，那么后三组数字都是可信的，问题是每一组数字包括了哪一些人。此外，仅开除公职的右派配偶和家属即达十六万之众。

現今尚有多少幸存者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经过分析统计，著文《關於右派的一项死亡统计》，发表在二〇〇七年六月号的《开放》。他说：『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派的数量尚无定论，官方宣称的数字是五十五万多人。五十年之后的今天，还有多少右派健在？死去的又有多少？最近，我们获悉一个来自大陆内部未曾公开的数字。据说中共当局不久前作过调查统计，原右派份子，全国现有九千八百名，港澳台四百二十名，欧美八十人。总共一万另三百名。』

『换言之，五十五万多名右派，五十年之后，尚健在者不到百分之二，九成八均已亡故，这个比例令人大吃一惊。』接着他进一步分析，如果当年全国右派平均年龄以三十岁计，至今已八十多岁，八十岁以上佔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十。

自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至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右派份子因遭种种迫害而非正常死亡者，达六万多人，包括枪毙处

中国右派知多少？

决、自杀、批斗殴打致死、劳改劳教中饿死虐待死。中国一代菁英，就此凋零了。

反右运动中第一个被枪决的右派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党员黄宗奇。一九五八年春，以『现行反革



鳴放時的大字報

命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后一个枪决的右派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张锡镔，一九七六年底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以『企图组织逃脱罪』，枪毙於四川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在文革中惨遭处决的尚有右派三大烈女，她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林昭、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兰州农校女教师毛应星。毛应星死后被追认为烈士。

在反右运动中自杀的第一人是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俞彪文，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於批斗会间隙跳楼身亡。死后『追认』为『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右派份子』，时年才三十一岁。

已知的如今健在的百岁右派老人尚有二位。『历史反革命右派份子』黄苗子和滇缅公路抗战英雄李温平。

黄苗子（1913- ）广东中山人士，小名猫仔。上学时学名用『黄猫仔』似不太雅。故去掉单人偏旁，『黄苗子』名沿用至今。他在三十年代已是小有名气的文化人。

一九五七年因『二流堂事件』（中国式裴多菲俱乐部）而获罪，加上曾在国民政府谋职，遂成为历史反革命右派份子，送北大荒劳动教养，文革中又与夫人坐牢七年。

李温平博士（1912- ）福建惠安人。一九三九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运输工程博士学位。他是修建『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的筑路总工程师，为修建滇缅公路立下不朽功绩。一九四六年美国政府授予他二战一级《自由勋章》。可是由於种种原因，直到三十八年后的一九八四年他获得『改正』后，方始准许他前去美国领奖。

一九四三年他参加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领导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一九五七年助党整风时，他受农工党主席章伯钧之托，草拟过一份工程技术界参加鸣放座谈会人员名单。就凭他与章伯钧关系，在反右补课运动中，把他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今年三月十九日是李温平老人百岁生日，中国人习惯按虚岁庆祝生日。那天李老的三个女儿和他的亲友为他祝寿，祝贺他健康长寿。

右派年龄上不封顶 下不保底

中国最小的右派是十二岁未成年的『右童份子』张克锦，当时他正在四川省达县上小学五年级（另见《谁剥夺了他们的青春？——大中小学中的反右运动》）；中国高龄百老右派已发现多人，其中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德正大阿訇，他划为右派份子时已经一百另七岁。另一位是佛教界的释虚云大师，他划右派时年一百十八岁。百岁右派恐怕还有其人，参见《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中的反右

中国右派知多少？

派运动》。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披露的苏联政治犯、思想犯的年龄介乎十四岁至八十岁之间。而中国右派份子的年龄，从十二岁至一百十八岁，整整跨越五、六代人的时空，中共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奇迹！

毛泽东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封建传统带进了中国共产党内。反右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家属右派。黄炎培全家出了七位右派；王伯祥一家六口右派；水梓一家六位右派。三代四代右派、夫妻右派、父子右派、母子右派、父女右派、母女右派、兄弟姊妹右派互相株连，比比皆是。

2010年4月

七、反右運動與清黨

——中共建國後第一次最大規模的黨內鬥爭

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反右派運動，中共及其歷史學家始終把它定性為一場整肅知識份子及民主黨派的運動，反右運動的性質如同中國現代史那樣，早已被官方蓋棺論定了。五十三年光陰荏苒，體制內外的歷史學家和當年受害者反思後挖掘出來的史料證明，毛澤東發動『陽謀』的最終目的，如同以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運動和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一樣，都是為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保持他的江山安泰。這批黨內右派中，首當其衝的是不聽中央號令的諸侯、地方主義份子和地方民族主義份子、打游擊和地下黨出身的原白區黨內幹部、黨內知識份子和黨內民主派。因此本文將剖析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最終目的是『清黨』，旨在建國後第一次大規模清理中共黨內門戶。

一，中共黨內揪出多少右派

反右派運動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三種不同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第二種是加上中右份子、內控右派、疑右份子以及工、農、中小學生

反右运动与清党

中的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共约一百三十万人；第三种再加上受株连者共有三百多万人。本文所探讨的党内右派以官方认定的第一种数字为基准。

中共对于党内右派的数量始终讳莫如深。如今只能依据三个文件来推算党内右派数量。中共官方把反右运动划分为鸣放、反击、补课、处理四个阶段。这种划分方式很容易使人忽略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运动的特殊重要性。

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早在建国伊始，他已敏锐地看清，共产党江山变色的危险在党内，党内在高层，



朱镕基和夫人劳安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十四日晚毛泽东作了临时发言。他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

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不大同意他的看法，急忙补充道：『毛泽东同志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过，会议要备案。』原来毛泽东早已有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的打算。

一九五七年他搞『阳谋』，由外及里、自下而上，最

后藉助社会上的反右清理门户，消除党内隐患。反右补课表面上是在凑右派指标，完成毛泽东和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层层下达和不断升级的定额。实际上旨在清党。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不久，毛泽东即已提醒亲信：『请各地注意党内的鲨鱼』。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斗争是对於每个共产党员的重大考验》，明确指出有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内应』。同月在青岛举行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挑明：『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人是过不去的。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外不说。』

毛泽东这种指导思想的背景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突变。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在中共党内高干中广泛流传。毛泽东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和掌权高干中不少出身於知识份子，搞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党，受过西方式的教育。他们的心底深处深埋着民主意识。毛泽东清醒地察觉，这些人便是他最大的敌人，远比党外右派危险、可怕。

反右补课即以清党为主，毛泽东称之为『清理阶级异己份子』。不论给他们戴上什么帽子，冠以什么份子，都是为了排除异己，巩固中央集权，维护一党专政的局面。因此其打击的矛头只有一个，即所谓的『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如果说在反右运动中揪出的最大干部仅仅是二位中央候补委员，即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古大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揪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反右运动与清党

以及一大批开国元勋、元帅将军。毛泽东是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式的封建独裁暴君，决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是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的，打击地、富、反、坏、右、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扫四旧仅仅是毛泽东发动群众的手段。待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将斗争锋芒拨向真正打击的目标——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搞群众运动的手法一贯是打迂迴战、包围战，扫清外围、攻其核心。反右运动从以民主党派、知识份子、青年学生、社会基层为主的外围开始。当群众发动起来外围扫清了，便将阶级斗争矛头即刻转向党内。假如说毛泽东的真正战略目标在反右运动中尚算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的话，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昭然若揭了。其目的只有一个：生前怕人夺权，身后怕人鞭屍。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的党内指示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份子中，右派约佔 15-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份子约佔 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 20% 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於 10%。』

党内右派 5-10% 毛泽东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呢？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时有党员一千二百万。从八大代表成份分析，60% 为工农，工农不划右。40% 可以划右的党员包括知识份子、干部、军官和其他阶层，共有四百八十万之众。依照毛泽东在反右前夕信口开河订下的 5-10% 估算，党内右派可高达二十四万至四十八万，大大超出当时全国官定右派总数，显然靠不住。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发表的党内

文件《县委书记以上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红头文件《关于今后接受党员工作的意见》指出，自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党员总数共减少二十七万人。扣除自然死亡、划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内控右派或中右而劝退及取消预备期的党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党员右派总数应在二十万以上，佔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官定右派中的 36% 以上，在反右派运动中受整教的党员数量之大、比例之高，正是中共至今秘而不宣、刻意隐瞒的原因之一。

这个数据的另一个印证是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於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毛泽东讲话。他认为党内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毛泽东不是数学家，在国家建设方面的数据搞得一塌糊涂。然而在决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打击指标方面，却十分精确。毛泽东订下的党内右派指标中的二十万底线，正好符合我们折算的数据。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党内划的内控右派、中右份子，因为党内也和社会一样要划左中右。他们仅受除不开除党籍以外的其他党纪处分，对外保密，组织部门掌握。乔冠华和杨献珍便是这一类人。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赞成实行美国国会两院制。部长陈毅说：『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但处理时报中央书记处，批覆仅给予『严重警告』的党纪处分，不戴帽、不开除党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起初一个右派也抓不出来，刘少奇警告他：『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中央书记处

撤了他的职，他只得让秘书马鸿模顶替他当右派。

二，党内右派是些什么人

更为严重的是划右党员的身份。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期间出版了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份子决定汇编》。其中披露党内行政十三级以上高干右派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三十三份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个案以外，其余二百五十二份材料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判定的案子，即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中，行政十三级以上党内高干中划的右派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占总数的88.44%。在这二百五十二个案例中，省部级以上高干一百多人，有三十九个是集团性案件，即『右派反党集团』和『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或『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案。

他们之中有中央候补委员、部长、省委书记、省长、市地县委书记、中将、少将、大校，身居高位要津，难怪毛泽东担心江山变色。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底访苏归来，来不及掸去身上的尘土，便马不停蹄地数度离京，至一九五八年三、四月间，共密访全国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秘访上海、杭州，揪出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周克、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浙江省长沙文汉、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黄源等反党右派集团。

一九五八年一月密访山东、安徽、广东、广西；一九五八年二月东北三省；三月至四月武汉、广州、浙江、

甘肃、河南、河北、云南、青海、新疆，替当地挖出了一大批省部级的党内『定时炸弹』，即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地方主义份子和民族地方主义份子。把他们一律开除党籍，清除出党。被毛泽东在巡游中揪出的主要有十大反党集团：



前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



前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

1，以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为首的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2，以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孙殿才为首的孙、梁（大钧）、陈（成义）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3，以安徽省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

4，云南省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右派反党集团；

5，以广西僮族自治区副主席、常委陈再励为首的陈、王、骆、王、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6，以青海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极右份子）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党集团；

反右运动与清党

7，河北省常委刘洪涛右派反党集团；

8，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9，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

毛泽东用出巡密访的办法发动政治运动整人，即由反右运动始，以后各大运动都沿用这种方法，直到文化大革命终止。

三，党内右派的构成

党内右派首先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具有民主意识的各路诸侯。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的浙江省长沙文汉主张党政分工，被诬指为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他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严格执行政策，诬为『包庇右派』；一九三二年入党的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王翰主持全国监察工作，反对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取代司法监察，反对制造冤假错案；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珪与副书记兼全国作协书记黎辛，在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中，抵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们均被划为右派。党内民主派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或学生出身，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意识。

一九五五——五六年的合作化高潮中与毛泽东唱反调首次提出『包产到户』並付之实行的年仅二十六岁的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和中共广西环江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定，都是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王定还是地方主义份子

兼极右份子。他逝世后环江人民怀念他，在他坟头树起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

其次，利用反右运动打击报复党内对手，也划了一大批右派。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孙作宾是二十年代入党的唯一的党内极右份子，他的『罪行』仅仅是在党内批评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作风专断。



前青海省書記兼省長、
極右份子孫作賓

改正后曾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的周克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举行的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上对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民主作风不正常提出意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指责柯庆施独断专行为党内一霸，演成沪上轰动一时的『一霸事件』。他们几人均被柯庆施打成右派。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与柯庆施互为仲伯，将无记名选举中不投他票（经公安厅秘查）的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文澄和批评他『一言堂』家长作风的成都市团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黄一龙划为右派。经过党内反右，中共全党万籁无声，无人敢提不同意见，无人敢说真话。其直接后果就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大跃进』。

反右运动与清党

第三方面的党内右派，是通过反右清洗白区武装斗争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毛泽东认为地下党成份复杂，多为知识份子，不可靠。不宜担任党政第一把手（正职）。一九四九年发至各大军区首长的内部绝密文件中，下达了处理南京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沙文汉之妻陈修良曾任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在白区组织武装起义，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受到中共中央表扬，人称『策反主帅』和中共三大特工女杰（另二人是张露萍和朱枫）之一。南京共有二千名地下党员，两次整党处理四百六十六名，开除二百另五名。陈修良本人一路降职，直至戴上极右份子帽子。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袁永熙是『一二九』学运领袖、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出身学运工运，他们同成千上万地下党出身的党内干部一样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执政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当年九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昆明召开『十六省市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座谈会』，仅江西省委就成立了『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工作二十多个月，恢复江西省地下党成员六百五十二人党籍，其中有一百二十七名隶属中共闽浙赣边区域工部的地下党员因城工部领导人出了差错，都当叛徒惨遭枪决。另有一个中学生地下党小组胡显中等五名党员连同他们的入党介绍人统通划为右派份子。

第四方面是因犯『地方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而被划为右派的党内干部。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要进行。地方主义

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省首先把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纳入反右运动的轨道。

广东省的反右斗争的重点便是反地方主义。广东省全省共揪出右派份子三万六千八百另八人，因犯地方主义错误而划为右派的各级干部有一万二千多名，佔全省右派的三分之一。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扩大全会上的总结中称：『地方主义首先是在海南发起——其他各地也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有的已发展到组织反党小集团的地步。例如蓬荊反党小集团、欧新反党小集团、陈华反党小集团、陈恩反党小集团等就是。』

广西、甘肃（含宁夏）、云南也揪出了大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谢富治仅在滇东北就揪出散佈在昭通、鲁甸等十一个县市原边纵地下党地师级、县委书记、县长等各级干部二千多人。谢富治在云南省委扩大会议上疯狂叫嚣说：『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

至於地方民族主义份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在《關於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的说明》中透露：『由於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於严重，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是扩大了范围，有些地方由共产党内扩大到党外……，二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据全国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共划少数民族右派份子五千人，其中划为地方民族主义份子的共一千七百人。』

中共在意识形态文宣部门的各级领导，成为党内右派的第五方面军。从中央到地方几乎一网打尽。他们中有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珪、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浙江省文化局长黄源以及一大批中共各级分管意识形态和笔杆子的宣传部长。

党内右派第六方面军是中共的枪杆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共揪出三万多名右派份子，以批判刘伯承、萧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为主线。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党团员。将军级的有为刘伯承受过的南京军事学院教官刘宗宽中将、长期埋伏在蒋介石身边的中共特别党员郭汝瑰中将、第一支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少将、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等将领。毛泽东称萧克上将是军中右派代表，但未戴帽。总参谋长张爱萍也因受朱可夫事件影响而受到批判。

在军中右派中，曾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刘伯承为部长）条令局副局长和南京军事学院作战训练部长的蔡铁根大校，参加过红军长征，立有显赫战功，担任过彭德怀秘书，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为刘伯承辩护而打成右派，逐出军队。文革初期惨遭枪决。著名的全国特级战斗英雄邵喜德少校（蒙族）为批评苏联教官而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军籍、党籍。

四， 中央及地方揪出的党内右派集團

根据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期间陆续出版、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份子决定汇编》以及各地发布的资料，中央和地方划为党内右派反党集团或个人的主要有：

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七年九月揪出『李之珪、黎辛

右派反党集团』，李之珪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黎辛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记，反党集团成员还有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

中央廣播事業局：一九五八年十月揪出『温济泽右派反党小集团』，温济泽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中國人民銀行：一九五八年揪出『尚、詹、夏反党集团』，尚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詹武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兼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夏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副局长。

中央監察部：一九五七年揪出『王翰右派反党集团』，王翰为监察部常务副部长、中共监察部党组书记。

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五八年五——七月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批判以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搞福利主义、闹独立性、搞反党宗派主义。书记处书记董昕、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秦达远等十多人划为阶级异己份子。

上海市：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周克右派反党案，以薛尚实为首的同济大学右派反党集团，薛为党委书记兼校长，党委副书记兼总务长刘准，党委会三分之二委员，共青团正副书记都是右派。

安徽省：『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李世农为安徽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效椿为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为省委委员、副检察长，陈仁刚为司法厅副厅长、司法厅党组书记。

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淮南市右派反党集团』，其成员是中共淮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夏际霞等人；

反右运动与清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揪出『蚌埠市反党联盟』，成员有中共蚌埠市委第二书记兼监委书记罗霞光、市委副书记王荣华、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杜宏本。

浙江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揪出『沙、杨、彭、孙右派反党集团』，沙文汉是浙江省长、省委常委，杨思一为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彭瑞林为省检察院院长，孙章禄为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

一九五七年十月揪出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王定，首创『包产到户』之一。

广东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冯、古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冯白驹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同时揪出四大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一，『蓬、谢、钟、温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蓬荆为原水产厅副厅长，谢平为汕头市税务局长，钟杰民为水电厅处长，温盛湘为水产公司经理。

二，『陈、吴、钟、王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恩是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吴有恒是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钟明是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有恒是市委办公室主任。

三，『欧新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欧新为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处长，该集团包括十多名县团级干部。

四，『陈华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华曾任中共地委书记，中共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集团中包括十多名县团级干部。

划为地方主义右派份子的还有中共港澳工委宣传处长麦素君，广州市副市长俞美庆，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

侨务办公室主任谢创，广州市财贸办公室主任古念良。

河南省：一九五八年七月揪出『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潘复生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珏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是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四川省：一九五八年一月揪出『重庆市张、王、贾、谢四人右派反党小集团』，张文澄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匡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贾维英是《重庆日报》总编辑，谢予是重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揪出『重庆市反党联盟』，主要成员是中共重庆市工会党组书记、重庆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仪等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揪出『宜宾地区右派反党集团』，李鹏为宜宾地区专员兼地委副书记，吕逢权为宜宾市长兼市委副书记。

甘肃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孙、陈、梁、曹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孙殿才是副省长、省委常委，陈仁义是副省长，梁大钧是中共银川地委第一书记、省委委员，曹又参是银川专员公署专员。此外还有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陈、王、骆、王、廖、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再励是中共广西区省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王梦周是中共广西区委组织部长，骆明是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长，王浩是中共广西区委文教部长，廖原是中共广西区委财贸部长，廖联原是兵役局长。中共广西区委八个部长有六人划为右派。

反右运动与清党

『中共环江县委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包括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定（包产到户首创者之一），副书记陈朝群，车丙寅。全县干部有九十六人划为右派，六十六人划为中右。

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孙作宾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孙作宾是青海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其成员是省妇联主任刘杰（孙作宾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高继先，中共青海省河南县委第一书记潘光亚。

河北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刘洪涛反党联盟』。刘洪涛是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还有统战部副部长王葆真等。

福建省：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福建省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福州市委书记黄国璋，省教育厅长林汝南，晋江专区专员许集美，福州市委书记王一平等。

贵州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贵州省侗族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省委候补委员、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梁旺贵（侗族），中共黔东南自治州委委员、州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冯兴漠（侗族）。

雲南省：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郑敦、王镜如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郑敦是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王镜如是组织部副部长，其成员有中共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长臧野农，省建筑工程局处长袁用之，中共玉溪地委副书记全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谢加林，思茅地委书记梁家。

滇东北的反右运动与反地方主义结合起来，由时任云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的谢富治亲自领导，主要矛头对准四十年代战功卓著的边纵和地下党干部。揪出原昭通地委第一书记李德仁（已调任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昭通专

员李剑秋、云南省地下党领导费炳、浦汉英、孙志能等人。滇东北共有十一个县揪出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谢富治超额完成抓右派指标，共有二千多人被打为右派份子：

會澤縣：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为首地方干部二百余人；

昭通縣：县委书记陈季佰、县长张保全等地、县两级干部三百多人；

鹽津縣：县委副书记瞿增伟、组织部长何浩正等一百四十余人；

魯甸縣：县委副书记李春仁、组织部长袁成明等一百二十多人；

威信縣：县长吴之伯、县委组织部长杨曙、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等一百五十多人；

巧家縣：县长郭云谷、副县长龙树林、宣传部长丁恩祝、农工部长周天祺等一百五十多人；

大關縣：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开仁等一百多人；

永善縣：县长张德钦、副县长韩礼福、检察长吴启跃等一百八十多人；

綏江縣：县委组织部长龙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正举等一百二十多人；

鎮雄縣：县长欧阳兴科等一百二十多人；

彝良縣：县委书记陈子良等一百八十多人。

山東省：一九五八年八月揪出『山东省王卓如地方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王卓如为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成员有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山东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耀曾，省外贸副主任郭仕毅，副省长袁子杨，财贸厅厅长

反右运动与清党

续中一，省计委副主任曾戎等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揪出『菏泽地委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有菏泽地区专员，中共地委副书记扈国华，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杜湘，地委常委、财贸部长王鲁光，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褚连捷，地委委员、中共单县县委书记申云璞。

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青岛市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孙汉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矫枫，青岛市副市长褚介，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委员孙朴风、中共青岛市委文教部副部长俞光前、国棉一厂党委书记王作，《青岛日报》总编辑顾膺等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揪出『济南市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山东省省委常委、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毅以及市委秘书长、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等人。

山东省地方主义反党右派份子还有中共泰安地委书记曹礼琴，中共惠民地委书记李峰。

遼寧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辽宁省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有辽宁省监察厅长、党组书记张静超，监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方一臣等。

一九五八年十月揪出『辽宁省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成员有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锋等人。

西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八月揪出『范明右派反党集团』，范明为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进藏部队司令兼政委，少将军衔。成员包括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梁枫（范明妻）、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书记白云峰，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长曾实等人，受株连者达六百多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新疆地方民族主义反党联盟』，主要成员有中共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热赛拉夫，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伊敏诺夫，中共自治区党委常委艾斯海提等。

某些研究五七运动史的学者将五七年的右派区分为自觉型和非自觉型两大类。然而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右派份子，在客观效果上都起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正面作用。中共党内右派亦是如此。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地用政治运动方式整肃党内反对派，清理门户。划为中共党内右派的中共党员，不论其所处位置在高层或基层，在中央或地方，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不听中央号令，闹独立性；有的是具有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独裁，一党专政；有的是维护地方权益，挑战毛泽东中央集权的权威性。至少是因政策上的分歧而划为右派份子者，在客观效果上他们都是具有不同政见的党内民主派。

五， 爲什麼黨內反右鬥爭的蓋子至今幾乎沒有揭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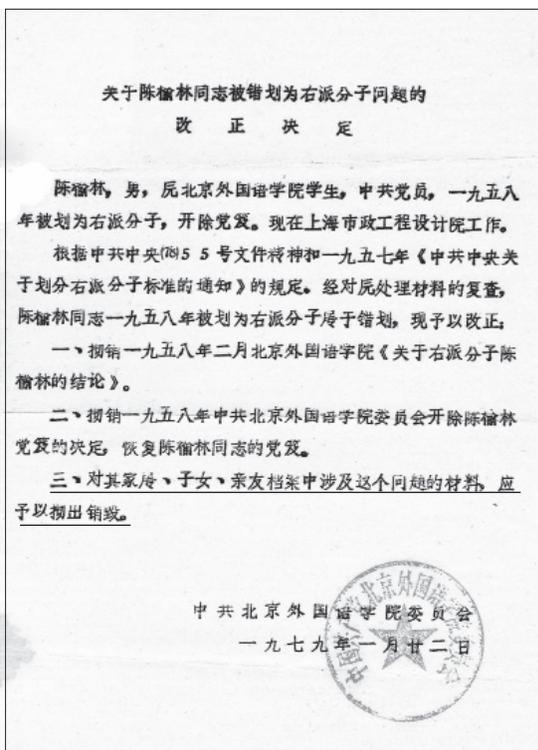
反右派运动过去五十三年了，對於反右斗争的认知，依旧限定於官方设定的二个禁区范围内，即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以及『反右运动是整肃知识份子』。提起反右，人们把时限定格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很少有人把时限延伸到一九五八由以党内反右为主题的『反右补课』，更没有把反右补课看作是建国后第一场最大规模的党内残酷斗争和清党运动。

这一场党内斗争史几乎揭不开的原因，不外有多种因素。首先是中共设定的历史禁区和误导作用。一九七九年右派『大

改正』后，开放了一段时间的反右研究。刚打开门缝，不多久便匆遽关门了。五七反右和八九『六四』都成为禁区，党内反右史更成为禁区中的禁区。

五八年的反右清党运动与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不同，采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毛泽东和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反覆强调『内外有别』，大多数党政系统的党内右派没有推向社会，关起门来批斗处分，当时鲜为人知，事后如果自己不说，便更无人知晓。上文提到的几个文件，都已封存在档案库中，不见阳光。时过境迁，渐渐成为历史盲区。

其次，在右派大改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一条规定：『对本人及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应予以撤出销毁。』在中共党内更有极其严密的干部档案管理制度。党、政正职领导的干部人事档案，同级党委不准管理，



右派份子的改正决定

必须由上一级党委管理；厅局级由省部级管理；省部级由中组部管理，以此类推。这种以官本位为基础的党内人事档案管理体制，很难揭开党内斗争的盖子。

第三，党内右派受传统的组织观念和党的纪律限制，有些人改正后官复原职或官运亨通，不愿再去违纪揭开伤疤，影响升官发财。这是与党外右派的不同之处。改正后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的态度，颇具代表性。

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追问他一九五八年当右派的事，他闪烁其词地回答：『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是也是很愉快的。因此我也不想再提这件事了。』中共官方也竭力掩饰朱曾当右派这件事。

邓小平在专门研究起用朱镕基时，问起朱是否正确对待右派问题，举出自己历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经过，要求朱以事业为重，朱当然心中有数，『夹着尾巴做人』。朱镕基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党内右派干部的立场。很少有人会去揭开党内这段历史。

自然淘汰规律也是揭不开这段历史的重要因素。《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於二〇〇七年六月在该刊发表专文《關於右派的一项死亡统计》。他以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作为基准，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在当年还存活一万另三百名右派，即健在者不到百分之二。时过三年，又有多少右派老人逃不过自然淘汰规律。如果党内右派也以此数测算，而今健在者应在三千人左右，况且大都是当年二十岁上下的学生党员右派。他们的阅历和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毕竟尚有一定局限性。

所以若要彻底揭开党内这场斗争，任务颇为艰巨。本文仅起抛砖引玉作用，期盼更多有识之士来做这个工作。

六， 社會矛盾始終是黨内鬥争的反映

毛泽东宽大的木床上摆放着《资治通鉴》，每当遇到政治难题，都会从古书堆中去寻找答案，因此他熟谙中国封建帝王治人拢心之术。在一九五七年，他那超人的政治嗅觉早已察觉了挑战他独裁专政的威胁来自党内，来自党内高层，来自地方诸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潮以及第二国际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在中共党内的深远影响。

在北大《百花学社反党小集团》的判决书中，中共甚至否认有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存在，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荒唐可笑。可是毛泽东心知肚明，他的敌人来自党内，来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即五七年的党内右派份子、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六四年四清运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入文革便成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

用政治运动方式清党，建国後进行多次，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在十年文革期间，立案审查受迫害的干部佔干部总数的 17.5%，副部长副省长以上佔总人数 75%，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76%，中央军委副主席 86%，全国三届人大副委员长 70%，副总理 87%，中央各部委和省委书记 75%。』

如果对照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便可找出一条规律，即社会矛盾始终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反映。翻开一九四九年中

共建国后的历史，潘汉年案引发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由社会上的五反导致党内的三反；批判胡风引发肃清一切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右导致中共大规模清党；一九五八年的清党又招来社会上的第四次肃反运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引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四清运动促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保守与改革的矛盾导致『六四』学运。党内咳嗽，党外感冒；或则反之。

因此，可以理解为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反右派运动，系由社会上整肃知识份子和清党两部分组成，以整肃知识份子开始，以清党告终。其直接后果是触发了那场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大灾难。举河南省为例。由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在全省干部中大抓『小潘复生』，全省共揪出右派七万多人，佔全国五十五万多右派总数的15%。党内干部右派二万三千余人，佔全省右派总数的15%。河南百姓针对这两个15%说，河南省的高产和卫星是用拳头打出来的。信阳地区右派揪得最多，共八千六百九十六人，佔全省右派九分之一，饿死人也最多。

进入二十一世纪，专政机关抓人又放人，互联网屏蔽又开放，经济政策的变幻无常，如此这般，无一不是党内派系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而历史证明，中共的内斗往往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更加残酷无情。中国现代史上这种异常现象，其实就是一党专政的必然产物。

2010年1月16日

八、反右運動中的反地方主義和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

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阶段，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党内清理门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揪斗了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份子，相当部分的受害者同时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广东、广西、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最为剧烈，他们之中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案、甘肃省副省长兼省委常委孙殿才（回族）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案、广西僮族自治区陈再励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案、青海省省委书记兼省长孙作宾地方主义反党右派集团案、云南省滇北十一县边纵和地下党二千多名地方主义右派份子案以及后来在文革中发生的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和云南蒙自沙甸回民大屠杀等大惨案。

一、廣東省的反地方主義鬥爭

一九四九年十月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以曾生为司令的

两江纵队一个炮兵团与林彪四野塔山阻击战英雄团为接管国军一五四师投降而交火。经过一夜激战，两江纵队『俘虏』了四野塔山英雄团一个整连及其战斗英雄连长。地方游击队打败了四野王牌军，虽然扬眉吐气，却也因此而种下了祸根。以后林彪派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带数百人接管兼并了两江纵队和东江纵队。地方干部与南下干部产生的隔阂，首先是语言、生活习惯的差異。北方人听不懂白话和广东官话，广东人不会讲国语；广东人喜爱冲凉，北方人难耐闷热……。

林彪原来的根据地在东北。林彪率领四野南下，毛泽东册封诸侯，把全国划分为五大行政区。东北地盘封给了高岗，林彪则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广东属于中南地区，归林彪管辖。叶剑英当时任北京市长，在周恩来暗中支持下，闻



廣東地方主義頭子古大存

讯急忙南下当还乡团，因为广东历来是周恩来的根据地，当时周还分管着中共中央南方局。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匆忙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

广东问题的背景是毛、周之间的争权。中共建国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作用越来越大。毛泽东说：『中央政府有分散主义倾向。』为削弱周，毛将国务院分权，並摧毁周控制的最后一块地盘——广东。

毛、林的合作关系远胜于毛、周。林彪伺机开始反击，

反右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斗争

一九五二年初，林彪借口广东省土改右倾，迷失方向，出现『和平土改』现象，开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改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由中南军政委员会下属的中南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出面，陶铸、赵紫阳贯彻执行。毛泽东拍板决定调走叶、方；冯、古降职。冯、方、古被定为地方主义份子三大主帅。叶剑英险些入瓮。

岂知毛泽东在不久以前还刚接见过冯白驹将军，夸奖他坚守海南，领导琼崖纵队，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把他比作陕北的刘志丹。

然而毛泽东是个翻脸无情的人。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东插手广东问题，他在中南海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周、叶、冯、方、古、陶等有关人员均出席。毛泽东一上来就批评广东地方主义，说道：『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接着调头转向方方说：『你犯了二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犯地方主义错误。』毛又对众人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只乌龟，广东、福建、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

毛泽东指出，中央认为广东『在决定关键上犯错误，迷失方向。』宣布以陶代方，严厉批评叶剑英的『广东土地改革特殊论』和方方的地方主义错误。叶、方、冯、古会上均作了检讨。当时气氛紧张，发生过『中央授意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之类的荒诞无稽事。

广东省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以叶剑英、方方调离广东，冯白驹、古大存降职处理暂告段落。毛泽东用『去皮见骨』的毒招把周恩来孤立起来，使他在中央削权，在地方受制。

可是反地方主义的根源未能消除。这是由中共体制所决

定，同中共建党与生俱来。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火拼王伦』，刚上山便诱杀王佐、袁文才，併吞他们的人马，香火赶出了和尚；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暗害了刘志丹，鹊巢鸠佔。其实，如今广东反地方主义就是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 AB 团肃反运动的翻版。

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发生於一九五七——五八年反右派运动期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扩大全会上的总结中说：『地方主义首先是在海南发起——其他各地也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有的已发展到组织反党小集团的地步。例如蓬荆反党小集团、欧新反党小集团、陈华反党小集团、陈恩反党小集团等就是。』

以陶铸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在毛泽东授意下，在一九五七年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再度揪出了已降职为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的冯白驹和古大存为『冯、古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广东省委作出『關於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错误的决议』。在此基础上，又连续『凑出』蓬荆等四个地方主义右派反党小集团。

说它是凑出来的，因为这四个反党小集团的头目和成员各不相识，或素有矛盾，更遑论组织什么集团。像反右中『章罗联盟』、『吴祖光小家族集团』一样纯属子虚乌有，凭空捏造。发明者因应阶级斗争的需要，『硬装斧头柄』凑合出来这么四个反党小集团。

广东省冯、白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四个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倒有点像中国国旗五星红旗，四颗小星星拱托着一颗大星星。广东省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是中共党内趁反右之势

反右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斗争

清理门户的重要环节，暴露了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真实意图，旨在清洗不服从中央号令的地方干部和党内反对派。

广东省直机关、各地县市受这五个反党集团牵连受处分的干部竟达两万多人，绝大多数地市级和省属厅局级领导都被打成地方主义份子，受到撤职降级处分。其中许多人更被划为极右或右派份子。他们中有十七位省委委员、七十七位省直部厅局级领导人。广东省在反右运动中总共揪出右派三万六千八百零八人，因犯地方主义错误而划为右派的各级干部却佔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可见广东省党内反右是以反地方主义作为主线条的。最为典型的是蓬荆右派反党小集团。

蓬荆反党小集团的全称是『蓬（荆）谢（平）钟（杰明）温（盛湘）地方主义右派反党小集团』，



蓬荆(左)夫妻與兒子張小鋼

代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其首脑蓬荆(1915-2002)出生於马来亚，为马来西亚华侨。原名李鸿钧，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但几代人从未返回家乡。蓬荆经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写亲笔

信介绍回国，考入厦门集美中学读书。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北平加入中共。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他奉命撤离南下，曾在鄂豫皖苏区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和安徽官亭游击大

队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宣传股长、『前锋报』主编。

一九三九年底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一九四五年参加中央组织的南下两广干部队。途中因日寇投降而转赴东北，曾任东北民主联军三纵队七师二十团政委，后任大连旅大区党委中共党校副校长、大众和光华书店党组书记等职。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央抽调在东北的华侨干部到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集中培训，再派往国外工作。是年秋天出国南下途中，在江西赣州遇到叶剑英，叶留下其中两广干部参加接管广东。到了广州，蓬荆即委任为省政府交际处长，后改任人事处长，负责接管国民政府的总统行辕和省政府，曾任民政厅军代表，处理散兵游勇。处理完毕调往农林水利厅担任广东省水产局长。

一九五四年中共向苏联学习，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抽调各省优秀干部支援重点建设项目。蓬荆旋即调往武汉，任武钢黑色冶金设计院党委书记。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成立水产部，又被指名调北京任水产部海洋渔业司副司长。

一九五七年秋蓬荆出差来广东，恰遇陶铸掀起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大辩论。广东省水产厅凑合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把素不相识的蓬荆、谢平、钟杰明、温盛湘拉郎配似地拉在一起。蓬荆是东北南下干部，谢平来自华东野战军。俩人以前均未在广东见过面。而蓬荆早在一九五四年便调离广东；谢平（1921-1996）出身新四军，一九四〇年入党，团级干部。南下广东，初到省财政厅当处长，后调去汕头当税务局长；钟杰明（1913-1976）广东东莞厚街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初在省农林厅任水产局长兼军代表，后在省水电厅当处长；温盛

反右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斗争

湘（1919-）广东省梅县人，烈属，一九三七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活动。进城后先任公路工程处政委，后调京任全国农展会水产馆馆长。四个人非亲非友，又无工作联系，直到确定为反党小集团，也没有见上一面。这种拉郎配式的小集团完全是广东省领导陶铸等人主观臆想出来的。

这件冤假错案是怎样泡制的呢？一九五七年夏天蓬荆以水产部海洋渔业司副司长身份出差来粤，老部下数人请他吃饭，其中有人肃反受审向他诉苦。蓬荆劝他们有错认错，无错可向上级申诉。他举延安整风为例，当年亦有搞错的。有心人闻悉后举报他此行南来煽风点火。第二次出差福建途经广东，陶铸强令水产厅扣下蓬荆批斗。批判者诬指蓬荆想当厅长，谢平、温盛湘想当副厅长，其实纯属虚构。

一九五四年他调中央时，在广东省担任领导的赵紫阳曾劝他留下勿走，可把水产局提升为省厅级，当时有农村部副部长李子元和温盛湘在座。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三年后批斗蓬荆的理由，跟地方主义更沾不上边。

扣下已在中央工作的蓬荆，並把他打为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头目的原因只有陶铸本人最清楚。原来蓬荆在聊天闲谈时，无意中透露他们自延安出关去东北，途中听到枪声，陶铸吓得躲进山沟，不敢出来。后来不得不派人回头去找寻他。蓬荆在闲谈中曾经说过陶铸是『怕死鬼』之类的话。此话传到陶铸耳里，其后果便可想而知。

至於谢平打为地方主义份子的原因更为滑稽可笑。他仅仅在中央水产部召开的全国水产工作会议上发言批评了广东省政府和水产厅领导不民主，作风粗暴，有宗派主义，因而得罪了省、厅领导。

蓬荆和温盛湘两人划为极右份子，谢平划为右派，三人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钟杰明本来是被阴错阳差硬拉入反党小集团的，是个天方夜谭式的闹剧。肇事者后又自找台阶，说他『认罪』态度好，只戴地方主义帽子，免戴右派帽子，受留党察看处分。

蓬荆打成极右份子后送往三水农场劳动教养。一九六二年送进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举办的『右派份子社会主义政治学习班』边劳动边洗脑。半年后送回省水产厅当养殖公司副经理，再度下放惠阳澳头珍珠养殖场当『蹲点场长』。

文革中，革命造反派把他这隻死老虎揪出来当活老虎打。打得死去活来再关进监狱。三年后放出监狱送进广东省农林水系统粤北五七干校放牛养猪。一九七三年回广州。一九七八年改正。改正后任广东省水产厅副厅长、湛江水产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一九八四年以正厅级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二〇〇二年病逝。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海外赤子北上奔延安进鲁艺北战南征忠心为党干革命，救亡先锋南下创渔业辟南珠培养专才奋争水产树丰碑。』

蓬荆儿子张小钢旅居澳大利亚，是知名的民运人士，今年奥运期间被港府拒绝入境，后来大陆当局又不准他入境为其姐奔丧。

谢平戴上右派帽子后，送省属白云山农场劳动。数年后摘帽，调返水产厅新洲渔轮厂车间工作。一九七九年改正后任水产厅造船公司经理。多年历经折磨，身心备受摧残，疾病缠身，一九九六年元旦病逝於广州，终年七十岁。追悼会上悬挂着他生前自撰的挽联：

卅戴戎馬，廿戴沉冤，坎坷奮鬥，謳心血，捫心何愧？
一生忠誠，畢生盡瘁，剛正不阿，嫉惡仇，此生何求。

在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小集團成員中，遭遇最為慘烈的非溫盛湘莫屬。他戴上極右份子帽子後，初送省屬白雲山農場勞動教養，半年後突遭逮捕，押送省看守所監獄，關押一年多，與死囚犯混為一室。出獄後轉入省公安厅勞教處收容隊。文革中再被批鬥，戴高帽游街，亂棍毆打，槍械沖撞，折斷兩根肋骨。又陪綁槍斃，挖坑埋屍。原擬將他吊死示眾，被軍代表制止這種野蠻恐怖暴行。一九七〇年初，送去荒山野林開荒，住帳篷與野猪山獐為伍。

誠如老子所說：壽者多辱。溫盛湘雖然是蓬荊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受苦難最重的人，卻是最長壽的。他以九十高齡著書立說，寫回憶錄，保存歷史真相，為先走的難友討回公道。

其他三個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中，陳華反黨小集團頭目陳華（1914-？）廣東省梅縣松口鎮人。一九三五年在廣州法商學院讀書時參加中共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青年先鋒隊』，一九三六年轉入中共。翌年成立統一出版社，翻印列寧著作，並創辦救亡刊物『抗戰大學』，出版了十多期。該刊後來成為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機關刊物。一九三九年冬，他參加中共廣東省委在南雄舉办的黨員骨幹訓練班。結業後派往南路，任茂（名）、信（宜）、電（白）建黨特派員，兼三縣武裝部隊總指揮。一九四六年任南路欽廉四縣（十萬大山、六萬大山）兼桂東南中共特派員。

一九五七年廣東省開展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時，陳華擔任省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曾幫助學員寫信向中央反映合

浦老区农村存在的问题，被扣上地方主义份子和右派份子帽子，蒙冤二十二年。同案犯有他的党校学生中共广西灵山县委书记陈铭金等二十多人。

欧新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首脑欧新（1910-1987）广宁县芙罗人，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一九三七年在澳门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五六年起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在工作中为县委干部冯华、高梅、陈德、陈威等人的不幸遭遇向上反映。欧新被指反对南下干部，闹地方主义，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党籍公职，送去劳动教养。上述数人均划为右派。同案尚有统战部处长王可夫、王海，他们同欧新一起划为极右，统战部总共揪出三个极右份子；科长陈重文和四会县委统战部长顾兆新也被划为右派。

陈恩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的产生更加离奇，简直像一出荒诞无稽的闹剧。广东省第二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揪出冯、古反党大集团和三个小集团。唯独省会广州按兵不动，揪不出地方主义份子。陶铸在省委会上向广州市委书记王德、赵武成施加压力，指令他们掘地三尺，深挖细找，务必找出几个人来，拼凑出广东省第四个即陈恩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那四个人是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陈恩、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有恒和钟明、市委办公室主任吴伯群。先把反党小集团成员确定下来，再去寻找罪行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中共搞政治运动经常惯用的『反证法』或『逆推理法』，屡试不爽。

这四个人中，吴、钟是市委书记，陈恩是他们的下级。陈恩反倒列为小集团头目，成为他们的『领导』。其中蹊跷，只有天晓得。原来打算通过陈恩，让他检举揭发吴、钟。谁

反右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斗争

知陈恩软硬不吃，答曰：『共产党员的良心就是党性，实事求是，不讲假话。』结果处分最重，杀鸡儆猴，位居小集团之首，开除党籍，戴上地方主义份子和右派份子二顶帽子，放到岭头农场劳教。

蹊跷事还在后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给陈恩改正。找遍他的档案材料，居然发现他根本不是右派，白吃了二十多年冤枉官司。当年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在大会上宣判市委秘书长陈恩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方主义份子兼右派份子后，『忘记』将书面结论放进档案袋。口说无凭，没有书面结论，改正便失去依据，陈恩白当了二十多年右派。

陳恩（1921-）广东东莞人，一九三七年入党，从事地下活动和游击战争。曾率队赴越支持越南抗法战争。一九七九年后重任广州市委统战部长、市顾委常委。

吴有恒（1913-1994）恩平县沙湖镇上凯岗村人，一九三六年在香港入党，先后任中共香港地下党委书记、中共东南特委组织部长、中共南路地区特派员、解放军粤桂边区部队司令员、粤中纵队司令员、中共粤中地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等要职。他又是『羊城晚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文武双全，集作家、将军、党干於一身。打成地方主义份子后，下放广州造纸厂车间劳动。文革中在广州监狱关押二年，转解粤北乐昌荒山野林中的『三十一办』重犯监狱单人囚室关押二年。一九七三年春节放回广州『居家待罪』。

鐘明（1919-）宝安龙岗人，一九三六年在香港加入中共，在香港从事学运工运。曾任中共九龙区委书记、中共东南特委宣传部长、中共广州地下特派员、城市工委书记、广州市

委书记处书记、市监委书记、副市长。打成地方主义份子后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送机器厂车间劳动，文革中被批斗二百多场；王伯群河北人，抗战时期入党。北方南下的外来干部照样也可能打成地方主义份子。

此外，广东省划为地方主义右派份子的还有中共港澳工委宣传处长麦素君、广州市副市长俞美庆、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侨务办公室主任谢创、广州市财贸办公室主任古念良等人。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临近南洋。珠江三角洲的人口一半以上有亲戚朋友在海外谋生，与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叶剑英提出『广东土改特殊论』。批倒批臭地方主义后，土改、镇反、肃反贯彻毛泽东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侵犯华侨利益，随意分配华侨的房屋、土地、浮财，关杀华侨家属，造成严重后果。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省党内反右派运动的主要重点是反地方主义，把一万多名地方主义份子划为右派，造成广东省干部队伍的巨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勳和任仲夷先后调去广东主政。他们在胡耀邦积极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平反了二次反地方主义大冤案。任仲夷曾说，今后不能再出现反地方主义这样的事情了。可是一党专政体制不改，谁敢保证不犯前愆呢？

二，甘肃省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

一九五八年二月，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曹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在筹建中，孙殿才是副省长、省委常委，陈仁义是副省长，梁大钧是中共银川地委第一书记、省委委员，曹又参是银川专员公署专员。他们大多是地下党出身的回族地方干部。

孙殿才（1905-1975）是回族，宁夏彭恩堡新营子人。农民家庭出身。一九二四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兰州共和中学和甘肃第五中学读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共青团。一九三〇年考进北平弘达学院，同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共后，投身地下工人运动，担任北平市工会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长。发动电车、人力车、掏粪工人大罢工，在工人中建立工会和中共组织。不久以后去天津，担任天津市工会组织部长，组织领导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

一九三三年起奔赴华北地区参加抗战，仍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察哈尔省总工会和张家口总工会组织部长，组建平绥铁路工会，同年调任张家口同盟军军部党支部书记兼前委巡视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师政治部政训员。后来在上海担任上海市总工会执行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上海市工人联合会书记、淞沪工人抗日别动队第五支队特支书记等职。

抗战后期，回宁夏地区出任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长、中共宁绥工委副书记，率领回民支队。一九四七年改编为中共正规军，他任司令员。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进驻接管银川。后任中共宁夏省委常委、宁夏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白区搞地下党的身份使他不能担任正职。

一九五四年，中共决定撤销宁夏省建制，设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由甘肃省兼管。孙殿才调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甘肃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在筹组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时，与省委第一书记在民族政策上发生分歧。他是回民，比较维护回族利益。整风鸣放时他在党内提出了意见。

毛泽东巡视到兰州，听到了第一书记张仲良的汇报，武断地把对於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策有不同意见的回族干部孙殿才、陈仁义、梁大钧、曹又参等人打成『孙陈梁曹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继而打击了一大批宁夏回族少数民族干部，中共党员、银川市长马立凯和二位副市长均被划为极右份子、右派和内控右派，银川专署和银川市的党政领导几乎一网打尽。回民们说，共产党打自己人和回民，比打日本鬼子还要狠。

此外还有甘肃省政府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党政干部会议上杀气腾腾地说：『对党内右派，不论他的资格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的政治资本。』邓小平这番话便是针对孙殿才他们说的。

甘肃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老革命根据地。中共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於中共八大三中二次全会上发言说：『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孙、陈、梁、曹为首的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反右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斗争

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张仲良在会上增补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甘肃省当时人口一千二百万，佔全国人口五分之一，揪出右派五万多人，佔全国右派十分之一。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劳教营就在甘肃省。甘肃省的反右派运动伟大成就便是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

三，廣西僮族自治區反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鬥爭

一九五八年初夏，全国反右派运动已接近尾声，『唯有广西的反右派还在升级』。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一届三次大会继续批判『陈再励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宣佈开除省委常委兼广西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再励、区党委组织部长王梦周、宣传部长骆明、文教部长王浩、财贸部长廖原、兵役局长廖联原（僮族）等人党籍，戴上地方主义右派份子帽子。中共一个省、自治区级党委，八位部长中有六位划为右派，这在全党是绝无仅有的。

一九二九年便加入中共的广西僮族自治区副主席黄荣（僮族）是少数民族中少有的二十年代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他成为他们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黑后台』，划为内控右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广西民政厅长、桂林专员公署专员陈峰也一起受到批判处分。

陳再勵（1887-1975）出生於湖南平江市安定鎮一戶貧苦家庭，少年時當過童工。一九二五年入團，次年入黨。早年領導工人運動，帶領造紙工人參加游擊隊和秋收起義。後來長期在新四軍擔任領導工作。一九四九年進軍湖南，擔任湖南省政府民政廳長。建立廣西僮族自治區後調入廣西任自

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陈再励与王梦周、骆明、王浩、廖原、廖联原等人在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精神，帮助区党委总结和分析工作中的错误，对贯彻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山区生产建设等问题，提出正确的批评和合理的建议，被诬为『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情绪』，来攻击党的民族政策，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民族人民大团结，扣上种种莫须有的大帽子。

毛泽东巡游到南宁时，当他听罢汇报说，陈再励还支持广西僮族自治区副检察长徐江萍的观点，认为『肃反没有必要，肃反中冤案、错案佔50%』，被指控为『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时，不禁大为震怒，立即宣布同意自治区党委的意见，将陈再励和支持他的部长打为『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举行的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一届三次代表大会上，陈再励等人被划为『陈王骆王廖廖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反党右派集团』，受到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支持他们观点的黄荣、区镇、陈岸等人打为黑后台，一併受到处分。受牵连者达一千多人。

有人问王梦周有何感想，他坦然回答道：『一位副省长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省委八位部长中有六位部长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成员和右派份子，其中四位部长被开除党籍，一位部长受留党察看处分，另一位部长被撤销职务，在省委内部处分这么多领导干部，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在全国各省市

反右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斗争

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至於对我个人的处分，我的态度是，服从组织，意见保留。我深信历史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给我们作出正确的评价。』

2009年12月

九、軍隊裏的反右派運動

反右运动在中共党内是清党，在中共的军队内便是清军。如同中共党内一样，毛泽东藉助反右运动之机，关起门来清理军队的门户，谓『关门打狗』。当时社会上的鸣放之风也吹进了部队大院和军事机关。在总政、总参、总后、总装等四总部，海军、空军、一炮、二炮、装甲、工程等各军种司令部以及十大军区机关内部纷纷贴出大字报，批评领导作风和工作中的缺点。

比之社会上的鸣放，部队内部的鸣放比较和风细雨，也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药味。这是因为部队官兵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政治审查的党团员，而且纪律严明。中央军委有条纪律，部队鸣放不要走向社会。可是部队的鸣放虽然和风细雨，反起右派来却是急风暴雨，对军内右派的处置也比社会上更加严厉。

除掉按照毛泽东香花毒草六条标准套出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军事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右派份子外，军队上层的反右主要是同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教条主义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他说：『现在军事院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外国的「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都有，却不讲。』又点名批判萧克上将道：『萧克

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上将这个人很坏，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毛泽东蓄意挑起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綫

一九五八年五月至八月，正值反右补课运动的高潮期间，毛泽东借口吸取苏联朱可夫元帅事件的教训，反对军队内的宗派活动，授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大将领导军队上层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教条主义运动。先从批判总参谋长粟裕开始，矛头渐渐指向刘伯承元帅和萧克上将。随着运动的深入，揪出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位上将为反党份子；株连批斗了李钟奇、吴伟、赵陵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弟、王时彦等诸将领。

萧克在若干年后写的回忆文章指出，一九五八年军内第一次大批判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给军事训练和院校教学遭受极大危害。也开创了军内大批判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

当时打击的矛头对准刘伯承、萧克和李达三人。刘伯承元帅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兼最高军事学院院长和政委，萧克上将、李达上将任副部长。但是毛泽东这次很奇怪，定下调子后自己袖手旁观，不插手不过问。让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元帅主持五八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师一级。在一个多月中大会议小会斗，把年老体衰的刘伯承元帅批进了医院，斗得萧克上将咯血。从此全军战战兢兢，噤若寒蝉。

批斗的结果，毛泽东撤销了训练总监部，缩编为总参军

训部，解散军事条令部，萧克为刘伯承受过，调离军界，降为王震手下的农垦部副部长。立下『解放西南第一功』的起义将领刘宗宽中将亦代刘伯承元帅受过，蔡铁根大校为萧克顶罪，他们及他们以下一百多位中下级军官统统划为右派份子和混入军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开除党籍，逐出军队，监督劳动。

在反右补课阶段受牵连的除刘伯承元帅和萧克上将外，尚有五位上将。他们是李达上将，批斗后被免职；周仕弟上将，降为空军副司令员；郭天民上将调军队院校赋闲；彭绍辉上将去总参『帮助工作』。只有张宗逊上将因反戈一击有功反而升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

老红军蔡铁根大校惨遭枪决

蔡铁根（1911-1970）河北省蔚县塔头村人，出身微寒，曾就读厦门大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参加工农红军，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作战勇猛，曾隻身深入敌阵。虏敌无数，多次立功受奖。他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当过秘书，又是朱德老部下、刘伯承的爱将。中共建国后，获大校军衔；行政十一级。起初担任刘伯承为部长、萧克为副部长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后调入南京最高军事学院任作战训练部长、战史教授会主任、学术史教授会副主席。

运动开始，刘伯承住院治疗。他年老体衰，作战时打瞎了一隻眼，另一隻眼也几乎失明。陈毅闻讯去医院探望，忿然不平地对他说：『你有什么好检讨的，要检讨写一百多个字就够了。我来替你写』。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刘伯承批判大会上，刘伯承的检查被与会的一千多位将军三次鼓掌

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打断，离场时全体起立欢送。主持会议的彭德怀气不打一处来。他召来几百位大校、上校，以增加批斗会的火药味。

蔡铁根亦受到邀请。那时批判刘伯承负责制订的《共同条令》是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产物、修正主义大毒草，反对毛泽东的革命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蔡铁根个性倔强，不畏强暴。在会上挺身而出。为刘伯承、萧克、李达辩护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学习苏联建军经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一定要先学……』



蔡鐵根大校

话音未落，彭德怀恼羞成怒，一拍桌子，令人把蔡铁根揪上台来。当场撕去领章帽徽，让其他军官对他拳打脚踢，撕烂他的军服。他顿时成为刘、萧、李的替死鬼。会后又为他举办了无数次大小批斗会，由於军内反右补课尚未结束，他遂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开除军籍、党籍，行政降为十五级，下放到江苏省常州市工业局当一名有名无实的巡视员。实际上是个有职无权、相当於科级的闲职，把他挂了起来。

妻子不明真相，受不了刺激同他离婚，抛下三个孩子离家出走。他怀抱六个月的小儿子、手挽二岁女儿、背跟三岁大儿子牵着他衣服，去常州报到，景况凄惨。他心情郁闷，喜欢喝酒发牢骚。文革开始，被人检举揭发，上纲上线，变

成反革命言论。游览宜兴善卷洞时，出於军人本性，说了句『此地适於打游击』。便成为『要进行反革命暴乱』。红卫兵抄家，搜出四十多本日记和缴获的日本指挥刀，统通成为反革命罪证，当作定罪依据。

以造反派为主的常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蔡铁根专案办公室》，逮捕了他和与他接近的一百多人。他在狱中表示极大愤慨，三次绝食，三次越狱。抓回以后，上脚镣戴手拷，共产党的监狱比他以前坐过的国民党和日伪的监狱更要黑暗。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未经审判便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连他的逮捕证都是事后补发的。临刑前他悲愤地仰天长叹：『这椿冤案总有昭雪平反的一天』。

可怜他三个孩子成了孤儿，最大的才十岁。丧心病狂的公检法，还向孩子们索取子弹费。孩子们付不出，叫邻居代他们写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孩子代父申冤，告状告到北京。最后通过陈沂—黄克诚—胡耀邦这条线，才取得一张改正通知书。

軍中右派知多少

军队内部究竟划了多少右派，中共至今没有解密。根据知情者的统计，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中，全军揪出右派份子、中右份子（内控）以及反党份子、反军份子共达三万多人。仅海军至少有八千多名。全国尉级军官打成右派约一万多人，是军队右派的主力。军事院校也是反右派运动中的重灾区，许多师生遭殃。

军队右派佔当年全军人数不到百分之二，但佔全军知识份子中的比例则高过百分之五。因为中共军队几百万官兵大

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部分出身於农民，文盲和半文盲佔有大多数。军队右派大多数出身於军事院校和大专院校，或者是起义人员，他们思想活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同於工农出身的军人。军方右派大多数同时是党团员，因此他们在党内右派中也佔有相当比例。

军队右派的改造不同於地方，一般都集中在几个军垦农场，进行集群式的劳动教养。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军委各部委、各军种中，有大批右派份子被送往北大荒八五〇军垦农场监督劳动，不少人长眠於此。据八五〇农场史记载，在送来劳改的九百二十五名右派中，其中军队有一百四十五名。

另一个集中之地是山西省中部太谷县郭堡水库。一九五八年反右运动刚结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要求国防部长彭德怀，请部队派技术力量支持地方，协助建设郭堡水库。部队一时没有转业干部，彭德怀便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单位和军事院校三百二十名右派编队送往山西太谷。

三百二十名右派分编为三个『锻炼大队』：第一大队由海军直属机关、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驻山西第十、十二航校和山西军区的右派份子组成；第二大队由空军直属机关的右派份子组成，空军的技术含量最高，知识份子集中，右派自然最多；第三大队由总政、总参、总后、军委直属五院和防化兵学校组成。在三百二十名右派中，有党员九十二人，团员一百三十五人。有八路军、新四军的老战士，有的刚从朝鲜战场带着硝烟归来，有留苏学成归国的海归派，有飞机制造工程师，有坦克手、战斗机驾驶员、战斗英雄、立功受奖者。军队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这些军中右派原来都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后筛选出来的精英。

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岁月，他们也像社会上的右派份子一样，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文化教员徐中行、刘惠民是最早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大炼钢铁修建小高炉时，弧形砖砸碎多了，诬蔑他们搞阶级破坏，把他们批斗后立即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进监狱。徐中行冤死狱中；佟惠林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跳进自己建造的水库自尽；帅学立身无分文，贫病交迫，身上缚着石头投河自杀；陈挺少校和张英敏少尉的右派帽子戴上又摘，摘掉又戴，先后戴帽三次。他们之中年龄最大、军衔最高的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周宏达中校。

三戴右派桂冠的张英敏少尉曾任空军司令部情报处侦察参谋。经过二十二年的苦难，他作诗自嘲：

荒唐年代競荒唐 辛酸往事倍辛酸
 咒念金箍是真理 恩蒙三次賜桂冠
 二十二年數日過 五十五萬皆凄然
 今古奇觀幸際會 留得餘生苦笑談

军事院校的知识份子集中，是军队反右重灾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较为典型，共揪出右派份子一百五十七人，其中极右份子二十名，一般右派份子一百三十七人，佔全院师生员工总数 16%；教师三十六名；内有讲师以上高级知识份子十四名，佔全体教师 37%；教学辅助人员十一名，佔教辅人员 16%；机关干部三十三名，佔机关干部 23%；学员七十六名，佔学员总数 12%。军事院校划右派的比例虽然低於地方，但处罚严过地方。哈军工一百五十七名右派份子，均受撤职、开除军籍、党籍、团籍、学籍、剥夺军衔等一系列处罚。军中右派份子另一个与地方右派的不同之处是，军中右派必须经过军事法庭审判，方始戴上右派帽子。

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將軍右派份子剖析

毛泽东借助反右之风，在党内军内进行清党清军，党内清出一批省部级以上高干，军队中则清出一批将军。在中将中有郭汝瑰、刘宗宽、童陆生；少将中有陈沂、范明。至於校、尉级军官就不计其数了。

童陆生中将因为其土改时划为地主的母亲治丧，並在家乡建立一座用他母亲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丧失革命立场，戴上阶级異己份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帽子，按右派处理，开除党籍，逐出军队。陈沂、范明、童陆生、蔡铁根都是二十、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老红军。

原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1912-2002）在反右运动时是出名的左派将军。他本来是总政治部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早先对双百方针表示異议。毛泽东批评他『不让人说话是专制主义』，三次点名说他『左倾』。他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某些部队文艺工作者攻击他是毛泽东的『御林军』和教条主义者。

反右运动中某天在天桥剧场，观看西伯利亚芭蕾舞团演出。陈沂看见毛泽东坐在前排。幕间，毛泽东主动来找陈沂，拉着陈沂的手笑呵呵地说：『你翻身了』。陈沂听不明白，毛泽东又说：『这些时右派攻得你好苦呀。毒草总是要出来的。』



陳沂少將

不要怕，出来就锄嘛！』陈沂恍然大悟，忙说：『是主席的六条标准保证了我翻身』。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左派怎么会变成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右派呢？原来他划右派另有奚巧。

按照毛泽东香花毒草六条标准推而广之，平头百姓顶撞基层党支部书记算作反党，小领导顶撞大领导也是反党，少将顶撞大将更是反党。他的顶头上司是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两人个性强硬，钉头碰铁头，工作中常发生龃龉，谭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既然成心打击报复，在说话文章中找几个岔子，不过易如反掌。此人在右派改正后复出，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仍然一身左气。

另一位右派将军是人称『六多将军』的范明少将。所谓『六多』是『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福多寿』。范明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出生於西北『三秦』中秦的一个耕读世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略通医术；善写诗词文章。早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长期从事兵变工作。调入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后，担任政治部秘书和联络部长，很为彭德怀欣赏，夸他为『军中儒林』。中共建政后，担任第一支进藏部队，即十八军独立支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等要职。

在西藏军区的反右整风运动中，范明突然为他写的小说《新西游记》被连续批斗一百多天，大会批、小会斗。上面有人指他的小说是反党纲领、大毒草。军区内部揪出一个『范明右派反党集团』。成员有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长白云峰和共青团西藏工委书记、范明妻子彭枫等人。随范明进军西藏的六百多名干部都受株连整肃。他本人则戴上『极右份子』

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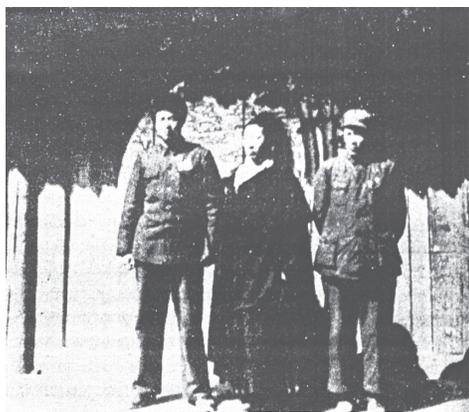
和『反党集团头子』二顶帽子。开除党籍、军籍，发配东北长白山和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

据一位十八军的离休干部说，范明划为极右份子的真正原因，是他对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有不同看法，比较偏袒班禅，批评过平叛军事行动。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幕使人吃惊。那天在会场上，刚复出不久的范明与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两人抱头痛哭，泣不成声。引起众人诧异，轰动政协会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冤案又波及到他。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一次小组会上发言，批评小资

产阶级狂热性，谈到反右扩大化。他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范明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像他这样的好同志，也打成了右派，那我彭德怀不就是老右派了。』过不了几天，毛泽东果真把彭德怀打成老右派、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头子。

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有人写信举报范明与彭德怀的不正常关系。范明在历史上与彭德怀勾勾搭搭，彭德怀授意范明写反党小说《新西游记》，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彭德怀份子和『黑干将』。毛泽东读信后十分恼怒。



范明少将（左）任中央驻班禅（中）
行辕首席代表

亲笔作了批示：『范明的《新西游记》看了，利用小说反党又是一大发明。彭德怀的万言书，范明的万言申诉书，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范明的裴多菲俱乐部，不谋而合。这样严重的事件如果不严加处理，就会出现纳吉事件。』

一九六二年，仅仅自由了半个月的范明，又与白云峰一起被抓捕起来，投进监狱，不久转入北京秦城监狱，前后坐牢二十二年。出狱后看破红尘，回老家陕西，一心从事中医事业。这便是范明从将军到中医的不平凡经历。幸而晚年还过得不错，九十六高龄，多福多寿。

解放军中还有几位『零类』将军右派，刘宗宽中将、郭汝瑰中中将者便是。刘宗宽中将（1905-1992）陕西浦城人士，黄浦三期和陆军大学毕业。在杨虎城的西北军中，由士兵到将军，一生中三次被捕、二次判处死刑。他追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将军，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国共内战时期，他明为国民政府西南长官公署参谋长，暗地里是受吴玉章领导的卧底共谍，为『解放大西北』提供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



重庆易帜前夕，他送出最后一份情报后，杜圭（土家族）原西藏军区军官，右派份子

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这位西南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悄然失踪，潜入共区。刘伯承、邓小平高度评价他的功绩，誉他立下『解放西南第一功』。周恩来说他的作用抵得上一个师、一个军。他后来被委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中将高级参议。

刘伯承创建南京最高军事学院时，聘请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富有实践经验的刘宗宽中将参加建校工作，担任高级教授。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时，毛泽东不敢动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便拿一大批军官开刀。刘宗宽中将是起义将领，又是民主党派的头目，自然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吹鼓手。因此他成为刘伯承元帅的替罪羊，成为军中军衔最高的右派份子之一。

另一位与他军衔相当的军内右派是郭汝瑰中将（1907-1992），四川铜梁人，出身书香门弟，黄埔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郭汝瑰与刘斐是埋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最大卧底共谍。国军的作战计划尚未下达到军一级，已经出现在毛泽东的案头了。在他担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期间，为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军的惨败立下了汗马功劳。完成任务后又率部在宜宾起义，打断了国军西南防线。

周恩来夸奖他所起的作用不亚於十万雄兵。他与刘宗宽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人的政治身份。刘宗宽是民主人士，反右中当然是整肃对象，划为右派毫不足怪；但郭汝瑰是中共自己人，早年加入中共，后转为中共特别党员，是中共最隐秘的特种部队，反右时照样难逃与刘宗宽同样的覆没命运。

郭汝瑰、刘斐都是蒋介石信用的重臣。但是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重用他们的曹营效力，却为轻视他们的汉寨献身。郭汝瑰反水归队后，成为受冷遇和歧视的弃臣，

军衔由将军降为校官。在反右前的鸣放中，他倾吐了积怨和愤懑道：『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才能巩固政权几百年。我们要力争民主法治，才能长治久安。』

因为这么几句肺腑之言，他被打为右派，开除军籍党籍，发配农场劳动。文革中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拖出来抄家游街、批斗拷打。直到一九八〇年，他所在的重庆警备区党委才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准许他恢复党籍，重新授予中将军衔，『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在一九九七年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中央军委才称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顺便提一下，国军中有六位上将起义投奔中共后，在一九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中了阳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他们是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黄琪翔、罗翼群、冯钦哉。黄绍竑上将在文革中刎颈自杀。起义投诚划为右派的中将、少将更不计其数，如河南省副省长张軫（中将）、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中将）、四川省副省长罗忠信（中将）、韶关地区副专员沈秉强（中将）、王大中（少将）等人。

中共掌权后，毛泽东对军队的清洗工作由反右派运动开始。一年后的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与张闻天、周小舟一起，划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文革前后遭清洗的将帅有罗瑞卿大将、肖劲光大将、陶勇中将（自杀）、吴瑞林中将（自杀）、赵启民中将、张学思少将（张学良弟）、贺龙元帅、杨（尚武）余（立金）傅（崇碧）、四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二李

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李富春、李先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最后还有林彪元帅。

不同於地方的軍中右派

军队内校、尉级军官右派的遭遇，要比将军右派悲惨得多。其残酷惨烈程度，在上文叙述的蔡铁根大校经历中已可窥豹一斑。在众多的校尉级右派军官中，我们不能忘记杨应森中尉。杨应森中尉(1931-1964)四川岳州人，出身贫农。一九五〇年辍学参军，在军中加入中共。不久报名参加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作战，立有战功，练就一手好枪法。返回成都军区后，在泸州步兵学校当中尉射击教官。

一九五七年军队院校开展整风鸣放运动，他向军队领导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鸣放会上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建议，反对『党指挥枪』论。『党指挥枪』是中共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岂容你小小中尉反对。他被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军籍党籍，判处劳动教养。先被押送到四川省公安厅所属四川新胜劳改茶场，后转移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的四一五筑路支队一〇八中队继续劳动教养。

四一五筑路支队宛如一架绞肉机。在一九五八年专门为右派成立时有一万多人，待到文革前夕解散时，剩下不到一半。另一半枪毙、饿死、累死、病死、逃亡、工伤。杨应森是枪毙的。判刑的劳改犯有刑期，劳教的右派无期限。劳教中工余饭后，有时摆摆龙门阵，发发牢骚。有一位姚姓右派立功心切，汇报上去，党的告密文化发酵膨胀，无中生有，小事夸大。牢骚怪话变成反革命言论，进而演绎为成立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惊天大案惊动了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中央文革，一举逮捕二百多人，九十六人枪毙、判刑。为首的周居正（中共党员、红岩英雄）、杨应森等七个重刑犯，戴上手铐脚镣，刑讯逼供。周居正、杨应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临刑前，他戴上洗得发白的军帽，挺直腰板，拖着沉重的脚镣，背铐双手，仰首阔步走向刑场。共产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子弟兵。《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直到今天还没有平反昭雪。

另一位不能忘记的军中右派是邵喜德少校。邵喜德（1927-2003）蒙古族人，原名乌云达赉。出身贫苦，从小过继给姑父，改姓邵。十八岁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十九岁加入中共。经历大小战役二百多次，负伤二十多次。策马冲锋，屡建奇功，多次获得特等功和战斗英雄称号。由士兵升至团参谋长，最后任内蒙古军区骑兵师副团长。

一九五〇年北京举行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全国第一届英模大会。主席台上坐在毛泽东和朱德中间的是蒙古族骑兵特级战斗英雄邵喜德。他的英雄业绩感动了大画家徐悲鸿。擅长画马的徐悲鸿化了几天时间为邵喜德画了好几幅画。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全国英模大会后，邵喜德名扬天下，前程似锦。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他正在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深造。邵喜德生性耿直，敢说敢言，具有成吉思汗后代的刚烈性格。他常常瞧不起不了解中国国情又指手画脚的苏联军事顾问教官，爱给他们提意见，时有顶撞。那时一边倒倒向苏联，反苏就是反党。他的言行套进毛泽东香花毒草六条标准。批判几次，批他居功自恃，拒绝帮助，态度恶劣，前功一笔勾销。

军队里的反右派运动



徐悲鴻未完成遺作「全國特級騎兵戰鬥英雄邵喜德少校(蒙族)」。邵喜德劃右後，此畫不準展出至今。本圖由徐悲鴻紀念館提供。

划为右派份子，开除学籍、军籍、党籍，逐出军队，发配军垦农场养马，干了二十多年重体力劳动。

徐悲鸿画的特级战斗英雄邵喜德的油画，因而未能完成，变成『未完成作品』，束之高阁，打入另册，不准展出。邵喜德经常手捧徐悲鸿画的『未完成』画像，泪流满面地说：『我是稀里糊涂当上右派的呀！』二〇〇三年病逝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发来唁电：

『今悉邵喜德同志病逝，他的英雄事迹长留人间。徐悲鸿先生的「未完成作品」不仅是徐悲鸿的笔墨丹青，还记录了邵喜德同志的人生遭遇。』

反右派运动证明。共产党的钢铁长城并非铁板一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虽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历届领导，千方百计试图修复破碎的长城，但已无济於事。保卫独裁政权的钢铁长城，亦可能成为埋葬独裁政权的残垣破壁。

2010年3月

十、民主黨派中的第五縱隊 ——中共特別黨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大典前夕，周恩來、潘漢年、喬冠華把集中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送往北平，組建八大民主黨派和參加新政協。

中共讓出中央政府六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宋慶齡、張瀾、李濟深），政務院四位副總理中的二位（龍雲、黃炎培），以及司法（沙千里）、教育（張奚若）、文化（沈雁冰）、糧食（章乃器）、交通（章伯鈞）、轻工（黃炎培兼）、郵電（朱學范）、水利（傅作義）、森林（羅隆基）、水產（許德珩）等非害部門的部長，先後讓給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另有更多的非黨人士擔任副部長和副省長，擺出一副共同執政的態勢。雖然章伯鈞說：『民主人士擔任部長是形同虛設。』但是無論如何，聊勝於無。

毛澤東整肅民主黨派的理論基礎

中共官方和御用學者解釋說，中共一貫把民主黨派當作盟友和諍友。反右運動緣起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毛澤東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訓。事實並非如此，毛澤東出於農民意

民主党派中的第五纵队——中共特别党员

识和早年遭遇，以及接受的封建诗礼教育，对知识份子，或确切地说对中产阶级，充满仇恨。《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已经经过大量修改，与原文面目全非。

一九二五年在《革命》半月刊等杂志和广州、汕头出版的单行本发表的原文中，毛泽东把中国各色人等分为五等：



1946年國共談判失敗民盟送別中共代表團左起：周恩來、鄧穎超、羅隆基、李維漢、張申府、沈鈞儒等

大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半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原文中进一步阐明大资产阶级系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

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为了对付主要的敌人国民政府，夺取全国政权，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军，建立了一条统一战线。当时凡是反蒋人士，包括汉奸、土匪、流氓以及乱七八糟的狐群狗党都是中共的争取和团结的对象，中共自诩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但是毛泽东早就暗藏杀机。一旦团结和利用的民主人士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们便成为中共的主要敌人了。毛泽东在

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告诫全党：『开国以后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他在审阅修改一份指示《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加进一句批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稿时，还加进了这么一句话：『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棄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直到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中共在这十年里，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精神来处理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的關係的。开始是一个一个或一步一步地抛棄，例如胡风、张东荪、周鲸文、俞平伯等人。到了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大搞『阳谋』。毛泽东懒於用手工作业方式逐个处理，干脆用爆破作业一举炸掉。把所有民主党派及其头面人物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乾淨彻底地抛棄了，成为共产党清一色的『党天下』。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将民盟、民革为首的民主党派树为主要敌人的指导思想，还可以在《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电报全文》中找到佐证。毛泽东向斯大林

通报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形势后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中共党史研究》2002 第一期）

从上述指示和电报中毛泽东那些决策性的话里，不难发现，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就要让他的民主党派盟友滚蛋，退出政治舞台。这也是他一贯仇视知识份子和中产阶级思想所促成的。之所以没有马上动手，应当归功于斯大林。

斯大林在复电中当即表示异议：『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毛泽东屈从于斯大林的指示，一等等了整整十年才开始动手。一九五七年三月鸣放高潮中，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两次谈及知识份子属性问题。一次同文艺界代表谈话，他说：『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看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又说：『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他的利益来教育人的。』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覆了他的观点：『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份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

把知识份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等于划为社会主义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毛泽东为知识份子和中产阶级定了性，也就是为整肃知识份子的反右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御用学者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和匈牙利事件当作毛泽东搞『阳谋』的起因，那是一种误导。这两件事仅仅是

毛泽东藉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而已。



胡風（中）聶紺弩和蕭軍（左）

在毛泽东取得政权，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中共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孤立和打击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及

其代表民主党派，走向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的呢？毛泽东用了三个绝招。第一招，打进来，拉出去，掺沙子；第二招引蛇出洞，大搞『阳谋』；第三招强令民主党派全面退出政坛。

第一招：中共特别黨員——打進去、拉出來、掺沙子

打进去、拉出来、掺沙子是中共最擅长使用的分化瓦解敌人的法宝。用这个法宝赢得了延安保卫战，取得了辽瀋、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把国民政府赶下大海。这便是一支称作『中共特别党员』的第五纵队所起的作用。自中共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最高层就直接发展和指挥了一批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具有特殊身份的特别党员，钻进对手的内心，纵横捭阖，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民主党派中的第五纵队——中共特别党员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某日的《北京日报》第十六版《理论周刊——文史》上，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研究馆员叶成林的文章《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特别党员》。此文披露了中共夺取与巩固政权的一支秘密部队的情况，澄清了外界的某些猜测。

文章说，按照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一九三八年於中共六届六中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解释，『凡党员处於特别地位，而不过党的一般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党员通常具有特殊社会身份，如国民政府官吏、国军将领、大资本家、社会名流、党派社团领袖，甚至黑道头面人物，以及与这些人有联係者。

特别党员特别管理。他们的入党介绍人或由公开身份转入地下状态的牵线人，由中共各级领导亲自负责。周恩来及其领导的统战、情报部门是掌控特别党员的主要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当由适当的高级党委直接管理。』通常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二是由较高级负责人与之个别联係並进行教育。採用这种管理办法主要为了保密，不仅对党外保密，党内也保密。只有极少数知情人知道，处於绝对秘密状态。

人们通常對於地下党员、秘密党员和特别党员三种概念混淆不清，往往把前二者混同於后者。其区别在於，前二者不论如何处於地下秘密状态，均需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后者不受限制，只向个别领导人负责。中共最早的特别党员是李大钊和罗章龙在一九二五年发展的邵飘萍；周恩来在一九二九年发展的、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

和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胡愈之。

中共特别党员除了在军事、谍报、政府机构内部起过重大作用，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以外，也是中共对付民主党派、宗教界、工商业界的杀手锏。在中国最大的两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和中国民主自由同盟（民盟）中，民革元老何香凝是中共早期特别党员；民革主席李济深的机要秘书和副主席朱蕴山也都是中共特别党员；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反右领导人王昆仑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的特别党员，曾为中共特工头子李克农提供情报；中共利用民革前副主席兼秘书长黄绍竑喜好女色的特点，派遣中共特别党员葛琴（女）到他身边担任秘书，当作卧底，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名记者范长江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特别党员。

在民盟，一九二六年已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的杨明轩在反右斗争后接替章伯钧、罗隆基成为民盟副主席，民盟主席沈钧儒故世后他又成了民盟主席；沈钧儒的机要秘书和民盟副主席闵刚侯也是中共特别党员；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中共通过这些特别党员，非但控制了最大的两个民主党派的反右派运动，而且在反右派运动后，完全取得了这两个民主党派的领导权，让他们俯首听命，彻彻底底成为中共的儿子党、花瓶党。

除掉打进来，还有拉出去。从民主党派中拉出去的有北京民盟主任吴晗。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就申请入党，周恩来要求他留在党外起更大作用。一九五七年三月入党后立即成为民盟反右积极分子；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曾鸣放出不少右派言论，毛泽东放他一马，许感激涕零，反戈一击，反右后摇身一变，成为特别党员，使高级知识份子集中的九三学社，

立即变成中共的另一个儿子党、花瓶党。

只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和中国致公党秘书长严希纯是二个例外。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台湾共产党，派当时在苏俄学习的谢雪红去日本会见日共主席渡边政之辅，请日共协助建立台共。一九二八年台共在上海成



臺灣二二八起義英雄謝雪紅

立，中共、朝共派人参加。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谢雪红等台共骨干逃沪，后潜至香港由中共安排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选谢雪红为主席，中共许诺台湾自治和普选。一九四九年中共拟攻台，内定粟裕为台湾省主席，推翻自治和普选承诺。反右时谢雪红重提此事，并对中共歧视台湾人的行为表

示不满，遂被打成右派。

严希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加入中共，为中共做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他按照中共指示，打入由爱国华侨、洪门大佬司徒美堂创建的中国致公党，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致公党以华侨为对象。严希纯在鸣放座谈会上，为民主人士的有职无权说了几句公道话，中共便认为他给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中央常委黄鼎臣的『致公党反党集团』『统战』过去了，也把他『打入』这个集团，视作共产党叛徒。

中共特别党员篡夺民主党派领导权，进而掌控民主党派的做法，遭到了民主人士强烈的不满和抵制，民革中央常委

陈铭枢说：『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的。』河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起义将领张轸就是被民革河南省主任委员、中共特别党员候建瀛揪出来戴上右派帽子的。

民主党派上自中央，下至基层支部，都安插有中共特别党员。文革中造反派乱斗一起，特别党员被迫纷纷浮出水面，人们大吃一惊，原来自己身边貌似落后、中不溜秋的中性人物居然是中共的密探、卧底。上海某设计院的民盟支部主任的中共特别党员身份便是在造反派抢人事档案时曝光的。

第二招，用『陽謀』怪招引蛇出洞

用『阳谋』怪招引蛇出洞，使民主党派右翼自行浮出水面，然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让民主党派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地作儿子党、花瓶党。毛泽东说过，凡是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远在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和各地地方党委的各级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早已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排好队了。其左翼自然是那些打进来的中共人士及他们的追随者，约佔百分之十；右翼多达百分之二、三十以上；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民主党派反右的目的，便是依靠左派，孤立打击右派，争取、分化、瓦解中间派，分出中左、中右和中中来。笔者五十年代在中共基层党委工作过，曾亲历这种秘密的排队工作。几个人关起门来，日日夜夜暗箱作业，谁知其中带有多少主观性、随意性，又有多少个人情绪呢。

反右开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關於反击右派份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早早定下调子：

民主党派中的第五纵队——中共特别党员

『各民主党派中，民盟、农工最坏。』，『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佔许多领导岗位。』同年八月在青岛举行的省委书记会议上又说：『民主党派打它百分之二十（右派），还有百分之八十（不是）。』反右派运动中，八大民主党派共揪出右派份子九千多人。

民盟的盟员人数最多，参政议政的意识最强。早在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又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区分。』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掌握政权以前，已对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定了性，为以后的整肃埋下伏笔。

十多年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民盟表现了参与国事的积极性。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民盟成员向中共提出许多善意的、积极的意见与建议。章、罗的『政治设计院』和『党要扩大，政要平权』，触怒了毛泽东。当年《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民主党派是反右派运动中的是重灾区，民盟则是重中之重。全盟共揪出右派份子五千一百七十三人，佔民盟总数百分之十五点六；民盟中央委员中右派六十一人，佔中委总数百分之三十三点六。上海民盟又是重中之重。一千五百多民盟成员中，揪出自主任沈志远、副主任陈仁炳、彭文应以下五百三十五人，佔三分之一；宁夏民盟四十五个支部中有三十三个支部的主任

委员是右派。民盟两位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被毛泽东御封为『右派总头目』，诬陷他们组织『章罗联盟』，其实两人毫不相干；曾昭掄、费孝通、叶笃义、钱端升、冯友兰、黄药眠等八位中央常务委员和钱伟长、徐铸成、浦熙修等十五名中央委员及更多的候补委员都划为右派。

民革副主席龙云、黄绍竑，中常委陈铭枢、谭惕吾、刘立明等被诬指组成『民革右派集团』；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右派头目是章乃器，他也是工商联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以主席章伯钧（兼）为首，有一个章、黄（琪翔，副主席）、李（伯球，副秘书长）、王（一帆，中央执行局委员）右派反党集团；九三学社的储安平已众所周知；中国致公党内有一个以陈其尤（主席）和严希纯（中共特别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中国民主促进会有个以副主席林汉达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则是以主席谢雪经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

在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张奚若、傅雷整得最惨；民革的谭惕吾、刘立明与民盟的浦熙修构成民主党派『三大反党女将』。以上这份名单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把民主党派的领导一网打尽。『枪打出头鸟』，打掉了敢说敢言的带头人，再换上清一色的中共特别党员当领导，民主党派等於形同虚设了。

因为早已有了内定右翼的名单，反右开始，不论你有没有中『阳谋』的圈套，千方百计要把『蛇』挖掘出来。民盟的潘光旦教授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中连续检讨十二次不过关。鸣放时咬紧牙关不开口。有人揭发说他曾经说过『社会学可以培养党政人才。』就此把他打成极右份子；周扬几次

民主党派中的第五纵队——中共特别党员

派汽车上门接吴祖光出来鸣放，新风霞叉手堵门不让他去。吴祖光禁不住诱惑，还是中了套。章伯钧、罗隆基俩人原本是冤家对头，毛泽东生拉硬扯来个『拉郎配』，屈打成招，硬生生把他们结成『章罗联盟』。

第三招，强令民主党派退出政坛

第三招，在反右后期，中共清理门户，撤销或免除了民主人士在政府中的职务，国家副主席和十二位副总理换上清一色的『自己人』中共党员。仅留下司法部长史良、文化部长沈雁冰和水利部长傅作义，用以点缀统一战线共同执政的门面。后来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特别党员。文革后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是解放前夕发展的中共特别党员。

以上是中央一级。在地方上亦复如是，本来形同摆设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省、市长，经过反右，把他们大多数打成右派，干脆连这种摆设也不需要了。例如河南省副省长张轸、王毅斋、刘积学；四川省副省长罗忠信；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鹗；天津市副市长毕鸣歧；广东省韶关地区副专员沈秉强；湛江地区副专员彭中英；海南地区副专员周铮；江苏省苏南行署副主任钱基厚（钱钟书之叔）及其儿子、无锡市副市长钱钟汉等人均是。

过了这三招，中国的民主党派从此一蹶不振，本来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不堪一击，乖乖地退居人大政协，甘当表决机器，服从老子党的统一领导。应了民盟中委周颖（女）的一句话：『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

加油。』她说了这么几句话，后来当然成为右派了。

罗隆基说过：『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然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眉毛，那副模样会是多么丑怪啊！

文革后在一九七九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不同意胡耀邦彻底平反反右派运动的意见，坚持只给『个别』右派份子改正。这个『个别』却是违反逻辑的99.99%。为了证明他邓小平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谬论，在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覆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从已划为右派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挑出最有影响的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右派覆查后，『拟予改正的二十二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再加上最大的学生右派林希翎。『不予改正』的理由是『顽固不化，死不认错。』他们都没有错，要认什么错呢？

在这五名不予改正的上层爱国人士右派中，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四人均属于民盟，彭、陈是上海民盟副主任，只有储安平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著名的『党天下』理论的倡导者。这份名单充分证明，民主党派中打击矛头主要是民盟。

社會矛盾是黨內矛盾的反映

一九六六年文革浩劫才刚开始，中国头号大右派、毛泽东捏造的『章罗联盟』首犯章伯钧便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的造反派《燎原队》隔离审查，关进牛棚。两名一班的造反

派日夜轮流看守，不离寸步。关押至一九六七年初，《燎原队》队长通知章伯钧的一位朋友阎秉华说『有个单位派人来调查章伯钧一件事，很重要。你与章伯钧熟悉，派你做记录，这样他可能少些顾虑。』

民盟中央东院会客室里，有三个人向章伯钧调查，阎秉华作记录。年纪较大一位对章伯钧说：『我们来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希望你讲真话。讲了实话，对你有好处，将会给你改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接着又说：『你的主要反动言论是主张在我国实行两院制。经我们查实，这话是刘少奇先讲的。刘少奇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一次国务会议上就曾提出在我国实行上、下两院制的主张了。你是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才提出来的。可见你那个两院制主张是从刘少奇那儿听到的。你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你只要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对你会有好处的。』

章伯钧沉默半晌，平静地说：『你们一定了解我的过去。我曾在外国留学多年，我对欧美国家的议会制和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得早，知道得多。解放前，我们搞民主运动，就有效法欧美国家，实行两院制的主张，拥护实施宪政的活动。我的这些所谓的政论、政见，在解放前是公开讲的，许多人都知道。说刘少奇是受我的影响还可能像一点儿。』章伯钧边说边笑，『至於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底在国务会议上讲没讲过在我国也实行两院制的话，我没有听到过，我不知道。我讲的两院制是我自己多年来的设想，与刘少奇无关。』

当他说到『与刘少奇无关』时，三个外调人员一齐吼叫起来，六隻眼睛盯视着他：『你不老实！难道你没有参加这次国务会议？你要讲老实话。讲老实话，对你有好处，否

则对你没好处。』

章伯钧沉思片刻，平静而严肃地说：『我正是凭良心，讲的是良心话。我在什么时候参加过哪一次会，或者没有参加过哪一次会，事隔十多年，我记不清了。但是，我没有听说过刘少奇讲实行两院制的话，这是事实。我的错误和罪行，是我自己的事，与刘少奇无关。』他正言厉色，毫无惧色。

外调人员气势汹汹，穷追猛打。章伯钧不为所动，或默不作声，或重覆已说过的话。纠缠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最后吩咐道：『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写份材料交给我们，对你有好处。你知道吗？你走吧。』根据这三个人的神气和说话语气，肯定有来头，阎秉华猜测，可能来自中央文革。

文革后上世纪八十年代，阎秉华写了份回忆这件事的文章《回忆章伯钧老先生在十年动乱时期一件感人的事》，托子女带给章夫人李健生审阅，当时章伯钧已故世。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秘书长萧瀚相访问阎秉华说：

『我看了你写的章伯钧先生应付中央专案组外调人员那件事的文章，是李健生同志让我看的。文章写得很好。李健生说确有其事。她还补充了一个情况。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的通知。就在章伯钧参加座谈会的那天凌晨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在解放前即与中共接近，支持中共。解放后一切听中共的。所以章在座谈会上按李维汉的意思讲了，原以为按中共的意思办事呢。』

至此阎秉华才理解当年章伯钧对付外调人员的异样表

民主党派中的第五纵队——中共特别党员

情。同时亦澄清了另一个疑问，即章伯钧为什么从来不曾
在民主党派内部会议上提起过两院制问题，却突然在中共中央
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提出来，遂演变成『政治设计院』，成
为中国右派三大理论之一。

这件事一方面说明章伯钧的高风亮节，明知刘少奇已作
为毛泽东头号敌人会被打倒，他也不愿投井下石，谋取自己
的好处，而勇於把责任承担下来；另一方面，这一鲜为人知
的事实也告诉人们一个铁定的规律，中国社会上发生的任何
事情，往往都是党内矛盾的反映。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只
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不变，将来亦是如此。

2007年4月21日

十一、宗教界和少數民族中的反右運動

共产党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毒害人们的精神鸦片。』这句话也便是中共對於宗教的态度。中国有五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经过镇反肃反、取缔反动道会门，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前夕，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统计，仅在上海尚有天主教徒十四万人、基督教徒十三万四千人、伊斯兰教徒五万人，佛教和道教难以统计，因为没有严密的组织。在一九五七年，虽遭屡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全国约六亿多人口中信教人数估计不下二亿多人，佔全国人口 1/3 左右。

無神論統治有神論

中共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便十分重视宗教问题。虽然《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在实际上，中共一贯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对宗教採取限制、改造直至达到消灭的政策。其具体措施是用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首先掌控各宗教的主权，让宗教成为中共的御用工具。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上海易帜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亲自发展荣毅仁和吴耀宗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四九年中共刚进城立足未稳，周恩来便数次找吴耀宗个别谈话，商量成立《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来取代同海外有联系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青年会、圣公会、长老会等基督教各个教派，吴耀宗自任主席。三自为『自治、自养、自传』。

《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时，拥有四十一万六千余基督教徒。经过镇反和肃反，据一百五十六种报刊和五十六种杂志的统计介绍，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三自》期间，有六万多名基督教徒遭监禁，其中有一万零六百九十人被处决。基督教三大巨人中的王明道成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於一九五五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基督教遂为吴耀宗和另二位特别党员李储文和丁光训所掌握。『红色牧师』李储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曝出身份，便去了香港当上中共新华社副主任。

共产党主张並宣传无神论，共产党员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一旦发现共产党员信教，立即开除党籍。然而中共为了控制宗教，不惜违背共产党的教义，把信仰宗教的宗教界亲共人士拉出来参加共产党；或者把中共党员派进去控制宗教。中共是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怕牺牲原则。

天主教隐藏了中共特别党员傅铁山。通过打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龚判无期徒刑），取缔『反动组织』天主教圣母军，成立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策划同梵帝冈彻底决裂，中共牢牢控制了天主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是中共特别党员；中国伊斯兰协会主席鲍尔汉也是中共特别党员。中共在各个宗教团体都安插『自己人』

去当领导。

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宗教界也有右派指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召集上海宗教界开会，讨论右派名额分配，结果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各三位、佛教四位、道教一位（实际三位），勉强完成上海宗教界的右派定额指标；西藏的藏传佛教和内蒙古的喇嘛教亦不能幸免。

成都市佛教协会奉市政府宗教处之命，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即中共国庆前夕召集各派宗教右派开座谈会，参加者二十五人，佛教有广续、佛定、圆照、解定以及崔亚汉、牛次封等十七人，道教四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各二人。座谈会为中共歌功颂德。右派广续和尚拍马屁道：『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么宽大，我想就是喂一条狗，见了主人都知道摇尾巴，所以我们今后要好好地改造。』自此以后，在神父主持弥撒、牧师佈道、和尚诗经、阿訇礼拜的时候，还必须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和中共政府的政策宣传。

基督教右派叫基督教徒自己揪

中共执掌政权不久，为了急於控制与西方教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基督教，把吴耀宗牧师『拉出去』，发展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可是中共觉得还不太放心，担心他势单力薄，替他物色了二位对中共俯首贴耳的助手，充当《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他们是陈崇桂牧师和刘良模牧师。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共认为他们两人的『使用期』已满，再无利用价值，便过河拆桥、弃之如敝屣，把他们划为右派份子。从此打入另册，永不翻身。

陳崇桂（1883-1963）是著名的基督教牧师和神学家，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为人慈祥善良，在中国教会和教徒中享有崇高威望。早年参加学生运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是基督教内亲共的左派。一九五七年响应中共号召，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保护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对他在巡视中发现的各地中共干部违反宗教政策的现象提出意见，遂与他的儿子、民盟上海副主任陈仁炳教



陳崇桂夫婦

授一起划为父子右派。时年七十四岁。

劉良模（1909-1988）又称『爱国宗教家』，曾任冯玉祥英文翻译。担任《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与另一位副主席陈崇桂一样，对中共言听计从，俯首听命。一九五七年在人大会议上，与其他六位宗教界代表作了一个联合发言，批评政府对宗教信仰有成见，在登记表格中把基督教划归『会道门和迷信团体』。他们几位人大代表统统划为右派。去掉两位副主席，吴耀宗成为光杆司令，从此以后变成孤家寡人。另一位副主席吴贻芳是个摆设。

反右派斗争中，基督教和天主教受到的打击最为深重，反抗也最惨烈。在反右斗争中，有一万多名教徒划为右派份子，仅判刑劳改劳教的教徒便有二千二百三十余人。中共将基督教的代表和头面人物集中到北京开会洗脑，互相揭批，

採用『关门打狗』的办法，隔绝联系。可惜效果并不理想。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四日，《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十次常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全国基督教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各地基督教代表一百三十多人参加。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严密监控下，举行了四十天的大小会议。

基督教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中国的基督教要不要摆脱中共控制？要不要做中共御用工具？大陆的基督教会要不要与国际基督教会接轨，恢复以前的关系？中共一贯把基督教与美帝国主义挂上钩。虽经镇反肃反等多次政治运动，基督教的上述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中共十分看重这次反右派斗争，无论如何要决出个胜负来。

会上揪出『披着宗教外衣』的右派份子刘龄九、周清泽、



劉良模(右1)和周恩來(右3)

董鸿恩、范爱侍、周庆福等五名牧师和神职人员，作为基督教反右派运动的启动和示范。会后要求把运动推向全国。

刘龄九是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秘书、基督教刊物《田家》半月刊主编。《田家》读者对象主要在农村，在农村教徒中有广泛性；周清泽是中华基督教厦门鼓浪屿教会牧师，不满中共严格操纵基督教的状况；中国佈道会上海教区基督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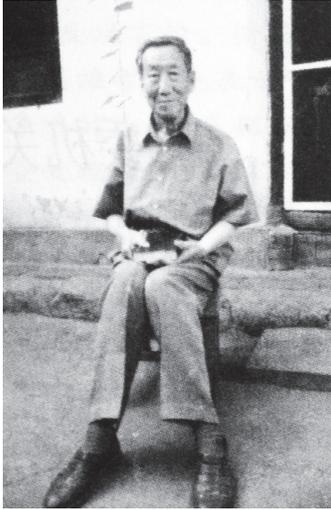
教会堂牧师董鸿恩仍然与美国佈道会总部有联系，当然要划为右派；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宁波教区主教范爱侍在讲道中公然议论匈牙利事件，指责苏联出兵干涉他国内政；身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上海灵粮堂长老周庆福在批判大会上跳出来直言不讳地说，政协和其他机构的反右座谈会都是『事先佈置的一套』，『简直像美国的表决机器』。

中共安插在基督教内部的打手们不会放弃中共惯用的『揭老底』的伎俩，刨根究底挖出个人历史上的陈年旧账，拿来作为攻击武器。把刘龄九等在基督教界享有一定威信和地位的神职人员批倒搞臭。像江苏省副省长、《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另一位副主席吴贻芳女士和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这样的头面人物，也站起来言不由衷地批判他们几句，以示站稳立场，划清界限。

吴耀宗牧师说：『基督教等於资本主义加帝国主义。』真是一副犹大的嘴脸！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乖巧地建议，宗教界的右派划分标准，除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报告中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以外，还要加上一条『爱国爱教』。

基督教和天主教一样，与海外的发达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反右中受害最深。划为右派份子的尚有广西灵山县警世堂牧师苏子英、为中共做了不少事人称『政治牧师』的张海松、天水一中数学老师、夹边沟幸存者和《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的作者李景沆、林昭同囚的难友俞以勤、拒读『毛主席语录』的吴维尊等人。北京市基督教社会主义学院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学习班上，一次性揪出四十五名右派份子。

不管你是教友或是神职人员，凡是不听中共指挥棒的，一律打成右派。摈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信上帝的林昭烈士在狱中写血书说：



虔誠的基督教教徒李景
沆，手捧聖經

『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信梵帝岡 不信共產黨

中共在天主教中反右的目标是让中国的天主教徒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服从中共一元化领导，摆脱与梵帝岡的联係。因此像基督教一样，在一九五七年七、八月间中共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策划了一个《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代表大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效果並不如预期那么理想，参加会议的神职人员绝大多数人都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天主教爱国会大多数代表虽经洗脑，仍旧选择『要梵帝岡不要共产党』。

河北省唐山、保定、沧州地区参加会议十人。经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洗脑』教育，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有二人。其他八人抗拒並反对中共御用的天主教爱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国会，进而公开煽动教徒、串联神职人员抗拒反右运动。另一教区的八位代表，只有五人表态拥护共产党。赵振亚主教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天主教天津教区主教赵振亚神甫（1903-1976）教名亚尔风稣，天津人士。天主教天津教区主教一职由罗马教庭直接任命，拥有教徒约十万人，因此中共十分注意要让『自己人』来控制这个教区。而赵振亚神甫在天津教区享有崇高威望，一时半天找不到合适人选替代他，只能想方设法把他拉拢过来，已经先让他当天津市人大代表。

赵振亚神甫代表天津教区参加北京举行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代表大会》。中共积极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表态与罗马教庭摆脱关系，脱离梵帝冈魔掌。赵振亚主教被迫在大会上几次发言，表示要与罗马教庭中断联系，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

基督教分为几个相互独立的教会。天主教则不然，全世界天主教徒都服膺於梵帝冈罗马教廷。天津教区信徒众多，在全国地位举足轻重。一旦天津教区带个头，听从中共，与梵帝冈一刀两断，不愁全国天主教徒不『爱国爱党』。为了巩固思想工作的成果，赵振亚一回到天津，天津人大秘书长便找他谈话，鼓励他坚



批鬥天主教修女

定立场。

赵当场表示『在北京受到很大教育』、『过去不敢碰梵蒂冈，现在问题解决了。』但他留下伏笔：『教徒不见得都听我的。估计有些人会骂我，但是我不在乎，我有信心。』

赵振亚神甫平时恪守本份，礼和谦让，十五岁起便受教会培养成长，怎能轻易叛教。其实他胸中早有成竹，准备在当年九月举行的有一千多名教徒参加的瞻礼仪式（圣母昇天）上采取行动。在瞻礼进行中，他不谈及梵蒂冈问题。待到做完弥撒，突然摆上麦克风，开门见山地说：『人有了罪就应该承认罪，有了错就应该改错。大家看了报纸，我在北京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回来以后，心里很不安。现在在上帝面前，在教徒面前，我承认错误。我不服从教宗是不对的，神甫和教众就不服从我了……。』最后他说：『请教友原谅我宽恕我，为我念经祈祷。』

主教公开在教徒面前承认错误，在天主教内叫『明补赎』，是一种处罚，需要由别的主教办『神功』，否则是自我『降罚』。因此中共怀疑他的变卦可能是同其他教区主教串联引起的。

中共恼羞成怒，给他戴上右派份子帽子，撤销人大代表。可是他那天津教区主教职位是由罗马教宗任命的，中共无可奈何。只好眼睁睁地看他继续主持弥撒。中共的绝对权力一时还无法超越上帝。

一九六三年天津教区信徒在中共干扰下自行选举主教。广大信徒不顾中共蛮横无理的干扰，仍然选举赵振亚为副主教，罗马教庭对他的任命，始终没有撤销过。以后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文革中，无神论的中共在教徒的心灵中从来没有战胜过上帝。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天主教打成右派的还有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聂国屏和常务委员高庆琛、教会领袖倪折声和四川攀枝花市李希孟神甫等人。

佛教道教的反右派運動

可能是因为吃素念经、静心寡慾的原故，高龄长寿的右派份子几乎都出自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

釋虛雲（1840--1959）是迄今为止有史可查的右派份子中最年长者，划右时已一百十八岁。俗家湖南湘乡，萧姓，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一八四〇年父玉堂为福建泉州府幕宾，为诞师於府署。少不茹葷，喜见三宝。一八五六年时年十七岁，父母强令成婚。一八五八年十九岁往福州鼓山涌泉寺依释常开削发，取法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后因同於鼓山大师法讳，故改为虚云。虚云法师一生跨越清朝、民国、共产三个历史朝代，从小和尚到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生坎坷，想不到以一百十九岁高龄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帽子驾鹤西去。

虚云法师在辛亥革命时拥护中山先生，与孙中山、梁启超各有赠匾。八年抗战反对日本侵略。他也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全国解放』。由於他在佛教界的崇高威望，於一九五三年被推举为中国佛协名誉会长。中共举他为国家级统战对象，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亦为政协中最高龄委员。

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期间，中共为了打开佛教界反右派斗争死气沉沉的局面，也为了完成佛教界右派指标，用『擒

『贼先王』的办法抛出虚云法师。根据岑学吕居士《虚云老和尚年谱》和《海天丛林》记载，『时全国肃清右派之风甚厉。各寺院亦被波及。由所谓佛教团体开学习大会於汉口。指定各寺院住持及重要职事均须赴会。师以老病。辞不出席。而



判處菩薩「死刑」

南华住持本焕。本寺知客传士。云门住持佛源及见性印开诸师等多人均被列为右派。指定向师清算及斗争。不屈。几酿祸。后由一班夙有成见之人。制造诬捏师十大罪状。如「贪污」、「反动」、「聚众」、「思想错误」、「滥传戒法」种种罪名。其中最无理者。如诬师与青年僧人同单。此等伤天害理之事。竟出於僧人口中。又因师自到云居后。北京政府每月送师二百元为补助费。师屡却不受。

未获允许。乃按月以之供众。而

大会中竟牵扯到师前年於开示弟子戒贪语。引用明代罗殿撰诗「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之句。谓为讥诮诽谤。又谓师妄报年龄。师阅壁报后语弟子曰。「我生长及出家都在闽省。圆瑛法师及住持盛慧。现年已八十余。他幼年在鼓山出家。他都知道。我剃发受具及出外参方与回鼓山任住持年岁。是有人可证。」又加以「老顽固」。僧界右派首要各罪名。其意盖欲向师「围剿」、「斗争」、「洗脑」。「下放」至「劳动改造」而后已。尔时全国僧众。除膺特殊任务者外。均惴惴不安。南华云门云居山门外。亦遍贴大字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壁报。诬师罪行。声势汹汹。师则若无其事。而四众均欲为师辩白。师不许。如此阅一月。两月。并无消息。汉口之集会亦散。而师左右得力之人及多年随从弟子。均被分散。指派向别处去矣。如是又阅一二月亦无消息。后接京信。知汉口开会期间。因师德望。不敢轻率。先叠成文告罪状。呈请主其事之最高级人物。批准执行。某阅毕一笑着令撤销。师乃获转危为安矣。』

虚云法师之右帽被最高级人物『一笑着令撤销』一事，此说是否可靠，值得怀疑。因为文字记载他戴着帽子昇天。一九五九年虚云示寂。

『徐告侍者曰。「我顷在睡梦中。见一牛踏断佛印桥石。又见碧溪水断流」。遂闭目不语。至十二时半。师唤侍者一齐进来。师举目遍视。有顷。曰。「你等待我有年。辛劳可感。从前的事不必说了。我近十年来。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谤受屈。我都甘心。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为寺院守祖德清规。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领大衣。即此一领大衣。我是拚命争回的。你各人今日皆为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经过的。你们此后如有把茅盖头。或应住四方。须坚持保守此一领大衣。但如何能够永久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说毕。合掌。「道珍重」。世寿一百二十岁。茶毗得白舍利子百余粒。骨灰奉安於云门山海会塔。』（岑学吕居士：《虚云老和尚年谱》）

在汉口举行的中南地区六省市佛教界领导人大会上，派来与会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亲自出马，点名指责虚云法师为右派份子时，广东潮州市开元寺监院、住持定持法师（1921-1999）出来大胆地为他说话，称：『虚云法师已

一百多岁了，说错话是正常的。若划他为右派，在世界上影响不好』。於是把定持法师也划为右派。

定持法师划右后遭到一连串精神迫害，每日早晚汇报，三天一份检查，下放汕头市针织三厂劳动。他不堪忍受侮辱，於一九六四年打算偷渡香港大屿山当和尚，被船主告密，抓捕归案后以『叛国投敌罪』监外管制。

中共在宗教界抓右派，时常用集中开会学习的方法，一批一批地抓。四川灌县将九十四名道士集中在天师洞鸣放辩论，从中抓出九名右派；成都市佛教协会秉承中共成都市统战部和成都市政府宗教事务处的意志，召开多次座谈会，挖出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牛次封居士、宽霖、隆莲、清定、澄济、贯通、解空、悟能、隆光等一大批和尚、尼姑、道士。

近代佛学界辈份最高的学者、法华宗（天台宗）大师、长春般若寺方丈澍培法师（1897-1986）、广东省岭东佛教教会理事长释又宗、湖南省南岳佛教协会秘书长宝昙法师、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当家法师印开、和尚思胜、韶关乳源云门寺方丈佛源、广东韶关南华寺住持释本焕、北京法源寺方丈佛性、北京居士林总务黄星云等人，均被划为右派。

少数民族的反右派斗争

中国的宗教同少数民族有密切的关连，如藏族与藏传佛教、回族和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蒙族与喇嘛教。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不多，仅佔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左右。但是居住地域却佔国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广褒腹地，物产丰富、地大物博。西藏地区在反右前夕刚发生了『抗暴事件』。历代中央政府从未对他们实施过实际意义上的真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正管治。因此中共對於少数民族的反右斗争相当谨慎。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佈了《關於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提出『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应切实控制打击面，不要过宽』。由於西藏地区刚发生抗暴事件，所以在藏区不开展反右运动。否则藏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对立情绪很大，右派要抓不过来了。

《指示》又说，地方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一部分，是披着民族外衣的右派份子。据此，中共揪出了『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也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地方主义集团』，按照右派标准处理。關於地方民族主义详见《反右派运动中的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这一章节。

伊斯兰教是回族和维吾尔族的宗教，因此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马松亭便是回族和伊斯兰教的领袖人物。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鲍尔汉是中共特别党员，代表中共控制伊斯兰教。两个人一左一右，在反右运动中必定会冲突。鲍尔汉有强大靠山，马松亭难逃覆灭命运。

馬松亭（1895-1992）北京人，诞生於伊斯兰家庭，是有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他原本是个爱国爱教的大阿訇，一生紧跟共产党，是中共在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重要统战对象，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助党整风中，他抱着善意向中共提出一些有关少数民族和宗教政策的意见，中共立即翻脸，把他和也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欧百川（苗族）和黄现璠（僮族）一起，划为全国人大中的三大少数

民族右派份子。

歐百川（1894-1970），贵州苗家子弟，国军中将，曾追随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他率领的苗家子弟兵在抗战中特别能打仗。起义后任贵州省副省长；黄现璠（1899-1982）是著名历史学家，出身贫苦的僮族农民家庭，发奋读书，人们夸他『毋须扬鞭自奋蹄』。

在回族和伊斯兰教中，还有一位右派代表人物，世袭教主马震武（1895-1961）。他是原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沙沟门宦第八代世袭教主，云南省他朗（今墨江）人。伪『满洲国』、『蒙古自治政府』、日本人、国民政府都积极拉拢他，他都不为所动，一心跟着共产党。待他失去统战的利用价值，中共便一脚把他踢进右派泥坑。刚烈成性的大教主当然不服气，过去不买日本人和老蒋的账，今天怕你共产党毛泽东不成？中共见他如此桀傲不羁，便赐他一顶顶级极品一极右份子的帽子。

伊斯兰教也有一位百岁右派吴德正阿訇（1851-1959），年龄仅比佛教释虚云法师小十一岁。他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车村人，胡太师经学第八传弟子。一八六二年十一岁，陕西回民起义。父母携带他跟随义军餐风饮露，辗转西北五省，历时十年，跋涉数万里。一八七二年流落到车村定居，投入清真寺学习经典，拜名师为师。

以后在各大清真寺任教，历时七十载。一九五二年一〇一岁，回家养老。一九五八年又请他出来到固原县参加阿訇学习班，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批斗数月，戴右派帽子，交生产队监督劳动。生产队又批斗十多天，宁折不弯，始终不肯低头认罪。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一九五九年斋月，历经清朝、日伪、民国、共产四个朝代的四朝元老吴德正大阿訇，走完一〇八年风雨飘摇的路程，脱离苦海，回到他向望已久的永恒天国。他一生擅长理学，为教民培养无数子弟，桃李满西北。毕生没有撒过一枝香，断过一天斋。

在少数民族右派中，还有许多代表性人物。例如国军上将、原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彝族），和平解放云南有功之臣，因为对苏联『老大哥』提了些意见，划为右派；满族右派有相声剧作家何迟、书法家启功、演员文彻赫恩；回族右派还有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等。



龍雲(左)和陳銘樞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中的反右派斗争，与中共内部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斗争有密切关系。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内党外不分敌我，乱揪乱批，在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中造成极大混乱，从中共自己发布的两个红头文件中，虽经大大缩水，亦可看出若干端倪。

《中共中央统战部關於地方民族主義份子摘帽問題的請示》

发布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文号：——

发佈日期：1979年10月13日

生效日期：1979年10月13日

我们党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有所滋长，进行这场斗争，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是必要的。但是，也存在着扩大化的偏向。各地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划了一批地方民族主义份子，有的戴了右派份子的帽子，有的戴了地方民族主义份子的帽子。戴地方民族主义份子帽子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作敌我矛盾性质对待；一种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对待。

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和《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文件下达后，右派份子的帽子已经全部摘掉了，许多地方提出也要为地方民族主义份子摘帽子。据了解，对地方民族主义份子，不少地方也已经宣布摘了帽子，但有的地方还没有或者没有全部摘掉帽子。对此，我们的意见是，凡是当时划为地方民族主义份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改正的标准，应根据中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关于《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和关于鉴别少数民族中的右派份子的标准：（一）反对社会主义；（二）反对共产党领导；（三）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对于摘掉地方民族主义份子帽子和改正过来的人，都应按照中央同意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妥善处理。希望各级党委结合对右派份子摘帽子的工作，把这项工作切实做好。

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反右派运动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在另一份中共中央统战部文件《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的说明》中也承认：

『但是，由於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於严重，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是扩大了范围，有些地方由共产党内扩大到党外，有的地方甚至把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也列为地方民族主义份子进行批判斗争。二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据全国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共划少数民族右派份子五千人，其中划为地方民族主义份子的共一千七百人。』

2010年2月20日

十二、誰奪走了他們的青春？

——大中小學生中的反右運動

偉大的五一九運動

自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始终站在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冲锋陷阵。伟大的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吹响号角的。四十年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也是在北京大学开始了又一场伟大的学生运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六时，在大学生晚餐时间，在北大学生大食堂东墙忽然贴出一张诗体大字报《是时候了》。这张大字报不啻像一块石头，扔进清澈平静的未名湖面，激起阵阵漪漣。顿时掀起了惊天动地的『五一九』学生运动高潮。

这首马雅可夫斯基阶梯式诗体诗的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和他同年级学生张元勋。这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令他们丧失了宝贵的青春、理想、追求、事业，使他们踏上一条荆棘丛生的坎坷不归路。然而他们的《是时候了》却像一盏明灯，永远照亮着中国民主化道路：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谁夺走了他们的青春？

把我們的
痛苦
和愛情
一齊都
瀉到紙上！
不要背地裏不平，
背地裏憤慨，
背地裏憂傷。

心中的
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見陽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落到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
太陽照耀！

我的詩
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
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
來自——五四！
在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份子中，青年學生几

乎佔近六分之一。五十年后，目前的幸存者中，大多数都是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他们今天再一次站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纷纷拿起笔杆，以纸笔作武器，向旧世界和专制制度开火，记叙强迫遗忘的历史，釐清真相、保存记忆。他们虽然年届古稀，又历经磨难，身残体衰，百病缠身。可是依旧最少顾虑，是幸存右派中最活跃的一部分。

大學生中的右派份子

一九五七年中国大陆共有八十二万大学生，揪出右派份子四万多人，另有相同数量的中右份子，两者相加，佔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还不包括受株连和其他处分的人。

『五一九』民主运动发祥地北京大学反右时共有学生八千多人，揪出右派份子七百十六人，中右份子（内控右派）七百多人，两者超出大学生总数 15%。物理系五四级全班六十多人，划右人数近一半；物理系师生员工中共揪出一百五十五名右派份子，其中学生一百四十七人，佔学生总数 8.9%，教工八人，佔教工总数 8%。在反右补课中派去的新任党委书记陆平认为反右反得还不够，继续升温，再一次掀起深挖右派的高潮。北大师生右派中，有八人惨遭枪决，一人死缓死於狱中，佔北大右派总数百分之一。他们是哲学系学生党员黄宗奇（1957）和学生黄立衆（1973）、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历史系学生沈元（1970）、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70）、物理系研究生吴思慧（1970）和化学系学生张锡琨（1976），判处死缓的生物系学生袁植芬死於狱中。

西南师范学院有学生四千多人，揪出右派八百多人，佔

谁夺走了他们的青春？

全院人数 18% 以上。该院物理系五八级共有三十人，揪出右派十一人，佔全班学生数 36%。中共搞政治运动似乎与领导者的个人道德品质有关。西南师范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永清是老资格的延安出身干部，曾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的上级，因文化水平低，升不上去，心态不平衡。可是他参加过延安整风，熟知逼供信整人和治人之道。他憋着一股气，全发泄到右派份子身上。所以将西南师范学院搞成全国大学生划右比例最高的高等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有师生四千多人，揪出右派三百三十多人，佔 7%，其中有教师五十人。兰州大学揪出右派一百七十四人，佔全校总数 8.1%。其中学生右派一百二十七人，佔学生 7.01%；教授十七人、讲师四人，佔 16.54%；助教十七人，佔 10.83%。山东大学揪出一百四十九名右派；北京地质学院全院约有八千人，揪出右派四百另七人，另有中右四百人，两者相加，佔全院人



解放军二十五军文工团员林希翎



重病中的林希翎

数 10% 以上，有一个班三十人，揪出九名右派；同济大学五九级卓娅班五十人，有十八位右派。

北京市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河北医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四所高等学校中判第一类劳动教养、第二类劳动察看处理的学生右派二千九百十三人，集中在北京市红星公社南郊农场劳动。广东省七所高等学校揪出学生右派



内控右派方勵之

八百一十人，至运动结束尚有三十三人来不及批斗处理。

窥斑显豹，从以上几所高等学校学生划右的情况可知大学生中反右派运动是何等悲壮惨

烈，形同一场大屠杀。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高潮中，毛泽东一方面在莫斯科大学向中国留苏学生假惺惺地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另一方面心狠手辣地向大学生下毒手，成批成批地把他们树为阶级敌人，夺走了他们的青春和理想。运动中揪出来的右派远远超出原订的指标。

遭中共处决的三大右派烈女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林昭（1932-1968）、四川大学生物系冯元春（1930-1970）、兰州农校教师毛应星（1925-1970）。林昭在接到死刑判决书后，割破自己的血管，沾血书写绝笔《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冯元春烈士是最早挺身而出，起来批毛和批毛泽东思想的女英雄；毛应星烈士在狱中还继续公开批判无产阶级专政。

谁夺走了他们的青春？



林昭塑像

她们两位都遭到中共刽子手中世纪式的凌迟酷刑，残忍无比。毛应星后来被甘肃省当局追认为烈士。她们都是人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每年清明时节，人们自发地前去扫墓祭祀。中共当局在林昭墓地装上摄像机，监控扫墓的人们。

在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中国马列主义者同盟』、『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星火」右派反革命集团』、『煽动知青返城，企图偷越国境集团』中，遭枪决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刘奇弟、袁植芬等十多人，在狱中折磨致死，至於在劳改、劳教中饿死、病死、打死者不计其数。

中共历来反复宣称，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局限在大学生以上的知识份子范围，中、小学生中不搞反右运动，似乎运动从未触及未成年的中、小学生。由於刻意隐瞒真相，篡改歪曲历史，致使中共在反右运动中迫害摧残未成年少年儿童的历史几乎鲜为人知。

中學生中的右派份子

四川省李井泉和云南省谢富治在中学生中开展变相的反右运动。西南左王李井泉的滔天大罪之一是在四川省未成年的中学生中大抓右派。李井泉在反右运动结束前夕发出五点

指示：

一，中等技术学校、中级师范学校、高中毕业班要搞大鸣大放，开展整风运动；

二，利用假期或开学前，大搞十天或半个月；

三，对放出的言论，展开讨论批判，但不搞反右斗争，不斗争个人；

四，对於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要列入政治操行评定内容，作升学、就业审查。定为政治不及格的，作为政治课考核内容；

五，对其他年级的坏份子，除个别情节十分严重的需要处理外，其余可留校考察，以观后效。

李井泉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反动学生混入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在反右派运动中，揪出了太多的学生右派，此举是为高等学校纯洁生源云云。他进一步指示要将中等学校学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大类。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根据李井泉的指示，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作了题为《继续深入地开展中等学校的整风运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而奋斗》的报告。杜心源指出，『在中等学校不断发现极端反动学生，反党反社会主义，散佈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心怀阶级仇恨。要把他们送去劳动生产中改造，不让他们学文化反对我们。大学中右派就是因为中学审查不严而混进来的。因此初中以上要建立档案制度。有些高中生比大学右派还毒。……这次运动一要整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二要整思想反动、坚持反动思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三要整品质作风极端恶劣份

谁夺走了他们的青春？

子。』完全是一付杀气腾腾、磨刀霍霍的模样。

中学生的反右运动从『交心』着手。可能原意是一场正面教育运动。虽然反右派斗争已进入尾声，中学生中的『交心运动』仍从大鸣大放着手，宣佈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记入档案。发表格让每个学生填写鸣放内容。中学生不懂国家大事，只会提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可是运动搞着搞着就走样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關於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出台，中共四川省委转发全省地、市、州委宣传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成都团市委发出绝密文件《關於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大鸣大放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和风细雨的大鸣大放转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大规模迫害未成年人运动由成都市开始，迅速推向全省，连甘孜、凉山那样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亦不能幸免。

全省五八届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共有一万多人，用诱导和逼供信的方法打出三、四类份子三千二百人，佔全体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强。成都市参加运动二千六百五十七人，一类『进步』三百四十七人，二类『中间』一千七百二十五人，三类落后四百九十三人，佔 16.55%，四类『反动』九十二人，佔 3.46%。三、四类共五百八十五人，佔 22.01%。

三、四类屬於敌我矛盾，性质相当右派，因未成年不称右派份子，只称三、四类份子。明白人一听就明白，三、四类份子就是右派份子。他们中最小的是四川省富顺县十三岁的反社会主义份子吕涛，他与难友长期在巫山县背铁矿石。后来奋发图强，自学成才，成为全国唯一一位无大学学历的

博士生导师。

三、四类份子人事档案中有『反党份子』、『落后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等政治结论。不准毕业，不准参加高考。李井泉指示将三、四类份子发配至四川省内各地，当个劳动力，二条原则『一是不能当干部，二是把试用期延长，也不准称工人，统称试用人员。』四川省公安厅等五厅局发出联合通知，有十几种人大学不予录取。不戴右派帽子不录取，比戴帽更糟，戴帽可以改正；不戴帽无从改正。

全省一万多名未成年三、四类人员还包括初中生、技校和中等师范生，其中有三千二百多人受到变相劳改处罚。他们『以言获罪』，『以思想获罪』，批斗、侮辱、自杀、精神失常、沦为乞丐，历经人间苦难。右派摘帽、改正轮不到他们。他们成为共产社会的弃儿和边缘人物。

李井泉等刽子手在案件曝光后，千方百计捂盖子，掩饰事件真相，不准见光。然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这么多的受害者和见证人都能封得住嘴吗？何况还有良心未泯灭的人。

原成都铁路工程学校学生王建军（1939- ）和他的难友汪长荣、杨无忌等人走遍四川全省写出《五八劫》，杨泽泉（1939- ）写出《回眸一笑》，才揭开了这部迫害未成年人的血泪史。另有一位周克芹，划为四类份子后押送农村监督劳动，经过刻苦自学，以写小说而出了名。

王建军晚年退休后到处寻访受害者，个别采访，开座谈会集体回忆，足迹遍及省内外。他还开了个博客网，深入揭露历史真相。博客的开场白是『满纸辛酸泪，沧桑六十年，开博无他意，为史留真言。』人们尊称他『王大爷』。

谁夺走了他们的青春？

成都市迫害未成年人惨案的幕后总指挥是原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萧菊人，前台打手是团市委书记章文伦。章文伦就是一位良心未泯灭的人，他在八十多岁临终前忏悔道：『我这一辈子最感愧疚的是不该整中学生！』

与四川省相邻的湖北省汉阳县，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小匈牙利事件』。在汉阳县第一中学，某天一位女教师在告诫初一学生要努力学习时透露，本校一千名应届毕业生中升学率仅五十人。这句话传到初三毕业班引起不满，学生上街要求校方解释，向县教育局请愿。这件小事被无限夸大，上纲上线，与社会上的民盟挂钩，成为由民盟右派煽动、向党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事件。三十二岁的副校长王建国等三人惨遭枪决，十多人判刑。三十三名中学生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等到二十七年后平反，当年最年青的学生已年近半百了。

这时在上海也发生了一起由柯庆施导演的上海电力专科学校事件。上海电力专科学校有三千多名师生，相当於中等专业学校，学生都是未成年人。鸣放期间，贴出三千几百张大字报，为上海教育系统大字报之最。

毛泽东视察上海时，柯庆施报告了此事。遂引起注意。中共上海市委责令学校抄录所有大字报呈阅。毛泽东於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晚在柯庆施、陈丕显、马天水陪同下，接见了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开始一场围剿。《解放》、《文汇》、《新闻》三报组织全市舆论投入批判。先后有数百名师生员工受到迫害。三十七人划为右派份子，其中有十二名未成年学生。

上海电力专科学校事件成为全国唯一一起在反右运动中的中等专业学校大冤案。这起冤案是由毛泽东和柯庆施亲自策划的，株连了许多学生。有三位未成年的优秀学生自杀。二年级学生曹立生，未满十八岁，工人家庭出身，共青团员，批斗中投黄浦江自杀；另一位学生跳进小河滨自溺；一位跳楼自尽。学生们十分恐慌地说：『海、陆、空，小右派死路一条。』还有几位学生在发配劳动教养时自杀或失踪。发生在中等学校中的这种血案实属少见。

未成年人中的右派份子

欲追踪全国最年幼的未成年右派份子，实属不易。我们找到了几位，他们一个比一个年幼。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北京冶金中等学校学生佟信顺（1941-1960）是全国最小的右派之一。北京市人，家庭出身三代工人，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子弟。初中毕业后考进北京冶金学校。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开始，他年幼无知，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请教他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起来的。中共一贯控制公民的通信自由。邮政局暗藏特工，检查信件。尤其是国际信件，封封严查。从中找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者。查获佟信顺的信件，特工们如获至宝，以为逮到一条大鱼。

佟信顺的信尚未迈出国门，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看到，他便戴上极右份子帽子，押送进北京市半步桥第一监狱，再转送茶淀农场劳动教养。刚进入劳教农场，犯人先要自报身份。他自我交代自己的『罪行』说：『信搁邮筒了，不知咋搞的，信又回到党支部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头子写信，便可打你个「极右」。便把

谁夺走了他们的青春？

我送到这儿来啦！』

劳教农场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特大，一个十六岁的孩子难以承受，加上精神和思想的折磨，使他很快崩溃了，垮了下来。他向难友哭诉道：『我饿。走……，走不……，走不动了。我饿得晚上睡不着觉，两腿不听使唤。』不久他饿死累死了。咽气时还不满二十岁。他哥哥来收屍，哭得非常伤心，反覆地哭喊：『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的反右运动创造了一项又一项世界记录。云南昭通的李曰垓（1942-2010），十六岁。他新近向胡锦涛总书记所写的一封题目叫《关于『反右』历史欠账的法理认定和解决》的公开信。这封信写得真好，文字流畅，用词严谨，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他十五岁划为右派，比北京的佟信顺还小一岁，强行送往监狱劳动改造，花了十多年时间自修完高中到大学的全部课程。二十二年后的一九八〇年改正后，竟然当上了一个学校的校长。

《龙门阵》原是四川省文化局主管的一个通俗刊物，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现划归四川出版集团主管並主办，是个官方刊物。所刊发的文章应当准确无误。二〇〇九年第二期（总第二三〇期）的《龙门阵》上，第三十二页以醒目加黑标题登载李可刚的文章《中国最小的『右派』》。摘录於后：

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现已改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並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於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年仅十二岁的张克锦（1946-）所画。

当时，十二岁的张克锦对于『大鸣大放』之类的政治运动，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克锦并不认识这位城关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为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小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一幅漫画。请他作画自然乐意，他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下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右派份子其名於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右童份子』之名。

张克锦这顶『右童份子』的帽子，一直戴至二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改正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当年划为右派份子的人，大多数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七年。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

阿姨说：『领啥子奖嘛。』

『领啥麻雀的奖吗？』孩子半信半疑地问道。一九五八年春天，全国人民响应毛泽东『除四害』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除四害』

谁夺走了他们的青春？

运动。人们在街頭巷尾、田间地角各个地方，或拼命挥动竹竿，或使劲敲击脸盆，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四处追撵，让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从空中掉落下来，毁灭於『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张克锦疑惑地对阿姨说：『那几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们在山上东奔西跑地跑了一天，连一隻麻雀也没有吆下来！』

阿姨不耐烦了，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正是在监狱之中，张克锦才被戴上了『右童份子』的帽子，从此厄运伴随他一生。

张克锦改正落实政策后被安排了工作，退休前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美术专业干部，活得还算不赖。那么小就被关了七年，出狱后又一直戴着帽子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历尽艰辛，棱角理应磨秃了吧？不！张克锦完全不是那种低头哈腰、谨小慎微、反应迟钝、一脸晦气之人。他长发披肩，打扮入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他爱好广泛，除绘画书法以外，尤喜读书集邮，也喜欢与京剧票友们相聚，拉琴吊嗓，自娱自乐。因为读书较多，常常喜欢评古论今。讲话时神采飞扬，口若悬河，乃至於手舞足蹈。他家的住房比较宽敞，还开设了少儿美术书法培训

班，许多朋友都把孩子送到他这里来。

他对老熟人说，当年被划为『右童份子』，全国『获此殊荣』的大概只有他一人。似乎有人认为他挺受委屈。而他认为，咬咬牙已经过来了，也就无所谓了。历史只不过和他开了一个玩笑，给了他一块『吉尼斯』金牌！

叶永烈先生所著《反右派始末》一书中，曾说四川雅安的李天德是中国年龄最小的『右派』，时年十九岁。十八、十九岁打右派，已经不稀罕了。在四川东北某地的一位朋友，划『右』时年仅十七岁。跟划『右』时年仅十二岁的张克锦比起来，他们只能退居其次了。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省长谢富治以残忍和毫无人性闻名遐迩。云南省元谋县新民劳教农场主要关押右派份子，那里还关押了几位少年儿童。熊翔是个十五岁小学生，因为喜欢玩收音机，经常帮同学、朋友修理，公安局把当作十五岁的『特务』抓去劳动教养；十三岁孤儿小狗蛋，捡无人看管的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站，当作破坏生产的『坏份子』送进劳教场；新民劳教农场还关押了多名少年儿童，杨洪祥、董发林是十二岁的小学生，一个小哑巴刚满十岁，小水则是个刚够八岁的小孩子。农场发的鞋子实在太大，他们把后跟紮起来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十八足岁以下为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未成年人的量刑标准也与成年人不同，反右运动规定中小学生不划右派。可是随着反右运动的无限扩大化，中共各级领导早已冲破了这条界线。右派份子的年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右派帽子，老少皆宜。

2009年12月

十三、惨遭处决的右派份子

林昭在接到死刑判决书以后，割破自己的血管，沾血书写绝笔《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写道：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裏；
將這一滴血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漬，誰能抹得去？

你知道吗？在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的知识精英中，有多少个像林昭一样铁骨铮铮、巍巍其人的壮士，仰首挺胸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慷慨就义，把鲜血洒在神州大地上？

集團性的處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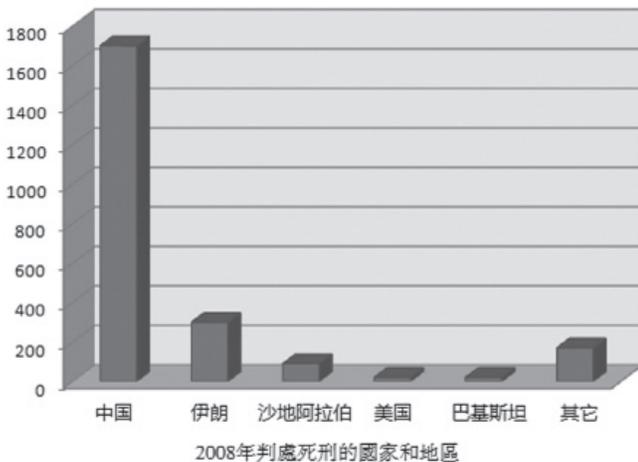
遭中共处决的壮士中，有林昭、冯元春、毛应星三位巾帼英雄；有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中壮烈牺牲的烈士；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团是：

一，四川四一五劳教支队『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案，党内右派周居正和军内右派杨应森中尉英勇就义；中共党员魏昭、陈仲伟、廖廉康等十七人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十四人判十年至二十年有期；另有四十六名案犯另行判决，他们全部都是右派份子。

二，大同『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案，首犯徐关增、王汝强，主犯任大熊、刘世广、曹介弘都是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右派，首犯、主犯十三人都遭枪决，另有二十三人处以死缓、无期、有期徒刑等各种刑期。

三，南京『煽动知青返城，企图叛国投敌』案，遭枪决的主犯陆鲁山、王桐竹、姚祖彝、孙本乔都是极右份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罪名惨遭枪决。

四，兰州『星火右派反革命集团』案，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等串联林昭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杂志。仅出一期，第二期尚未出版，即遭破获。张春元和涉案的中共县委书记林映华、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同被枪决。几十名涉案右派学生被判重刑。



部分處決右派烈士名錄

被中共处决的部分右派烈士名单、他们的就义日期、处

惨遭处决的右派份子

决原因，大致排列如下：

1. 黄宗奇(?-1958)，某些文章把他的名字又写作黄申奇、黄宗羲。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干生，湖北省蕪廷县人，贫雇农出身，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並加入共产党。在批判监禁中欲跳窗自杀，挣扎中误伤看守他的学生。判为反革命杀人犯枪决。

2. 陳學詩(1935-1959)，志愿军侦察排长，划右后劳教中，因饥饿偷食干部食堂粮食打伤警卫，判处反革命杀人犯遭枪决。

3. 張雨沛(?-1961)，云南政法大学毕业，划右时为甘肃省检察院干部，划右后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作顺口溜『祁连山戴帽，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生活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同场劳教的右派『积极份子』欲告密，被他用铁铲打伤。他逃到酒泉，在酒泉汽车站被捕回，未经审判便遭枪决。

4. 王格(?-1961)，东北工学院冶金系讲师，划为右派后送往辽宁省凌原新生焦化厂劳动教养。他不服，多次书写报告要求平反，但全部被劳教队没收，不予理睬。他极为不满，一次在火车来拉焦炭时，他冲向火车头自杀，表示抗议，不料仅轧去一条腿。劳教队不予治疗，批斗只剩下一条腿的王格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王格不服抗辨道：『鸣放是毛主席号召的，我听毛主席的话难道还有罪吗？』不久劳教队把他和其他三个犯人一起枪毙了。

5. 周居正(1930-1964)，中共地下党员，红岩英雄，划为右派后在四川省公安厅四一五筑路支队劳教，被一名同队劳教的姚姓右派告密，称劳教的右派成立『中国马列主义

者联盟』，周居正和杨应森为主犯，他们於一九六四年三月遭枪决。

6. 楊應森（1931-1964），泸州步兵学校中尉教官，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泸州步校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送四一五筑路支队劳教，与周居正同案判处死刑，於一九六四年三月枪决。

7. 朱光瀾（?-1966），女，广西博白县县中教师，与丈夫周信乔一起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广西博白县那卜公社金因大队中共党支部书记以批斗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的名义，命令不明真相农民用木棍、锄头将朱、周二位先行痛打，然后宣佈枪毙。

8. 周信喬（?-1966）广西博白县县中教师，与妻子朱光瀾一起划为右派，又一起下放农村劳动。两人一起在文革初期遭人痛打后枪毙。

9. 劉文輝（1937-1967），上海市工人，在沪东造船厂因写一张批评厂长大字报而划为右派，开除团籍，下放舟山群岛的嵎泗列岛劳动。因有逃跑到外轮的企图而被人告密，罚回上海里弄与父亲一起扫街。文革开始，写出长文批判『十六条』和毛泽东，投寄各地高等院校。以『恶攻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遭全国通辑，与弟弟刘文忠一起被捕。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工总司夺权。刘文辉被张春桥、姚文元抛出为文革祭旗，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后枪决。

10. 林昭（1932-1968）女，北大新闻系学生，一九五七年在北大划右后坚持不断地批判毛泽东、批判中

惨遭处决的右派份子

共，多次判刑，在狱中继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文革，皈依基督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时遭枪决。

11. 張春元 (?-1968)，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入学前曾是志愿军坦克手、神枪手。在兰州大学划右后，继续和林昭办《星火》地下刊物。在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诬以『密谋暴动越狱』罪被枪决。与张春元同时遭枪决的还有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他同情林昭和张春元办的《星火》，为彭德怀鸣不平。批判毛泽东的『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反动历史观。同时枪毙的尚有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委副书记、地下党员杜映华，诬告他和张春元一起在武山县密谋组织『暴动越狱』。

12. 杜映華 (?-1968)，兰州大学学生右派，发配农场劳动，参与张春元等右派同学举办的《星火》杂志编辑工作，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刑满后不得返回社会，留在第三监狱当工人，与犯人的唯一区别是有一定外出自由。一九六八年，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诬指杜映华与同案犯张春元『密谋暴动越狱』，为张传递消息，两人均判死刑，立即执行。

13. 沈元(1938-1970)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才华出众。一九五七年划右后分配至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写出大量震撼学术界的论文。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受到红卫兵冲击，扫地出门，无处居住。避入外国使馆要求避难。被捕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叛国投敌』罪遭处决。

14. 顧文選(1934-1970)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肃反

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均遭关押，严刑拷打。鸣放时组织控诉会，为此划为右派。划右后不服，逃回杭州母亲家，抓回北京判五年徒刑，刑满留场就业。文革开始又受冲击，逃至苏联，被引渡回国，按上『恶攻罪』和『叛国投敌』二顶帽子，在『一打三反』高潮中与沈元、遇罗克一同枪决，同时宣判的有五十五人。

15. 徐關增（1938-1970）浙江新昌人，学生右派，地主出身。一九六〇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判死刑，缓期执行。一九六二年改判无期徒刑。后诬为『中国共产主义联盟』首犯，在『一打三反』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案二十三人，有十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6. 王汝强（1932-1970）学生右派，曾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判处十五年徒刑。与徐关增一起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联盟』首犯，在『一打三反』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7. 任大熊（1932-1970）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助教，在校时划为极右份子，『中国共产主义联盟』主犯，在『一打三反』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8. 劉世廣（1934-1970）清华大学学生，极右份子，『中国共产主义联盟』主犯，在『一打三反』中判死刑，立即执行。

19. 曹介弘（1939-1970）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采矿工程系学生右派，『中国共产主义联盟』主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 馮元春（1930-1970）女，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极右份子，在一九五七年公开批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一党专政。她贴出海报，二次对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演讲，听众达数万人。在狱中不服改造，继续批判毛泽东，在『一

惨遭处决的右派份子

打三反』运动中判处死刑，壮烈牺牲。

21. 毛應星（1925-1970）女，福建闽侯人，甘肃农校教师，极右份子。夹边沟劳教四年。摘帽后下放宁静县农牧站。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四日因反林彪个人迷信，以『恶攻罪』判处死刑，枪决於宁静县城西八里桥。一九八一年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22. 蔡鐵根（1911-1970），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参加工农红军，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中共建国后授大校军衔，行政十一级。曾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刘伯承为部长、萧克副部长）、南京最高军事学院作战训练部长。一九五八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贬至常州市工业局。文革中受人诬告，打为现行反革命份子。於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枪决。

23. 陸魯山（?-1970）北京农机学院学生右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煽动知青返城，企图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

24. 王桐竹（?-1970）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文翻译，右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煽动知青返城，企图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

25. 姚祖彝（?-1970）外贸部英文翻译，划右后判处劳动教养。一九六四年解除劳教。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煽动知青返城，企图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

26. 孫本喬（?-1970）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右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以『煽动知青返城，企图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

以上四人屬於四大右派反革命案之一的『煽动知青返城，

企图偷越国境』案。

27. 張九龍 (?-1970) 西北航空学院 (今西北工业大学) 学生右派,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决。

28. 蔣養毅 (?-1968), 湖南长沙小学教师右派, 划右后判处劳动教养五年,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遣送回原籍湖南省道县。湖南零陵地区道县造反派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二个月内滥杀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四千二百九十三人。蒋养毅被人用扁担活活打死。刽子手说:『他们家里的老人和婴儿悉数处死, 靡有子遗。』

29. 馬雲鳳 (?-1969) 北京航空学院 (今中国航天航空大学) 学生右派, 曾任中共学生党支部书记。他早於一九五六年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起义时, 便张贴标语『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苏军滚出匈牙利!』。当时马云凤的反苏言行震动了毛泽东。毛谈起马云凤时说, 马云凤『有反动的思想, 这个人后来开除了党籍。但是还留他在那里读书。』反右时划为极右, 开除党籍, 被捕入狱。文革中遭枪决。

30. 張錫琨 (1934-1976), 出身於四川贫困家庭。北京大学化工系学生。一九五七年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 打成右派遣送团河农场劳动教养。一九六九年又被送回原籍。他在劳动教养中还关心国家大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已经粉碎, 他反而倒以『试图组织反抗, 逃离劳教农场』的罪名遭枪决。至今没有平反。他是唯一一位在文革后遭枪决的右派。

31. 劉鳳翔 (?-1970), 湖南农民报编委, 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 送酒泉夹边沟劳动教养,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以『反革命集团』罪处死。一九八五年《湖南日报》为他平反说:

惨遭处决的右派份子

『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於他的不实之词，应予以彻底否定。鉴於刘凤翔同志一九七〇年四月被处死刑，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仅按死亡职工对待。

32. 朱守中 (?-1970)，一九四三年毕业於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九五〇年二月加入中共，一九五八年在宁夏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劳动。在文革中朱守中认为『刘少奇是政治家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九大党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语录》』、『大中学校的专业课、基础课不可缺少』……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因上述言论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在宁夏遭枪决。

33. 朱希 (?-1970)，一九三八年入党的中共资深党员，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文革中因批判林彪而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备受拷打折磨，秘密判处死刑。因林彪叛逃，死刑来不及执行。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时，在档案中发现死刑的判决，但无任何改正平反的文字材料。

判处死刑没有执行的，此外尚有党治国(1936-2008)、冯国镛(1928-)、徐洪慈(1932-2008)，此三人均已判死刑，但来不及执行。

34. 刑松勁 (?-1966)，一九三七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当讲师，一九四九年调至北京国际书店工作。一九五七年划为极右份子，送茶淀劳教农场劳动教养。文革开始调京郊团河劳教农场继续劳教。因怒骂江青，判以『恶攻罪』被处决。

35. 儲安平(1909-1966)，出身宜興望族，與羅隆基有師生之誼，創辦《觀察》雜誌。曾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和宣傳部長。五七年提出『黨天下』，被迫辭去才當了二個月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劃為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在紅衛兵掃四舊、抄家、打砸搶高潮中反復抄家，被毆至奄奄一息，紅衛兵將他架走后下落不明。他的死因有說給紅衛兵活活打死，有滔海而亡等。

36. 張海輝(1927-1970)《湖南農民報》編委，中共黨員，一九五七年劃右，翌年按右派三類處理，降職降薪，開除黨籍，在文革『一打三反』中以『惡攻罪』遭槍決。

37. 柳湜(1903-1968)湖南長沙人，中共烈士柳直荀(毛澤東《蝶戀花》中「我失驕楊君失柳」即指他)之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擔任教育部副部長，被康生誣陷劃為右派，開除黨籍。一九六八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突然給人抓走，殘酷毆打，逼他承認叛徒。直至打死，他都沒有承認。

38. 黃嘉音(1913-1961)文匯報副刊主編，劃右後關押在青海的一座監獄，受刑事犯欺侮，他奮起反抗。獄方誣陷他『蓄意殺人』，將他槍斃。

39. 黃繼亮(?-1966)河南滑縣會計，其弟黃繼忠在北大任教師，在單位里對人說『我弟弟一向努力工作，他怎麼會是右派?』替右派弟弟鳴不平，黃繼忠也劃為右派，勞動教養三年。結束教養送回原籍江西吉安種田。文革開始，五類份子都是國民黨殘渣餘孽，他被抓到公社嚴刑拷打，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40. 王健國(?-1957)湖北省漢陽縣一中副校長，

惨遭处决的右派份子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该校学生因对升学政策不满而罢课，游行示威，冲击中共县委、县政府。当局立即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事件』，替右派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助威壮胆，立即逮捕几十名反革命右派份子。判处副教导主任杨松涛等四人有期徒刑。其中『幕后黑手』副校长王建国和教师钟毓文、民盟成员杨焕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八年后平反，已无文字记载。

41. 鐘毓文 (?-1957) 汉阳一中语文教学组组长。

42. 楊煥堯 (?-1957) 汉阳文化馆图书馆管理员，民盟成员。

43. 陳民國 (1930-1966)，原四川盐务管理局干部，划右后在四一五筑路队劳动教养，涉『中国马列主义者同盟』案判十五年徒刑。不服改造，不读《毛主席语录》，在烟纸上乱涂乱写。文革开始被琪县『无产阶级专政组』乱棒打死。

44. 傅汝舟(1928-1968)原四川城市规划设计院工程师，划右后送四一五筑路队一〇一支队劳动教养。涉『马盟』案后判刑。狱中出名的『反改造份子』。狱警问他：『我们共产党好不好呀？』他冷笑道：『好啊，比希特勒进步一点。』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杀。

45. 吳紀仁 (?-1970) 北京外语学院讲师，在劳改中继续攻击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专政，狱中逼疯，『一打三反』中枪毙。

46. 海默 (1923-1968) 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的电影『海箫横吹』被康生点名为大毒草，攻击中共领导，划为右派，一九六八年在文革中打死。

47. 吳思慧 (1932-1970) 四川荣县人，北京大学物理

系研究生。划右后分配去洛阳工学院。一九五九年底因『抗拒改造』而劳动教养二年，劳教期满，在洛阳街头设摊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犯『盗窃罪』判刑十年。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同牢犯揭发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犯下『恶攻罪』，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8. 黄立众（1936-1970）安徽无为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因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为家乡农民说话，开除团籍。一九六〇年划为反动学生，开除学籍，遣送原籍劳动。回无为县原籍后，串联当地农民和干部，组建『中国劳动党』，於一九七〇年七月判处死刑。

49. 遇罗克（1942-1970）遇罗克本人不是右派，但他的父母都是右派。他受株连不准考大学。文革初期愤而写出《出身论》，批判毛泽东的阶级成份论，轰动一时。一九七〇年以『恶攻罪』与沈元、顾文选等右派一起遭处决，年仅二十八岁。因他是右派子弟，故也将他列入本名录。

50. 袁植芬，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著名画家司徒橋女婿。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去香港探亲。北大於十月份借口毕业分配将他骗回学校，旋即替他戴上右派帽子。他不服，逃跑二次，欲偷渡国境被抓回。以『叛国罪』判死缓。服刑期间患肺病死於狱中。

51. 鄭介農（1935-1969）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因写《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譁譁》而被划为极右，在劳动中被人告发判有期徒刑十年。在广饶县五一农场服刑期将满时，又被人告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於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执行枪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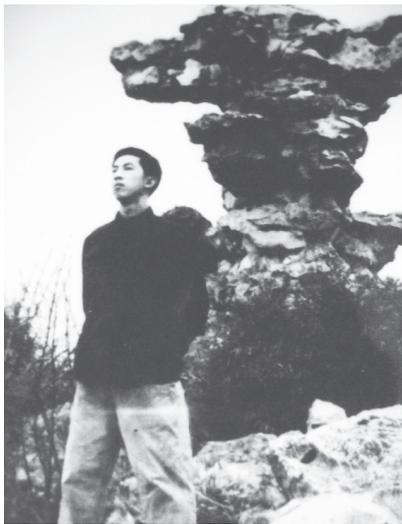
惨遭处决的右派份子

血腥的階級鬥爭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不久，於七月间在青岛举行的省委书记会议上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於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分化右派。』同时他又反覆强调政策，说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右派的敌我矛盾，『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他在《關於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假惺惺地说：『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组织处分。』

毛泽东从来是个二面派，耍阴谋和阳谋的高手。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党员黄宗奇是反右中第一位遭枪决的祭品。杀害右派的高潮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即



上海工人右派劉文輝是血祭文革第一人

中。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以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最为集中。

如果说一九五五年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开创了以『言论治罪』的先声，那么文革开始后的『清队』和『一打三反』又开创了以『思想治罪』的屠杀政治犯、思想犯的杀戮运动。右派日记中的片言隻语、枕边情话、醉后失语均可作为量刑依据。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至少判处了四十万政治思想犯。其中就包括五七年已划为右派份子的中国知识精英。本卷所列五十一位处决的右派和右派子弟中，有八位是北大学生，北大不愧为中国的民主堡垒。



聖女林昭

青年学生，尤其是右派学生思想活跃，对中共的各项政策多持批判态度。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团性大案中遭枪决的右派大都是青年学生。中共对于青年学生和中共自己人下手特别狠毒，毫不心慈手软。对自己人狠，符合中共内斗的规律，蔡铁根大校、杨应森中尉、周居正烈士原来都是革命功臣，最终成为中共刀下之鬼。

被处决的右派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和所谓的基层右派，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本来都已受到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的惩罚。共产党的政策向来是『惩下护上』。镇反、肃反杀的都是小人物。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反动头子进人大，小八腊子坐班房。』傅作义和平起义，军级、兵团级作为统



林昭墓碑後上方的白色監視器

战对象进入人大政协，团级以下按历史反革命遭到惩处。一九五九年十年大庆首次特赦了大战犯。为10%的知名大右派摘了帽子；一九七五年早春，全国人大根据毛泽东在世时的提议，在中共执政时期，大赦最后一批县团级以上的战犯，『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和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可是县团级以下人员仍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中共的这种

统战政策也适用于右派份子。所以遭极刑处置的右派大都是青年学生一类的弱势群体。

苏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中写道，斯大林集中营把驱使囚犯从事艰苦劳动並创造财富作为最高目标，通常不干涉囚犯思想和灵魂。也就是说『它让犯人们的心灵自由地遨游』。索尔仁尼琴本人在集中营里写出了不朽名著《古拉格群岛》的初稿。毛泽东的劳改营和劳教营，不仅把犯人当作廉价的奴隶，而且不准右派犯人思考，把右派们日记中的片言隻语、饭后茶余、蹲坑拉屎时的闲聊都作为定罪依据。毛泽东比他的前辈斯大林和希特勒更上一层楼。

中共的告密文化

我们在查找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团大案的材料时，惊人地发现，这几个案件几乎都是由同场劳教的右派告密而造成的冤案。四川『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由同场劳教的原四川南充地区公安处法医、右派姚某打小报告汇报上去而酿造出来的冤案；大同『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则是由一名同场劳教的同性恋男犯白亚明的告密而暴露的；北大《广场》冤案是卧底右派谭金水的出卖；军中右派蔡铁根大校由阿谀奉承的小人、常州五金公司文书巢而谷告密遇害。

告密文化是中共党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共把卑劣的告密行为合法化、合理化、制度化、道德化、神圣化。古今中外都把告密行为视作叛徒行径和道德败坏的象征。唯有到了共产党手中，不论是苏共、中共、柬共、朝共、古共都把告密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党团员积极向党团组织告密是对组织忠诚老实、党性强的表现；大义灭亲就是六亲不认；每周一次的党团员组织生活成为汇总告密材料的集会；打小报告和告密已经制度化、合理化。告密成为共产党员修养的一条准则，美其名曰『反映群众思想动态』。在反右、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告密文化酿成了多少血案和冤假错案。

本书辑录的仅仅是众多处决的右派中的一部分，许多壮烈牺牲的右派往往连姓名都无从查考。一九五七年北京医学院有一名学生，姓名不详。在划为右派、开除学籍后，身缚土炸弹，欲炸领导反右运动的中共北医党委书记曲正。曲正没有被炸死，那位学生被枪毙了。

惨遭处决的右派份子

劊子手的酷刑

一九四八年，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在枪决前押赴刑场的路上，经过上海闹市区一路大呼口号，为中共向围观的群众作最后一次宣传鼓动；被斯大林无辜杀害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在临刑前高呼『乌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审判中被允许在纳粹法庭为自己公开作长篇申辩。而一贯吹嘘『代表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居然毫无人性地用世界上最残暴、最野蛮、最兽性的中世纪刑法不许就义的右派烈士发出最后的声音。我们在汇集右派烈士的资料时，也顺便收集了中共劊子手为了不许遇难者发出最后的声音而采用种种骇人听闻的法西斯野蛮行刑毒招。

1. 麻繩法：特点是简单易行。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工业局的蔡铁根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大校级部长，一九五八年反右时划为右派撤职，开除军籍下放常州。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当众枪毙了。

2. 竹筒法：特点是具有地方特色。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宫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3. 竹簽法：特点同上。江西在枪杀黎九莲和钟海源时，用的是竹签，将上下颚串起来固定在一起。

4. 壓舌法：特点是直截了当。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

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刑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处决前已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害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隻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5. 割喉法：特点是高技术，需要外科知识。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农牧站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张志新在处决前，沈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张志新的头按在砖块上，残忍地割断她的喉管。

6. 缝嘴法：特点是需要点裁缝技术。东北一工人许云峰以『反革命』罪被处死时，用针线把他的嘴巴缝起来。

7. 脱臼法：『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案主犯徐关增、王汝强、任大熊等人在枪决前游街时，刽子手把他们的下巴弄脱臼，使他们喊不出声来。

至於处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有乱棍打死、钢钎戳死、水中溺死等方法，中共行刑方法集古今刽子手之大成。然而他们对付的都是自己的同志、朋友和亲人。

2009年5月

十四、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殘酷的階級鬥爭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的右派份子陳新桂在他的鳴放材料《對過去幾陣暴風雨的批評和建議》一文中，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自殺者做出他的評價。其中第五條建議說：『在運動中自殺的人，應該指出罪在哪裡，當時都被說成是「畏罪自殺」，這是很不公平的，應該深入調查。如果畏罪，應指出罪在哪裡。如是威逼、威斗自殺的人，政府應恢復其名譽，照顧其家屬生活。』

中共在掌權以前和掌權以後，在政治生活領域，都以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作為其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按照通俗的說法，是把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當作其生存的看家本領。內鬥如此，外鬥亦如此。每次運動事先定出運動對象的百分比和指標，由於寧左勿右和邀功請賞思想的作怪——左在別人身上，右在自己頭上，所以每次運動整治的對象比之原先設定的百分比和指標，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為達到指標不惜大搞逼供信、告密誣陷，製造出大量冤假錯案。前幾次運動來不及甄別平反，後幾次運動又在層層加碼。積累的階級敵人愈來愈多，株連的家屬親友也愈來愈廣。

『士可殺而不可辱』是中國士大夫所遵循的傳統道德中

一条重要的原则，中国现代知识份子亦是如此。中共搞运动、搞阶级斗争的手法远远背离了中国人的道德概念，这便是在反右运动中以及在反右运动后，特别是在文革中有大量右派抗暴自尽的根本原因。

『亲情』、『友情』、『温情』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另一条重要准则。中共用『残酷斗争』、『大义灭亲』、『告密文化』取代传统的『亲情』、『友情』、『温情』和『家庭观念』，突破了中国传统道德底线。运动中的受害者只能用抗暴自尽的办法，捍卫中国人的传统道德理念。

中共出於阶级斗争的需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律把自杀行为称为『畏罪自杀』，不分青红皂白地冠以『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死后鞭屍，家属顿时成为反革命家属。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吴镜侬夫妻不堪凌辱，抗暴自杀。其家属子女唯恐成为反革命家属，将二老匆忙火化，对外宣称病故。直到一九七九年改正后才敢公佈死亡真相。

自杀並非是一种懦弱的行为，自杀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抗暴自杀、不甘受凌辱而自杀、为疾病解脱痛苦自杀（包括安乐死）、拯救亲人或他人而自杀，更高尚的还有把生的权利让给他人而自杀，如此等等，更有深层次的宗教、遗传、道德、伦理、信念、信仰、族群等等内涵。而在中共执政年代，在某一个相对集中的历史时期如肃反、反右、文革，发生如此广泛而大量的自杀现象，尤其是在知识份子中的自杀行为，绝非寻常。难道仅用『平反』、『改正』二字可解脱得了的吗？难道是『必要的，正确的』吗？對於那些反右前后被无辜迫害致死的人，中共是负有血债的，负有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刑事和道义责任。这笔历史账一定会清算的，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书写的。

抗暴自殺者分類

我们把因反右运动而抗暴自杀的人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反右期间和反右以后，在时间上延伸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共辑录八十五人；第二类是文革中甚至文革后发生的右派抗暴自杀者，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把受尽凌辱的右派，又一次作为阶级敌人揪出来批斗，许多右派不愿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而抗暴自杀，共辑录七十人；第三类是为自己的亲人划为右派而自尽的父母子女，共辑录八人。这也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特有现象。如杨万才的父母为儿子划为右派而自尽，周居正烈士二位儿子、彭文应的小儿子、宋林松教授新婚二月怀有身孕的妻子，都因亲人划右、不堪忍受凌辱而自尽。

由於中共封锁、销毁、篡改大量档案材料，以及年代久远、亲人断绝等因素，五十多年来抗暴自尽的右派名单我们仅仅收集了一百多人。而且更多的饿死、病死、折磨而死者尚不包括在内。反右运动后受到劳动教养处置的右派便有十五万之众，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有去无回，甘肃夹边沟、北大荒、兴凯湖、北京茶淀、青海恰卜恰、四川沙坪和四一五筑路队、安徽白茅嶺等劳动教养的右派份子中，饿死、病死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员，已经无从统计了。

反右运动中自杀现象甚至引起了中共官方的注意和震动。他们在内部定期印发一九五七年自杀行为的通报中，提醒各级领导采取防范措施。这是中共统治者前所未有的举措，

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我们也摘录一部分通报内容予以公佈，以供参考。

第一類 反右中和反右後自殺的右派

1. 俞彪文（1926-1957）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七年七月，在召开批判他的右派言论会的前夕，於中午在休息时在家跳楼身亡。

2. 範永壽（1936-1957）出身於孤儿院，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因传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受到批判。担心戴上右派帽子，在学生宿舍里自杀。

3. 湯非凡（?-1958）中国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反右后不久的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

4. 丁則良（1915-1957）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在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捏造出了一个『俞（瑞璜，物理学家）丁（则良）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为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兇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



反右中自殺的範永壽同學

5. 湯汝光（?-1957）云南昆明红色资本家、云南省政协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委员，本以为自己是响当当左派，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定为右派，於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

6. 江鳳英（?-1957）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右派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倒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他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

7. 石揮（1915-1957）著名电影演员，反右时刚完成一



一代巨星石揮

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於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污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电影管理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都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登上自上海至宁波的轮船，跳进吴淞口外的扬子江，年仅四十二岁。

石揮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曾发过一条内参《右派份子石揮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揮是否会跳楼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符，估计石揮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

8. 胡思杜（?-1957）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

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胡思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指名是『反动学者胡适的儿子』，虽然他早在四九年初，已经公开宣佈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限，故愤而自杀。



胡適夫婦與二子，胡
望與胡思杜（右，自殺）

9. 王志忠（?-1958）广东某县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标尚缺一名时补入名单凑了数。

他的处分是留校察看，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及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取消，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終於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向全县宣佈：『右派、特务、反革命份子王志忠畏罪自杀，死於汽车轮下。』

10. 黄倩（?-1958）广州水利水电设计院女技术员，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而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

11. 張若名（1902-1958）女，云南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周恩来初恋情人，二十年代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一九五八年在云南大学划为右派，在上午开完批斗会后，听说下午的批斗会还要加温。在中午愤而投入学校后门的盘龙江溺死。

12. 楊剛（1905-1957）女，作家、记者，与彭子冈、浦熙修並称为中国新闻界三大女剑客。江西萍乡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从事中共地下活动。中共掌权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反右高潮中跳楼自杀。她的死因众说纷纭，胡乔木说她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在精神极不正常情况下离开人间』，有人称她前几天参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大会深受刺激，也有人认为理想主义的幻灭是她自杀的深层次原因。

13. 曹立生（1939-1957）上海电力专科学校学生，工人家庭出身。反右时揪出批斗，投黄浦江而死，不足十八岁。

14. 新民（1930-1959）河北高扬人，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员。反右时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回京后向人诉说农民缺粮的情况。给人汇报上去，赶上最后一批右派，送京郊房山县造林大队劳动教养。他女朋友来探望，管警不让见，还说他坏话。他气愤至极，某天上山植林，他走到山崖边纵身跳下，死时不到三十岁。

15. 江顯良（1930-1964），上海文汇报记者，极右份子，宽大处理安置在上海郊区农村劳动，早出晚归，休息时间改造思想。盼不到出头日，跳楼自杀。

16. 劉玉良（?-1961）河北阜平县中学教师。划右后先送煤矿采煤，后又关进监狱，在狱中自缢身亡，留下遗书『我

死后请把我埋在阜平这块土地上』。

17. 賀永增（1929-1960）北大西语系学生，极右份子判五年徒刑，入狱不久在狱中自杀。

18. 張恕一（?-1957）北京图书馆专家，极右份子，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自杀。

19. 丁景才（?-1958）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划为右派自杀。

20. 陳友偉（?-1958）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组长，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划为右派自杀。

21. 楊庚（?-1958）通俗出版社副社长，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划为右派自杀。

22. 黄茂蘭（?-1958）北京大学气象系二年级学生，湖南人，划右后在北京玻璃厂劳动，受人诬陷偷雨伞，在广渠门外铁道线上卧轨自杀。

23. 王少桐（?-1958）光明日报记者，奉命采访鸣放，划为右派，家破人亡，愤而投江。

24. 李春潮（?-1957）广西僮族自治区文教厅长，早年参加中共，留学日本，抗战后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他的诗集由『胡风份子』贾植芳介绍出版，李也受株连。反右时划为右派，投河自杀。

25. 陳益勇（?-1957）广东师范学院的学生，因同宿舍调干生丢了钱，受怀疑被拘捕。同学集体到公安局和省委抗议，广州各大专院校有学生加入声援队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面安抚才返回学校，是当年有名的广州『陈益勇事件』。陈益勇与广东师范学院二百一十人划为右派，他愤而从教学楼顶跳下，被树干勾住，瞎了一隻眼睛。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26. 林自力，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北京市机织印染厂劳动。摘了帽子不准他回校继续读书，几度自杀。

27. 张仁和（?-1957）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父亲在肃反中被捕，母亲和姐姐一同自杀。留有遗书给他。张仁和划为右派后，决心随他母亲和姐姐而去，跳楼自尽，可惜落地未死，仅受几处伤，围观人员高呼口号『抗拒改造，死路一条！』。送去劳教。

28. 梅焕藻（?-1958）《文汇报》管理部主任，《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划为右派后，梅焕藻公开表示『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想不通。』他遭到批判，批判会上受到围攻。他当时冲出批判会场，跑上屋顶跳楼。据徐铸成回忆《文汇报》遭殃者十多位，其中最使他终生负疚的是梅焕藻，『他是《文汇报》第一个壮烈牺牲者！』

29. 戚学毅（?-1957）《中国青年报》编辑，戚并不是右派，他不愿违心地批判同事刘宾雁，在批判会场，突然站起来，冲向窗口鱼跃而下。生前曾对作家韦君宜说：『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死后追封『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右派份子。』

30. 乌寒冰（?-1957）著名作家，曾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反右时发现自己名字从出国代表团中划去，以为要划右派，愤而自杀。

31. 林澄（?-1959）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学生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因学医为农场干部治病。用手术刀割开自己腿部动脉，死在兴凯湖畔。

32. 郭可宏，北京司法局干部，与在上海的妻子均划为右派。郭去劳动教养前与妻子约定每周通一次信。妻子在上

海开煤气自杀，农场扣留妻弟发来电报，派人看守他。他估计妻子出事，在鸭棚里自缢身亡。

33. 鄭光弟（?-1963）北京大学学生右派，在北京团河劳动教养。他听信中共谎言『改造好了回到人民队伍里来。』因劳动表现好於一九六三年国庆节前夕摘帽，国庆前夕向队部请假回北京城观看烟火，遭队部训斥。他感到绝望，国庆之夜溜回北京，自北海公园桥上投水而死。

34. 黄德瑜（? ?1957）《新湖南报》编辑，该报社五十名右派中第一个自杀，在一次批斗后，只穿着短裤出走，当时是夏天，出走后下落不明，就此失踪。

35. 朱學達（?-1957）北大中文系优秀毕业生。开完批斗会后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一位看管他的女同志。他便借口请假上厕所，将新婚妻子送的手錶取下放在窗台上，纵身从五楼跳下。

36. 吴雲軒（1932-1962）上海普陀区光新路一小教师，退伍志愿军人，一九五七年因向领导提意见划右。一九六二年摘帽后跳楼自杀，不足三十岁。

37. 周金聲（1924-1960）江苏省人，上海市继光中学化学教师。划右后发配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劳动教养，不久惨死狱中，死时三十六岁。妻子儿子滞留青海。

38. 周覃藻（1920-1960）江苏人，上海市继光中学历史教研组长，划右后送去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劳动教养，一九六〇年腹泻不止惨死。

39. 徐大綱（?-1957）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拖拉机局职工，反右中上吊身亡。

40. 曹作仁（1933-1959）轻工业部二十二级办事员，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划右后送八一〇农场劳动教养。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在农场投井身亡。

41. 黄操良(?-1958) 人民日报国际部副总编, 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 一九五八年在反右补课运动中服安眠药自杀。

42. 王光浩, 北京新华书店职员, 划右后在八五〇农场劳动教养, 在开挖排水沟工地爆破时炸死。

43. 華德高(?-1957) 云南昆明师范学院学生, 一九五七年反右中自杀。

44. 穆國發(?-1957) 云南昆明师范学院学生, 一九五七年反右中自杀。

45. 戚學義(?-1957) 北京日报社记者, 一九五七年七月在批斗会上, 奔至四楼跳窗, 摔死在麻线胡同水泥地上。

46. 佟靄成, 河南人, 一机部子弟小学校长, 划右后北大荒劳动教养, 妻离子散, 用腰带吊死在一颗小树上。

47. 方玲達(?-1957) 女,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 批斗中喝毒药自杀。

48. 李都華(?-1961) 北京矿业学院助教, 划右后发配至北京最远的木城涧煤矿劳动教养, 一九六一年返校后精神压抑, 又受嫉妒。当年冬天跳入北海自杀。

49. 郭道宏(?-1961) 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右派。一九五七年提出『人都是自私的, 毛主席亦不例外』、『党员有党性而无人性』、『现在和中世纪封建社会没有两样』。划极右份子, 送劳动教养。因饥饿爬电网逃亡, 触电身亡。

50. 湯遠烈, 笔名老丁坎, 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 因作漫画『衣冠内是草』讽刺斯大林的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

料制成的』而划右，送四川省公安厅四一五筑路支队劳动教养，性格刚烈，撞崖而死。

51. 張羽高，四川自贡市文联主席，曾是大学教授，划为极右份子后『抹光一切生活』，便在市政府对面大茶馆门口摆桌子『下里巴人代书处』为人代写书信，生活清淡，又被取缔。领二十三元钱打扫厕所为生。年过花甲，昏倒厕所倒毙而亡。

52. 證光和尚，成都大慈寺和尚，反右时『畏罪自杀』。

53. 冉瑞竹（?-1959）四川省开县教师，划右后四一五劳教支队劳教，卒死於盐津滩头放炮工地。

54. 焦立民（?-1962）河南叶县人，成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毕业。其四弟焦若愚曾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驻朝大使。划右后处处受肘，一九六二年自缢於成都伙房街圣公会教堂。

55. 孟和（?-1957）中共成都市郊区党委干部，反右中自杀於郊区党委办公室。

56. 陳其炯（?-1957）四川省水利厅干部，水文专业。曾向郭沫若挑战，划右后自杀，『追认』为现行反革命份子。

57. 孫學文（1930-1957）甘肃兰州十中教师。一九五五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一九五七年划右后跳楼自杀。

58. 傅軍（?-1960）兰州文化局干部，划右后夹边沟劳动教养，饿极食毒蟾蜍中毒身亡。

59. 安立綏（1900-1960）甘肃景泰人，甘肃省政府参事，民革社会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二七年清华毕业后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历史系，曾留学西点军校。一九二九年在纽约加入中共，从事工人运动。返国后在甘肃平凉和青海任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军界要职。一九五七年反右中为流沙河《草木篇》辩护，划为右派。一九六〇年在绝望中投水井自杀。

60. 李學斌 (?-1958) 《长春日报》记者，曾发表《应声虫——东北人民大学胡显中右派言论破产始末》一文，批判右派份子胡显中。但自己也中枪落马，划右后在大连跳海自杀。

61. 姜福海 (?-1957) 安徽省淮北公路运输分局职工，批斗他右派言论当晚投淮河自杀。

62. 張僕，曾任冶金部副部长，李井泉的抗日挺进纵队参谋长。犯错误贬至四川嘉陵江机械厂，任中共厂监委书记。批评中共党委书记有家长式作风，遂被打为右派。他不承认，多次返京向老领导申诉，下放车间劳动不服管教，再送四一五劳教支队，精神失常死亡。

63. 王彬 (?-1957) 重庆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一九三九年曾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共。妻有杀父仇恨，在肃反中为肃反对象鸣冤叫屈，声言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个世界。划右后自杀。

64. 胡漢懺 (?-1957) 中共党员，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干部。在市委宣传部召开佈置反右斗争的会议后二个小时，用自备小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戳了五刀。事后宣佈他『畏罪自杀』。

65. 李銀凱，中共党员，原重庆唐家沱派出所所长。划右后送四一五劳教支队劳动教养，背炸药包上山，在五十米高的危崖上摔下而死。

66. 陶澤群 (?-1958) 重庆国营军工厂车间主任，中共党支部委员。鸣放中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书记厂

长不懂业务』而划右，送四一五劳教支队劳动教养。在处理哑炮时炸得粉身碎骨。

67. 畢長林（?-1957）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一九五七年与校长同赴庐山休养。反右时被点名批判。返校后有一教师探望他时告诉他这个消息，便惶惶不安，於点名当晚十时上吊身亡。

68. 林自力，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师，划右后因患肺结核，经不住重体力活，服安眠药自杀。

69. 彭先（1934-1957）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学生右派，一九五七年投江自杀。

70. 陸采夫（1905-1958）又名泽芹，湖南临沅人，湖南水利厅副厅长。曾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湖南省军委秘书，入黄浦军校第三期。一九二八年被捕获释后脱党。曾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部美军顾问组少将组长。划右后於一九五八年自杀身亡。

71. 趙樹濤（1929-1959）云南宾川人，中学教师。划右后送宾川太和农场第四生产队监督劳动，因偷吃花生，被中共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吊打拷问。自知生不如死，上吊自杀。

72. 王震之（?-1957）原剧本创作所所长，电影《内蒙春光》编剧。一九五七年担心自己划为右派，卧轨自杀。

73. 張友白（?-1958）上海新沪中学教师，反右补课中自杀身亡。

74. 武兆發（?-1958）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反右运动中自杀。

75. 張來楨（?-1964）四川省西昌女中校长，一九四八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年由张拱介绍同时加入中共和民盟。西昌『解放』时，为中共做过好事，但张拱只申报民盟不申报中共党员身份，使其成为假党员。划为右派后做零工杂活。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自杀。

76. 李伯雍（?-1964）四川省西昌师范校长，一九四八年张拱介绍同时加入中共和民盟。西昌『解放』时为中共做过好事，但张拱只申报民盟不申报中共党员身份，使其失去党员身份。划为右派后做零工杂活，一九六六年四清运动中自杀。

77. 楊匯川（?-1957）民盟四川成都支部成员。一九五七年划右后下放冕宁农村，育有三个子女，生活困难，跳水自杀，尸体无存。

78. 苟文純（1921-1959）四川綦江人，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但在入学以前已经在解放前担任过某银行行长。四九年后改任副行长，行长是不懂业务又很蛮横的中共党员。三、五反时诬他为贪污份子。账虽然查清，副行长却撤掉了。他愤而辞职，回綦江农村老家。一九五六年考入西南师院外语系，已有三十五岁。与小青年有鸿沟。『向党交心』时他说：『有必要吗？何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呢？』反右时划为右派，与一百多位师院学生送往农村劳动，他长期在银行工作，无体力劳动技能，饥荒中身体迅速垮掉，卧床不起。学校当局怕他死在学校，令他回乡。二天后倒毙在回乡路上。

79. 徐季正（?-1960）湖南常德人，出身书香门第。在湘西三十五个省立中学的会考中获得第一名。抗战开始，投笔从戎，报考国军军校，任军政部军需处财务检查官。一九四九年后担任重庆市食品公司财务主管。一九五七年向

『三害』提出批评，判为极右份子，送四十五筑路支队劳动教养。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因公砍柴摔死山崖。

80. 黄启风(?-1957)安徽省无为县农业局，旧政权留用人员，无学历和专长，一般的记账员。因为在旧政权做过事，所以战战兢兢，胆小怕事。一九五七年八、九月间掀起了抓右派的高潮，黄启风太太张兰芝上街买菜，遇到黄启风同事的家属，偷偷告诉她：『你丈夫已内定为右派了，明天就要开他的批判会。』当晚张兰芝把消息告诉黄启风，黄却反应冷淡，叫她带孩子先睡下，自己写检查。半夜三更他出去跳井。张兰芝也随后自杀。遗下一个七岁的孤女。

81. 章鹏，北京大学物理系复员军人大学生，被他哥哥揭发检举而划右，自杀於狱中。

82. 朱家玉(?-1957)女，北京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教师。才貌双全，跳渤海而死。

83. 张显良(?-1964)上海记者，一九六四年在农村自杀。

84. 董时光(?-1960)西南师范学院教师。一九六〇年在劳改中吃饱撑死。

85. 浦厚生，上海市虹口区某银行办事处副主任。妻子金力平也是右派。浦厚生在肃反运动中捡到一张肃反对象名单，说了句这是张黑名单。他是留用的旧职员，划为历史反革命右派，判刑四年。青海劳改，死不见屍。

中共内部通报

一九五七年中共官方内部通报过的二十九起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约两个月。一九五七年在反右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从来没有公开报道过。这些都是作为内参上报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的案例，也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在这二十九起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部是因为反右等政治运动所致。下面是摘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中共内部通报的部分内容：

一九五七年 2214 期第 13 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团组织有不可能推卸的责任。

一九五七年 2215 期第 27 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亡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一九五七年 2216 期第 52 页上的一篇报道中说：两百多名归国华侨学生，（反右中）斗争了 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一九五七年 2218 期第 13 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自杀，在运动中投河自杀了。

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一九五七年 2219 期第 12 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於逢自杀事件》，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於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损害了，……於先生終於被迫自杀了。

一九五七年 2220 期第 13 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文章中提到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了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了『李奎顺自杀事件』。

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

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文章说到：鉴於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相同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一九五七年 2223 期 19 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有一教授崔永福自杀，他不是运动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一九五七年 2224 期第 13 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说：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

一九五七年 2149 期第 180 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一月二十五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在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一九五七年 2150 期第 208 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一九五七年 2252 期第 26 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重庆反右派中，最近连续出现自杀或伪装自杀及逃跑、躲藏事件。其中提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忭二日晚八点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亡，自杀行为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佈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份子李友霖六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一九五七年 2254 期 11 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二十三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七月一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了，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籍，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一九五七年 2256 期 28 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七月五日至八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

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二十一岁）於八日中午自杀身亡。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於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她趁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随即奔回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一九五七年 2256 期 31 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於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一九五七年 2263 期 29 页，《安徽省右派份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份子、民革安徽省常委兼组织处处

长、省文史馆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七月十二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一九五七年 2274 期 7 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份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七月二十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份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但从思想领导上检查，主要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份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份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一九五七年 2281 期 11 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一九五七年 2281 期 15 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六人，未遂二起，伤二人。

死者除一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四人，共青团员一人。按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

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一九三九年参加过国民党，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之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又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分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一九五七年 2289 期 15 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文章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一九五七年 2304 期 55 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份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十八人自杀身亡。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五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畏罪自杀者四人，农民二人。

一九五七年 2307 期 18 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八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三起自杀身死事件。

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别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九月五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五十七起（内未遂九起）。

一九五七年 2320 期 9 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十二日到二十五日已有十一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汉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农八人，下中农一人，贫农一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

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份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於社会主义大辩论。

一九五七年 2322 期 9 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杀的有五人（一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份子和中右份子感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名右派份子，上学期末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八点谈的，十点即上吊死了。

一九五七年 2234 期 14 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一九五七年 2332 期 11 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五十三个县发生一百零五起，死九十五人。据七十九起自杀事件统计，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有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五人；顽伪人员一人；富裕中农四人；中、贫农十九人；军属二人；村、社干部三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十二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三十八起。还有一个原因是，由於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採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十四起。

一九五七年 2361 期 3 页《党内右派份子、大众日报总编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中共山东省委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刘建十月二十八日晚自杀身亡。年三十九岁。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自杀，其中也有自愧成份。《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批示召开各种会议，並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罪行，肃清影响。

第二類 文革中自殺的右派

1. 薛壽虎（1937-1967）男，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在校时成为学生右派，其父也是右派。但因其态度较好，且右派言论不重，仍然分配在上海工作，但不能教语文，只能教体育。薛长得很英俊，也很有才华，美术很好，学校的宣传画、美术字常常由他包办。他太太是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中专），分到贵州，不习惯当地生活，回到上海一直没有工作。与薛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马鞍山煤矿到上海招工，在办薛的调动时，马鞍山知道薛是右派，连他妻子一併退回，薛只好仍回北郊中学教体育，仅靠五十六元工资生活。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薛虎被工宣队在大会上点名，说他至今还没有一张大字报，上窜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薛自知难逃批斗，上午

点名后，中午回家，即在家中厨房开煤气自杀，用毯子堵好门缝，其妻与两个四岁和六岁的儿子一起自杀，从现场看他最后死的。他自杀后单位认定他自绝於人民，还在校内开了批判会。据说薛成为右派与其父是右派有關係。因此他要两个儿子一起死，以免以后也成为右派。

2. 安大强（1938-1968），清华大学学生右派，十九岁清华毕业送往农村劳动。摘帽后分配到天津电器研究所工作。因是摘帽右派始终未结婚。文革开始多次被批斗和殴打。一九六八年夏天在该所传动楼跳楼自杀，死前为自己买了一块猪头肉饯行。

3. 程應銓（1919-1968）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主张保留北京旧城和古城墙，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妻子离婚，二个孩子随妻子。住单身宿舍。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逼迫他交代历史问题，在当年十二月大冷天在清华大学游泳池中溺死。他会游泳，可见不是堕水溺死的。

4. 黄必信（1925-1966），黄炎培的儿子，他与大哥黄万里等七人一家出了七名右派份子。一九五七年在大连工学院无线电工学系担任讲师时划为右派。不准讲课，工资减半。一九六〇年摘帽后重上讲台。学生中有调干生，考试不及格。批斗他打击工农干部。他的小女儿在一九六六年失踪。黄在当年六月十四日文革开始不久在家中上吊自杀。他的妻子俞启运是同校物理教师，於一九六八年黄必信逝世二年后隔离审查时，在牛棚中自杀身亡。

5. 胡明（?-1966）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撤消系主任职务。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不久，在北师大主楼北宿舍楼上跳楼自尽。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6. 金志雄（？-1966）女，上海市复兴中学历史教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降至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文革开始遭学生红卫兵殴打污辱。学生用纯剪刀剪去她的头发，撕下她一块头皮。又被殴打致重伤。回家不久追打到她家。金志雄听到砸门声，不堪再受凌辱和毒打，立即上吊，自杀身亡。

7. 雷愛德（?-1968）原为医生，因爱开玩笑於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曾任天津医科大学教材科科长。文革时关进牛棚受迫害，吞服安眠药死於牛棚。

8. 李長恭（?-1966）在《新湖南报》工作时划为右派，该社共划了五十四名右派，送往湖南坪塘新生水泥厂劳动教养。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他被打为该厂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成员，跳崖自杀。

9. 陸家訓（1925-1966）江苏海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教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因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和有『中统特务嫌疑』而被批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跳楼自杀。

10. 陸進仁（?-1966）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一九六六年八月揪出在大会批斗、罚跪、坐喷气式、挂牌游街。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与妻子吕静贞一起在农大教工宿舍七号楼上吊自杀。陆进仁夫妻安分守己，老实忠厚。

11. 孫歷生（1934-1968）女，北京第三女中教师。孙历生在一九四九年在第三女中读书时已成为中共党员。一九五二年高中毕业留校担任教师。反右中因批评领导而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怀孕期间被迫离婚，送往天堂河强迫劳动。一九六六年揪回学校批斗，遭红卫兵野蛮殴打，一九六八年

关进学校的牛棚『隔离审查』，七月十二日在牛棚中自杀。时年三十四岁。

12. 孫明哲（?-1968）原为北京地质学院政治教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劳动。摘帽后在学校总务科工作。文革中再度揪出，诬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另二位成员是右派教师吴鸿邦和李锦才。一九六八年八月『工宣队』进校不久自杀身亡。

13. 孫哲甫（1932-1967）上海位育中学（五十一中学）教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又遭残酷批斗，因为他还戴着右派帽子，比其他教师受到更严重迫害。一九六七年他母亲从乡下到上海来看他，他送母亲登上回乡的小船后便跳河自杀，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14. 王鴻、薛挺華夫妻，均为北京地质学院一九五五年毕业生，留校当助教。一九五七年夫妻两人同时划为右派份子。文革中又被指控为『右派反党集团』再遭迫害，夫妻俩双双自杀，留下儿子王磊，由亲戚扶养成人。

15. 吴迪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原为俄语教师。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遭到红卫兵野蛮殴打，他们把以校长、党委书记常溪萍为首的一百九十多名教职员工从家中揪出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牌子，然后迫他们跪在学校共青团广场上批斗。一九六六年九月，他与担任银行职员妻子安排好后事，把领养的女儿送到外婆家，钱都取出来放在抽屉里，吃一餐最后的晚餐，换上乾净的衣服，准备两条毛巾，毛巾扎上绳子，夫妻俩人穿得乾乾净净，各吊死在一扇窗框上。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16. 吳興華（1921-1966）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份子。一九六二年摘帽后留在西语系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在北大校园劳改时，红卫兵强迫他喝下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出的污水，中毒昏倒，说他装死。当天夜里，痛苦地去世。

17. 喻瑞芬（1916-1966）女，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员。一九五七年附中的三个生物教师都划为右派份子。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在学校里遭红卫兵毒打，并被沸水浇烫。死后还被鞭屍。

18. 蘭鈺（1919-1966）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新华总社地方新闻部副主任、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划右后送北大荒劳动。不畏强暴，自杀身亡。

19. 周鋒（?-1966）北京大学西语系极右份子。与同系学生极右份子顾文选一起主持控诉会。他也划为极右份子，送去监督劳动。四年后修完学业分配到北京大学附属工厂劳动，文革后他在北大的牛鬼蛇神队劳动，黑袖套上写有『右派周锋』的字样。后又进入『黑帮大院』，即『监管大院』。他天天挨打，身体已经垮掉了，不久便死去。

20. 傅雷（1908-1968）中国著名翻译家，一九五七年中阳谋圈套划为右派份子。文革中又受残酷迫害。傅雷性格刚烈，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一起自杀。

21. 黃紹竑（1895-1966）国军上将，著名爱国将领。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因提出『以党代政』理论划为右派。文革初期受到残暴冲击，二次服毒自杀未遂，第三次用剃刀刎颈自杀。

22. 陳夢家(1911-1967) 国学大师、考古学家、新月派诗人。一九五七年因反对文字改革运动和批评中共的三害而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更大冲击。他最后的遗言是『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一九六七年在住所自缢身亡。

23. 謝家榮(1898-1966) 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矿床学奠基人、地质部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玉门油田、大庆油田、大港油田的发现者。一九五七年与他的长子谢学锦一起划为右派(谢学锦亦为中科院院士)。一九六六年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折磨,与夫人吴镜儂服安眠药自尽。

24. 浦熙修(1910-1970) 女,中国著名新闻三大女剑客之一。民盟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因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受到批判』一文影响划为右派,当时她担任《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一九七〇年不堪造反派的凌辱和污蔑,愤然谢世而去。

25. 施永佑(1936-1966) 上海市人,上海交大学生右派,红卫兵抄家时自三楼跳楼自杀。

26. 馮鬱華(?-1968) 上海交大涡轮机专业右派学生,改正后分配到新疆水利厅机械厂,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冲击,上吊自杀。

27. 章信舫(?-1968) 上海交大物理专业右派助教,发配新疆劳教,改正后分配至石河子医专,文革中整死。

28. 黄小痕(1936-1966) 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学生,新疆劳动教养,文革上吊自杀。

29. 肖小塵,上海美术学院学生,批评简体字而划右,新疆劳动教养时人间蒸发。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30. 胡繼宏 (1937-1967) 上海电力专科学校学生，中右份子，分配长沙电工技校，文革中按漏网右派揪出批斗遭毆，自缢身亡。

31. 孫國盈 (1935-1967) 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右派，改正后在同济大学当教师，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

32. 朱先煌 (1903-1966) 山西人，山西农校教务长，划右后留校。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被红卫兵打死。

33. 郝常磊 (1935-1966) 山东大学学生右派，文革开始后上吊自杀。

34. 胡平 (?-1966) 《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划右后劳动教养，文革开始自杀。

35. 林安平 (?-1966) 《人民日报》图书馆管理员，划右后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教，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上吊自杀。

36. 李宗津 (1916-1977) 江苏武进人，名画《东方红》、《飞夺泸定桥》作者，医学界最大右派、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李宗恩之弟，划右后不准作画，一九七七年上吊自杀。



抗暴自殺的畫家李宗津

37. 許世華 (1920-1966) 福州人，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一九三九年在南平入党，毕业於西南联大和北大历史系。一九五〇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一九五七年划右后降职降薪。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又受冲击，在西苑投水自尽。

38. 吴道生 (?-1970)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讲师。毕业於中央大学和华北革大，划为极右

份子后北大荒劳教。五年后返校，妻子离异，独自带小儿子住单身宿舍。一九七〇年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北外，勒令他交代问题。一九七〇年在湖北沙坪五七干校上吊自杀。

39. 林墨蔭（1929-1968）北京地质学院讲师，一九五二年北大地质系毕业。曾参加地下党活动。一九五七年因有托派嫌疑不断受审。划右后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教养三年。摘帽后在北京地质局实验室工作。文革中揪回地质学院批斗，不堪折磨自杀。

40. 盛荃生（?-1966）北京女三中教师。一九五三年北师大毕业，曾是黄药眠研究生。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中批斗三十多次，迫疯而死。

41. 沈巧珍（1934-1966）女，黑龙江清江人，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共青团员。鸣放中因厨房伙食不好，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章回小说《李壮士打狗孝子》。讽刺湖南籍总务长嗜食狗肉，食堂管理员拍马屁打死进校偷食的野狗孝敬他。划右后劳动教养，只有二十元生活费。一九六〇年摘帽。一九六六年关牛棚，剃鸳鸯头戴高帽子游街，皮鞭抽打，不堪虐待自溺身亡，遗下一男一女。

42. 石盘（?-1966）北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曾任陆定一秘书。一九五三年因作风自由散漫而退党。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红极一时，高调批右。一九五八年交心运动说他假交心，成为批判重点，划为右派，关进北苑收容所。一九六〇年陆定一帮他说话，调回北师大任图书馆管理员。文革中又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是陆定一秘书、右派，又自命清高。跳楼自杀身亡。

43. 向達（1900-1966）湖南溆浦土家族人，著名历史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学家、考古学家。北大图书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划右后留校。一九六六年文革后又被揪出，在系办公室二楼平台被斗，跪在烈日下暴晒。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屋门反锁不准上厕所，因有肾病，尿毒症发，不准抢救送医院暴毙。

44. 蕭光琰 (?-1966)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〇年举家从美国归来。一九五七年划为中右份子，成为内控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工宣队把他送进牛棚。经不起批斗在牛棚中自杀。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称其自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蕭妻甄秦辉拉回来继续交代，甄请假回家与十五岁女儿一起服安眠药自杀。

45. 陳雲從 (?-1966) 汕头中学教师，曾带领学生到广东揭阳中共游击队参加革命，告诉学生『世界上没有一个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合理想的了。』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服毒自杀。

46. 田保生 (?-1966)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翻译。原来在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经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教授动员回国。田保生与钱端升一同划为右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田保生和妻子双双自杀身亡。

47. 蔡克誠 (1924-1966) 《新湖南报》编辑，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中诬陷他翻案，严刑拷打，凌辱至死。

48. 肖其中 (?-1966) 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右派，自杀於北京团河农场。

49. 邱原 (1928-1966) 笔名邱漾，四川井研人，四川

省文联创作辅导部专业作家，博学多才，又是著名孝子，节衣缩食供弟弟读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是流沙河、周克芹等作家的引路人。邱原为人豁达，喜交友，酒酬放言成为『四川省文联贝多菲俱乐部』成员，划为右派，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在成都盐市口开印制小店，印饭票、讲义为生。还收容生活困难的右派。公安局把他们当作『反革命集团』。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又受冲击，他用砖头磨尖筷子插入动脉而死。

50. 胡正華 (?-1979) 四川省银行职员，湖北人士，志愿军转业军人，划右后劳动教养。摘帽后分配在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至退休。一九七九年改正后因痼疾缠身跳楼身亡。

51. 金勝利，原籍上海，原为孤儿，六个月被人领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反右后勒令退学，下放农村。潜回上海，改名换姓参军新疆服役。加入中共，任连级干部。文革中写标语反对毛泽东、林彪，案发自杀身亡。

52. 陳賁 (1914-1966) 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地质系毕业，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共，从事中共地下活动。曾任燃料工业部总地质师，肃反和反右中为错批的肃反对象和右派说话，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党籍公职，流放青海劳动教养。文革开始，他又被当作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批斗凌辱。愤而自尽在戈壁滩上一间破败的小屋里。死后戴上『畏罪自杀的反革命份子』帽子，开了三天三夜缺席批判会。

53. 敖乃松 (1934-1973) 北大图书馆管理系毕业。在北京图书馆因向领导提意见划为右派，劳动教养。强迫与新婚妻子分手。在北京团河劳教农场，他将自己和妻子生离死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别的爱情故事写成小说，给场部抄走。绝望中於一九七三年投河自尽。

54. 蕭也牧(1918-1970)浙江吴兴人，著名作家。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五七年反右前他的作品屡遭批判。反右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为人坦率善良。反右运动中被人告密划为右派。一九六七年文革中他为小说《红岩》的作者说话，又被揪出，赶入牛棚，随『牛鬼蛇神』大队发配河南黄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作为『现行反革命份子』活活打死。

55. 褚松村(?-1966)兰州大学地理系右派学生，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跳楼自杀。

56. 童俊亭(?-1966)郑州师范学院教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划右后下放学校图书馆劳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校内贴出要求『将童俊亭遣送回原籍』的大字报，阅后从学校文科楼跳楼自杀。

57. 王秀敏(?-1966)郑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划右后下放学校图书馆劳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校内贴出要求『将王秀敏遣送回原籍』的大字报，阅后跳楼自杀。

58. 王開澤(1935-1966)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会文娱干事。划右后送北大荒劳动教养，任右派队副队长。摘帽后留八五〇农场成为『二劳教』。文革开始在五分场旁新华大队自杀。

59. 劉友乙(?-1966)海军军事学校管理部中尉参谋，划右后送郭堡水库劳动，一九六六年上吊自杀。

60. 陳元橙(?-1966)四川省西昌中学校长，一九四八年由张拱介绍同时加入中共和民盟。西昌『解放』时为中共

做过好事。但张拱只申报民盟不申报中共党员身份，致使其成为假党员。划为右派后做零工杂活，一九六六年文革运动中自缢身亡。但验屍员对其女儿说：『你爸爸死得冤枉，是被红卫兵打死后才掛上绳子的。』

61. 盧賢軍(?-1966)北大新闻系学生，爷爷破落地主，父亲国民党军官，他是二房同居太太所生。因出身不好划为右派，下放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文革开始不久被揪出，跳楼身亡。

62. 王季洪(1928-1977)中共成都铁路局党委宣传部长，郑州大学文学系毕业。出身书香门弟。其新婚妻子被情敌、成都铁路局副局长看中而遭迫害。划为极右，送四一五筑路队劳动教养。涉案『中国马列主义者同盟』，加重处分。妻子被情敌霸佔，一九七七年摘帽后与妻子和儿子见面，深受刺激，突发精神分裂症而亡。

63. 佟惠林(?-1966)十四岁参军后一直在中共军队里服务。反右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大尉协理员。向领导提意见划为右派。郭堡水库劳动。文革中又被揪出批斗，身挂八十斤重的铁牌游街，不堪受辱，跳入自己建造的郭堡水库淹死。

64. 帥學立，军中右派，郭堡水库建成后留在水库工作。文革中遣送回老家贵州农村，因出身不好挨批斗，返回山西郭堡，往返三次，身无分文，不得安身，投水自尽又淹不死。回到岸上找块石头绑在身上，从桥上滚入水中淹死。

65. 徐秀圃(1932-1966)女，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已婚育有儿女。与师院一百多位右派学生送往农村劳动。劳动队解散后，继续回校读书，一九六三年毕业。分配到江津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地区江北县。即叫她参加四清工作队搞四清。她努力工作、能说会道，招来别人嫉恨。四清工作团长亦遭到『重用阶级敌人』的攻击。文革开始，把她当作『阶级敌人』活靶子，便抹喉自杀。

66. 水枏，水梓三弟，甘肃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划右后留下遗书『士可杀不可辱』离家出走。

67. 陳天國 (?-1968) 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政治上长期不受信任，爱发牢骚，划右后贬至摄影棚打杂工。一九六八年隔离审查，在锅炉房烧开水。一九六八年去杭州灵隐寺，在一颗千年古树上吊死。

68. 张赢 (?-1966) 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划右后发配边远地区。一九六六年议论林彪，打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在劳动中跳进烟囱自杀。

69. 楊煥洲 (?-1966) 上海交通大学原教学行政科副科长，右派。一九六六年卧轨自杀未果，又跳楼自杀。妻柴慧敏上海中学俄语教师，一九六六年跳楼。

70. 葉紹林 (1934--1967) 浙江江山人，上饶师范附小教师。划右后农场劳动。摘帽后任农场管理员。与隔邻农场工人妻发生暧昧关系。文革后该工人当上造反派头头。其妻揭发了他。叶先杀死她后再举刀自杀。

第三類 因本人劃右導致家屬自殺

家属为亲人自杀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引起的特殊社会现象。中国人历来看重家庭观念，本人划为右派，引起亲属自杀。右派的亲属担心亲人受苦受难，愿为亲人承担灾难。例

如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二次自杀，年仅十九岁；周居正烈士的长子周复生镰刀割喉自杀，小儿子周复兴投嘉陵江自尽。

本类家属自杀案例中，尚应包括夫妻双双一起自杀的情况，例如傅雷朱梅馥夫妇、谢家荣吴镜依夫妇、黄启风张兰芝夫妇、薛寿虎夫妇连同二个儿子、北农大教授陆进仁吕静贞夫妇、北京地质学院王华薛挺华夫妇、华东师范大学吴迪生夫妇、外交学会田保生夫妇、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全家三口、北京司法局干部郭可清夫妇等。

1. 楊萬才(1938-)上海市人,出身贫苦,父亲拉黄包车。一九五七年刚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因写信给素不相识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请教学术问题,受株连划为右派。拒不认罪又划为极右,发配新疆伊犁劳动教养。他父亲绝望了,愤而自杀,随后母亲也服毒自杀。

2. 吉世林,原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秘书。鸣放期间,奉谢觉哉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谢在家中接见她。接见时吉世林在场。林希翎成为大右派后,吉因此事划为右派,送回老家农村监督劳动,妻子离婚带走孩子。母亲见此状况,愤而自杀。

3. 蔣維喬(?-1957)又名因是子,中国有名气功师,著有『因是子静坐法』。反右时他的儿子回家告诉他已划为右派。他当即气愤地说,我不想活了。旋即上了练气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过来奔上楼去,老人已死去,时年八十多岁。外界不知他的死因,以为是他的气功不灵光而死。

4. 黄祖德,同济大学校医,一九五七年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因同情右派同学,而在档案里记上一笔。是内控右派。因不堪凌辱在校门口撞汽车而死,其父母闻知先后悬

被迫自杀的右派份子

梁自尽。

5, 甄秦輝,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之妻, 一九五〇年举家自美国返国。丈夫划右在文革中自杀。造反派逼令她交代罪行, 携十五岁女儿一同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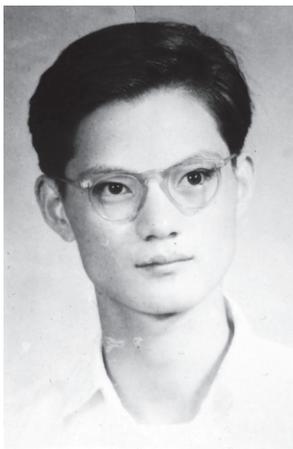
6, 柴慧敏, 上海交大原教学行政科副科长杨焕洲之妻。杨为脱帽右派, 一九六六年文革中跳楼自杀。柴闻讯后也随之跳楼。

7, 俞啓運 (?-1968), 大连工学院教师黄必信妻。黄自杀后二年工宣队令黄妻、同校物理教师俞启运回校交代罪行, 俞自杀, 女儿失踪。

8. 馬宛琴 (1940-1968) 苏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女教师,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宋林松 (原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 新婚二个月的妻子, 刚怀有身孕。新房是供新婚夫妻专用的苏州网师园『小姐楼』。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宋林松又被造反派无端揪出, 宋林松愤而抗暴切颈动脉自尽, 因头垂下压住动脉伤口, 致失血不致过快, 而且同室起床小便发现及时抢救了回来。造反派反而认为他是『畏罪自杀』一家有罪。为挖掘他的罪行, 派二人去苏州威逼马宛琴, 故意隐去宋已抢救回来的事实, 恶毒地说『宋林松自绝於人民, 与人民为敌, 你要划清界线, 交代他罪行。』马宛琴闻知, 以为宋已亡故, 悲痛欲绝, 当晚毅然投井自杀, 她已怀有身孕, 造反派害死两条人命。

宋林松当时生死未卜, 他曾留有已签字的离婚协议书, 保护妻子免受株连。自尽前又留下遗嘱, 说他既无罪可畏, 更与新婚妻子无关。马宛琴迫害致死, 牵涉二条人命, 年仅二十八岁。每当提及此事, 宋教授仍无限追思, 唏嘘不已。

宋教授十分痛恨逼死马宛琴的兇手。五十二年后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忆道：『逼死吾妻马宛琴的有二个人，其一是姜惟诚。一九五八年与我同入中科院物理所。不过姜毕业於南开大学，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我们在同一科研小组，他是左派，我是右派。他做电子仪器工作，我从事物理研究工作。此人城府很深，對於一九六三年我的考核成绩远高於他，因而是否耿耿於怀我不清楚。凭着他的政治表现，到一九七九年他已高我二级，又很快入了党，升高级研究员职称，担任国家磁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虽然他对磁学一窍不通。另一个逼死无辜的马宛琴的兇手名叫张守训，党员复员军人，业务上是姜惟诚的徒弟、助手。』



北大物理系學生右派宋林松

2009年7月17日

十五、爲右派量身度造的 勞動教養制度

蘇聯的昨天是中國的明天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中国流传着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集体农庄庄员幸福美满的生活羨煞了不知多少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读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文学巨匠索尔仁尼琴一百五十七万九千字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严酷的事实告诉中国人，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索尔仁尼琴（1919-2008）诞生於十月革命的烽火中，他是一位中学数学教师。二战期间在苏联红军服役，当个尉级军官，並立有战功。一九四五年因为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遭到逮捕，在劳改营中服苦役度过八年时光。后来被放逐到前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並在那里治愈了胃癌。

出狱以后不久，他发表了第一部以他在集中营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伊凡 - 杰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日》。小说主人翁伊凡 - 杰尼索维奇原来是集体农庄庄员，卫国战争中上前线作战，被德军俘虏后又趁机逃回部队。不料反而被

逮捕审查。为了活命他招认自己是德国间谍，结果以叛国罪判处十年徒刑，关进特别劳改营。由於这部小说是前苏联文学史上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的生活，又经最高当局批准，顿时成为苏联文坛的轰动性事件。可是他仍然遭到全苏作家协会的开除处份。待这部中篇小说流传到西方后，又引起西方极大关注，作者也一举成名，於一九七〇年获得了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中已经『在黑暗中依靠囚犯们记忆』写成了《古拉格群岛》的初稿。他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用最细小的字体书写蚂蚁般的天书，塞进小瓶里秘密隐藏和传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三年，他的这部巨著秘密送往国外，随即於一九七四年在巴黎问世。

他立即被当时的苏联当局斥责为叛徒，並以『叛国罪』驱逐出境。离开苏联后，居住於德国、瑞士和美国。他曾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针，险些丧命。苏联解体后於一九九四年才回到俄罗斯。先后又出版了《癌病房》、《崩溃的俄罗斯》等著作。

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群岛並不是地名，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俄文中的《古拉格》（Gulag）是俄文『劳改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的缩略语，最初隶属於克格勃（全俄肃反委员会）。古拉格群岛这个阴森恐怖、令人胆颤心惊的名字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劳改营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每个领域，无所不在，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

为右派量身度造的劳动教养制度

在苏联的第二领土上，处处佈满监狱和集中营。犯人们生活在极端严酷的政治和生活条件之下，没有自由，没有面包，没有衣服，却又无法逃离群岛。作家借以比喻苏联人民生活失去自由的残酷制度下，从而抨击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和集中营制度。

追溯古拉格群岛的历史，它最早诞生於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在靠近北极圈的白海中的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y）上建立了第一座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反对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和不同政见者，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宗教界人士。

自此以后，古拉格模式在全苏越建越多，一九三五年已有十四处，经过一九三七年起的肃反运动，到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到八十五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囚犯带罪上前线。二战结束时减少了约三十处，剩下五十八所，但到一九四七年，又回升到七十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前夕，全国竟达一百七十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象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罩在苏联的版图上，俨然成为苏联的『第二领土』。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清除《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题目），古拉格的数量一下子减少一百另二所，尚剩六十八所。此外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间，苏联内务部又建立了十二所残酷监狱制度的政治犯特别集中营。所以在前苏联解体前夜，还有八十所。

建立第一座劳改营的索洛维茨基群岛面积三百平方公里，现有人口不足三千人。主岛上有一座建筑类似克里姆林宫的修道院，外观阴冷恐怖。据史料记载，这座修道院始建

於十五世纪，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目前已成为《监狱历史博物馆》。

自十九世纪上半叶起，这座修道院已用来关押囚犯。这里流放过十二月党人，关押过社会民粹党人。十月革命后关押的囚犯从最初的三千人到一九二七年的一万三千人。囚犯们在岛上强制劳动，採伐木材、开採泥炭、修筑道路、建设房子、加工渔猎海产品等。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介绍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囚犯。有一位国营大企业的厂长在歌颂斯大林的大会上，第一个停止鼓掌被判刑十年；一位裁缝不留神将针插在有领袖头像的报纸上；铁路工程师建议多拉车皮被指为破坏火车头和铁轨；十七岁小姑娘波切拉参加读书俱乐部被送进劳改营，而她十八岁以上的朋友们统统枪决了……。关押的囚犯从十四岁到八十多岁，内中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各级党政官员、元帅将军以及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群体，当然最大多数还是知识份子。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超强劳动的囚犯们相互之间往往还要夫妻出卖、父子反目、母女成仇，这里没有亲情和信任，只有『大义灭亲』。作者在第七部《斯大林死后》的第二章《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中说：『它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它吞进来的只是敌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产的财富和尸体。』

前苏联哲学副博士恰利科娃说：『一九三七 -- 一九五〇年集中营死亡一千二百万人，加上枪毙富农、集体化被镇压和饿死的二千万人，死亡总人数达三千二百万。』

赫鲁晓夫大权独揽后，一方面在讲台上攻击斯大林的监

为右派量身度造的劳动教养制度

狱暴政，另一方面毫不逊色地继续强化劳改营制度。在斯大林后继者们的统治时期，『仍然有千百万人成为不公正司法制度的牺牲品』。索尔仁尼琴一针见血地指明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根源所在：『统治者换了人，但古拉格群岛依然存在』；『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这群岛今天依然存在，这群岛今后还要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不然的话，把那「先进学说」的失算——人们并没有按照它设想的样子成长——的责任推到什么人身上去呢？』

索尔仁尼琴的答案不仅适用于昨天已经垮台的苏联，也完全适用于今天貌似强大的中共。中共自襁褓中起一直由卢布喂养长大。劳改制度、人事档案、户口管理、组织体制、举报告密、群众专政，无一不抄袭苏联老大哥的榜样，亦步亦趋，维妙维肖。中共的成长壮大发展惊人地像昨天的苏联，中共即将到来的衰退败落灭亡也会像昨天的苏联。诚如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所说，答案很简单，『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使然。

为右派量身度造的中国古拉格

青出於蓝而胜于蓝。中国小兄弟样样事情要胜过苏联老大哥一筹。苏联在十三年内非正常死亡三千二百万人；原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序言中说：『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而

辛子陵在另一本书中指出的人数达七千五百万人。

中国向苏联学习，从立国开始便建立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制度。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系统地提出了『人民的国家要强迫反动阶级的人们劳动』的观点。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后又进一步指示，把那些在镇反肃反和历次运动中被杀者，包括错杀者的家属，都送去劳动教养。由此又波及各种未杀的反革命份子的家属亲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按照邓小平为组长的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规定，右派份子分六类处理（学生分四类）。除第一类是判刑法办的现行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右派份子外，各地区各单位被开除公职的大批右派份子无法安置，成为烫手山芋，流落社会必成公害。毛泽东便将『劳动教养』体制法律化和规范化，这是斯大林所不及的。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青岛省委书记会议上说：『除了少数著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搞个劳动教养条例。』他迫不及待地指示周恩来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递交批准了《国务院關於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此后便对第二、第三类右派份子开除公职和劳动教养同时执行。

周恩来差强人意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了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劳动教养是预防性的行政措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劳动改造是刑罚执行措施，处理敌我矛盾。即二者的区别在於罪与非罪。刑事犯定罪靠事实和证据，而政治犯和思想犯的『罪』却应当如何去界定呢？毛泽东用区分香花毒草的意识形态标准替代法律意义上的罪与非罪。

为右派量身度造的劳动教养制度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凡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均可送去劳动教养。隻字未提劳动教养的主要对象是右派份子。



戴脚镣的劳改犯

事实上，劳动教养设立之初就是以所谓防卫社会的借口来禁锢人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因此劳动教养制度缺乏正义性和法律基础，是极权专制的必然产物。

心是口非，心口不一是历代独裁统治者的共同特点，毛泽东把几十万右派份子驱赶进了劳动教养场，剥夺了一切人民内部的权利，享受劳改犯一样待遇，甚至比囚犯更惨。原来规定劳动教养最高期限三年。可是囚犯有刑期，右派劳动教养无期限，摘帽右派与戴帽右派一个样，解教后留场变成遥遥无期的『二劳教』。许多人到一九七九年一风吹『改正』后才『解教』。劳动教养了整整二十多年，相当於无期徒刑。

五十三年以来，中共劳动教养制度的受害者至少有五百万之众。在一九五七至五八年度人大立法后收容的劳教人员约四十万人中，四次镇反肃反中清理出来不够判刑条件的戴帽反革命份子约二十万，右派份子有十五万，佔五十五万多官

定右派的近三分之一。他们成为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的主力军。后来在三年人祸灾荒时期，逃荒讨饭的『盲流份子』逾百万人也加入了劳动教养大军的队伍。

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关押三千七百多名右派份子。由於饥饿、劳役、严寒以及精神和心理折磨，待一九六〇年撤销农场建制，存活仅有二百多人，死亡率达90%以上；辽宁省凌原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教中队三百余人，饿死、病死、累死、打死二百二十七人，死亡率75%；辽宁省锦西煤矿一千二百名右派，非正常死亡一千人，没有饿死的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八人已形似僵屍，仅有两人靠生食青蛙、螞蚱存活。

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國古拉格

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继承者们与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们一模一样，自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二〇〇四年三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口气通过《国务院關於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等六个强化劳动教养的决定。到了今天，劳动教养工作专门归口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局负责，全国现在尚有三百座劳动教养管理所，劳动教养人员二十六万人。这次四川大地震，震出个位於地震灾区的『新华劳动教养所』来。

中国也像前苏联一样，不承认有政治犯。可是把不同政见者、異议人士、访民、法轮功修练者随便按上个『泄露国家机密』、『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治安』等莫须有罪名照样可以当政治犯来处理，把他们送去劳动教养。

苏俄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指出，恐怖行动不仅解决了政治任务，而且也在解决经济任务。斯大林集中营把驱使囚犯

为右派量身度造的劳动教养制度



夾邊溝勞教農場

从事艰苦劳动並创造财富作为最高目标，通常不干涉囚犯思想和灵魂。也就是说，『它让犯人们的心灵自由地遨游』。而毛泽东的劳改营和劳教营则比斯大林和希特勒的集中营更上一层楼，

不单单把囚犯看成免费劳动力，文革中山西省甚至用煤炭换取上海的劳改犯当作劳动力。还把他们当作思想改造的洗脑对象，向囚犯强迫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古拉格群岛》是同那些描写反右运动的书籍一起在中国的书店的书架上消失的。因为它的内容同中国的现实实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古拉格群岛上服苦役的囚犯不就是中国在夹边沟、北大荒、兴凯湖、白茅岭、沙坪、茶淀、郭堡、四一五筑路队以及青海、新疆、甘肃、安徽、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劳教农场改造的右派份子吗？让我们借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各地囚犯異口同声说：「从伊凡·杰尼索维奇时候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囚犯读了您的小说，感到痛苦和委屈，因为现在一切仍然是老样子！』

每年一月二十七日是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都要举行纪念活动，悼念被纳粹杀害的六百多万犹太人，其中死於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就有一百一十万人。纳粹集中营大门口都悬挂着一条巨大横幅《ARBEIT



勞改基金會主席吳弘達

MACHT FREI》（劳动创造自由）。这句盗名欺世的口号与中、苏两国的劳改营、劳教场的宗旨何其相似。可见天下独裁者都是一丘之貉。然而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早已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唯独中共的劳改营和劳教场依旧纹丝不动，根据吴弘达、廖天琪编写的由《劳改基金会》出版的《劳改手册》统计，截至二〇〇八年底，中国还有一千四百一十三座劳改劳教农场、矿山和工厂，极其不和谐地屹立於『和谐社会』之中。

2009年9月

十六、中共搞運動的手法

中共建政后直至文革结束，没有一天不搞政治运动。毛泽东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共发动各个政治运动的主题、对象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搞运动的手法万变不离其宗。

一，寧左勿右

自从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执掌大陆政权以来，在中共政界流传着一句口号，叫作『宁左勿右』，从毛泽东流传至胡锦涛，历时近六十年而盛行不衰。这句口号是中共各级官员明哲保身和昇官发财的护身符。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在别人身上，右在自己头上。抓右派、搞文革、揪反革命份子，左的是别人。右派、反革命抓得愈多，证明你愈革命。稍一讲究人性，心慈手软，右派、右倾和机会主义份子的大帽子顷刻之间扣到头上。轻则批判降职，重则打入右派另册，以阶级敌人论处。

因此中共党内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党内盛行的好大喜功，溜鬚拍马；不说真话，爱听假话；上纲上线，无情打击；草菅人命，任意扩大打击面等等不正常现象愈演愈烈。中国的天空布满阴霾，氤氲弥漫，靈雨绵绵。毛泽东的左

倾幼稚病狂乱大发作，忌药违医，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一场接着一场，把好端端一个中国搞得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宁左勿右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便是宁左勿右的原始版本。

中共掌权后，宁左勿右的第一个大高潮便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在此以前的一九五四年七月至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首次确立了『以言论治罪』的『宁左勿右』指导方针，用以打击知识份子和中产阶级。五十年前的那场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和邓小平使用『以言论治罪』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把中国软弱的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推上了断头台。试看：

宁左勿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三千多万地主、富农被剥夺土地，二百多万地主、富农被杀，几千万地、富子女和家属打入人间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在『地、富、反、坏、右』五大阶级敌人中，地、富名列首位；

宁左勿右：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杀、关、管反革命份子三百多万人，肉体消灭反革命二百四十万。受株连亲朋好友几千万人；

宁左勿右：一九五二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百分之九十五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小业主）遭受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围绕中共这颗大红星的四颗小五星中，有两颗星星就此黯然失色了；

宁左勿右：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由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引伸至『肃清一切反革命份子运动』（肃反），打击面扩及全国。毛泽东自诩『杀人不多』，有四百多万人

受到冲击；

宁左勿右：一九五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运动，毛、邓用『引蛇出洞』的阳谋策略，抓了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戴帽右派，连同中右份子和内控右派等不戴帽右派，总计一百二十多万人。几千万家族子女受株连；

宁左勿右：被反右激发出来的左倾狂燥病大爆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使中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人，全国人口减少四千多万，非正常死亡不计其数；

宁左勿右：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革浩劫使中国濒临破产。其中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创了『以思想治罪』的先河。最终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权，中国人只准想毛泽东之所想，不准想自己之所想。连做梦都不准。梦话可判『恶攻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结束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多万人，国民经济损失达八千多亿。』

一九五八年在反右补课中，邓小平一再批判『温情主义』。各级党委生怕『右到自己头上』，竞相扩大右派指标。超额完成者，是坚定的左派，升官有望；温情主义者，当心自己套进右派的鸡蛋框。上海民盟有一千五百多名盟员，自主任委员沈志远、副主任委员陈仁炳、彭文应以下五百三十五人都打成了右派份子。某些地方和部门的右派比例比这还要高。

宁左勿右对於中共各级干部太有吸引力了，以至进入二十一世纪，其阴魂至今仍然徘徊在中国大地上。到了今天，宁左勿右也在『与时俱进』，有了新的涵义。它已经成为稳定一党专政和维护权贵寡头统治的护身符。

二，帽子戲法

中共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手法之一是开帽子工厂，耍帽子戏法。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前，已经有了『地、富、反、坏』四顶大帽子。反右后又增加了一顶『右派份子』的帽子，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把阶级敌人扩大为九类，除地、富、反、坏、右外，加上了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知识份子忝居末位，叫作『臭老九』。

中共的帽子戏法胜过杂技团的古彩戏法，玩得炉火纯清，十分娴熟。大帽子底下套小帽子；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玻璃帽、有重达千斤的钢帽、有大仲马小说《铁面人》中的铁帽。中共手中的帽子好像明朝东厂的『血滴子』，随时让人脑袋搬家。戴上中共的帽子，好比如来佛给孙悟空戴上金箍圈，一声吆喝『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不老实替你戴上』，让人心惊肉跳。

帽子有大、小分类。大帽子底下再分小帽子。五花八门，叫人五内俱焚。地主份子细分为恶霸地主、开明地主、漏网地主、逃亡地主等等。反革命份子细分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暗藏反革命、漏网反革命等等。右派份子的名堂最多，分得最清楚。分门别类、打入另册。

现行反革命右派份子、历史反革命右派份子、极右份子、

中共搞运动的手法

右派份子、中右份子、内控右派、右倾份子、拟右份子、涉右份子、右童份子、漏网右派、凑数右派、党内右派、团内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等等，不一而足。反正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一辈子休想翻身。对上述各类右派的处理分为六类：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薪和免於行政处分。

五十年前那场政治运动将中国当时仅有的五百五十多万知识份子中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打成右派，加上不戴帽的中右份子和内控右派，共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家属亲朋好友逾三百万人。这场运动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动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领导这场运动，罪责难逃。一九七八年他重新执政后，反对胡耀邦为右派彻底平反的建议，维持自己的颜面，不予平反，只赐予『改正』。邓小平死后，拖了一条长长的政治尾巴。

这条尾巴一拖就是五十多年。中共第三、第四代传人不敢逾越邓小平设下的这个禁区，五十五万多戴帽右派经过五十多年磨难，剩下的『政治贱民』不到一万多人。当然其中不乏朱镕基、王蒙、陈沂那一类异数，他们是极个别的『开心果』。

在毛泽东的各门功课中，历史学得最好，《资治通鉴》中的帝王驾驭术用来得心应手，熟谙拢人治心之术。他的数学不及格，把国民经济搞得一蹋糊涂，推向深渊。可是他有一个绝招，善于把复杂的思想言论和意识形态化解为数字，把帽子戏法归结为数字游戏。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全国人民还在他和邓小平佈

设的『阳谋』圈套中团团转的时候，在给党内高层的指示《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中说：『看来党外知识份子中，右派约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份子约佔百分之五至十。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於百分之十。』你看，毛泽东把右派指标订得多么精确。每次政治运动都由他订出打击的指标。无数次政治运动叠加起来，牛鬼蛇神、阶级敌人就以千百万计了。

在反右运动中还有更让人跌破眼镜的荒唐事。一位大学生高度近视看不清画报上马林科夫的胖脸，说了句：『这个一脸横肉的人是谁？』，破坏中苏团结而打成极右份子；另一系的党支部在讨论如何完成党支部的党团员右派指标时，用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右派名单；北京某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苦於完不成指标，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凑了个数。

毛泽东、邓小平开设的帽子工厂和玩弄的帽子戏法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衍生物。在邓小平文革后复出、严正宣佈中共再也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后，照理说帽子工厂要关掉了，帽子戏法耍不开了。然而中共第三、第四代传人继承毛、邓的衣钵，恋恋不舍於帽子工厂和帽子戏法，改头换面，梳妆打扮，披上时代的外衣。改正后的右派仍然叫『改正右派』，红头文件中出现『前右派份子』这样一顶无尚光荣的帽子。

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异议份子、维权份子、上访份子、邪教份子、法轮功份子、藏独份子、疆独份子、超生份子、劳教释放份子、刑满释放份子、盲流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反党份子、国内敌对份子、国际敌

中共搞运动的手法

对份子……形形色色、不同尺寸、各种颜色的帽子依旧在中国上空像蝗虫般漫天飞舞，说不定某年某月某日在不知不觉中自天而降，戴到你的头上，你便成为某一份子。

中共的帽子戏法既不符合宪法，又无法律依据。纯粹是一党专政条件下以党代政的违法行为。

三，套鷄蛋和組織人事制度

自古迄今，独裁政权都建立在谎言与欺骗的基础上。然而对於中共来说，仅仅依靠谎言与欺骗还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组织保证措施。它那整套严密完整的组织人事制度，像一张蜘蛛网，将每个公民禁锢在思想、言论、行动的牢笼里，动弹不得。这套严密完整的组织人事体制，是中共的镇山之宝，构成了维持胡锦涛『和谐社会』的稳定基因。

《竊聽者》和《卡廷森林慘案》的啓示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作品德国的《窃听风暴》（港译《窃听者》德文原名 Das Leben des Anderen，英译 The Life of Others）揭示了过去东德国安系统利用监听手段迫害知识份子的真相。可是窃听者良心未泯，保护了被窃听者，自己却遭到处罚。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开放了全部窃听档案。被害人查阅档案了解真相后，写了一本《好人奏鸣曲》，颂扬保护知识份子的『窃听者』。

这部奥斯卡获奖片所讲述的故事，与中国的现实多么相似呵。中国的窃听者藉助一切先进的电子技术，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窃听』，以致中国公民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如今中共总参三部、国安、公安几十万专业窃听者—网络警察的触角，已经深入港澳台乃至世界各地。一旦他们知

道了你的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黑客立马侵入，你便成为赤裸裸的玻璃人。师涛事件、胡佳事件、GOOGLE 退出中国便是明证。作者本人亦深受其害，已被黑客损坏三台电脑。说不定本文刚刚发送到出版社编辑部，已被中共窃听器截取了。鲁迅故乡浙江绍兴已成为世界黑客中心。可惜国人经过党文化教育，缺乏良心未泯的『窃听器』，却有的是丧心病狂的黑客和窃听器。

苏联解体前后，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四日俄罗斯总统秘密档案第一卷解密，屠杀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七名波兰人，包括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惨案』大白於天下。此前於一九九〇年，戈尔巴乔夫向波兰总统瓦文薩承认此为斯大林所为，惊得瓦文薩浑身战慄。过去苏联隐瞒事实真相，诬陷是希特勒暴行。世人信以为真。这两件事说明昔日苏俄和东德共党在亡党之前尚不敢销毁档案，『苏东波』的昨天会是中国的明天吗？看来不见得，中共在篡改和伪造历史方面，比苏共、德共走得更远，也更加狠毒，更加恬不知耻。手段亦更加高明。

立法者、執法者、違法者三位一體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五章『法律责任』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凡损毁、丢失、涂改、伪造档案等均构成犯罪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然而《档案法》与其他法律一样，是摆摆样子的。建立在欺骗与谎言的基础上的中共国家机器，不论《档案法》规定得如何动听，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必须销毁、篡改、隐瞒、涂改、伪造档案材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暨是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立的法，又是由中共领导的各级政法委执的法，最终也是中共各级党委违的法。

因为党法大於国法，中共党系统的政法委向来凌驾於同级行政立法司法检察机关之上。

试举两例说明之。其一，一九七九年右派大改正，在右派的改正通知中，尤其是在党内右派的改正通知中都有这么一条：『……对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应予以撤出销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保护受害者不再旧事重提，免得株连九族，纠缠不休。实际上却是毁屍灭迹，消灭罪证、逃避罪责。事隔五十三年，仍念着邓老爷子『必要的、正确的』紧箍咒，继续封杀和迫害残存的毫髮右派。

其二，原浙江省长沙文汉冤案。一九五五年，全国相继发生『潘汉年、杨帆案』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首先株连地下党出身的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王尧山、彭柏山、王元化等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宣佈：『要认真追查上海文化人与敌人的关係』，『他们历史上是叛徒、特务，与特务勾勾搭搭。』柯庆施点了许多人的名，其中就有浙江省省长、地下党老干部沙文汉。

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紧跟着挑明：『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他指的也是沙文汉。从此对沙文汉施加一连串迫害，直到一九五七年把他打为『沙、杨、彭、孙地方宗派主义右派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右派份子，开除党籍。杨是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彭是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委常委彭瑞林；孙是浙江省委财贸部长、省委委员孙章禄。以江华为首的浙江省委给沙文汉等人捏造许多无中生有的莫须有罪名。

在全国各省委书记中，柯庆施和江华最善解毛泽东的

心意，也最会溜鬚拍马。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党内反右斗争大加赞赏。他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有发展，浙江有创造』。接下来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以浙江省为例，向到会的省委书记提出问题：『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又点出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和广东、广西等省一级打成右派的党政领导人的名字。称沙文汉等人『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乾净』。

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浙江省委上报中央，右派改正工作全部结束。『浙江省地方宗派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及其他成员都已改正，但只留下沙文汉一人不予改正。文革后复出的江华已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作贼心虚，生怕十年前诬陷沙文汉的劣迹败露。一方面通过浙江省委散佈沙文汉有历史问题需要审查，另一方面不顾自己已经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拄着拐杖亲自来到杭州，坐镇档案馆督促销毁沙文汉等人的划右材料，足足达三天之久。

江华作为立法者和执法者，难道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个《档案法》吗？立法、执法者知法犯法，而且明知故犯，最高法院院长视法律为粪土，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丧失殆尽，其他中共领导更不必说了。这是原苏共、德共所望尘莫及的。

中共搞运动的手法

按照檔案套雞蛋套出左中右

街市小販賣雞蛋，用一個小鐵圈來套雞蛋的大小，以分別標價出售。掉進小鐵圈的是小雞蛋，掉不下去的是大雞蛋。中共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揪階級敵人也是用這種原始的方法。土地改革有《土地改革法》，定出地主、富農、上中農和貧、下中農、僱農的劃分標準，然後按土地、僱工等指標用套雞蛋的辦法去套成份；鎮壓反革命份子有《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按官（軍）銜職務等條例逐個去套。例如國軍少校或營長以上，國民黨、三青团區分部書記長以上，一律都是歷史反革命份子。不問你是起義、反水或暗中通共；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有《公安六條》，可套出各種敵對份子。

在反右運動中，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十月十五日，右派份子已經抓得差不多了，才在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的主持下，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份子標準的通知》，放了一個馬後炮。幾十萬右派份子是怎么套出來的呢？原來靠的是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這份由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整理成文的報告中提出的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便籠統地成為套取『右派疙瘩蛋』的唯一依據。

套雞蛋只能區別雞蛋的大小。壞蛋、臭蛋與好蛋、鮮蛋混為一談，極有可能漏網；好蛋、鮮蛋又極有可能中了陽謀的圈套。有的雞蛋不大不小不好不壞，你可以用這種尺碼去套，也可以用另一種尺碼去套，那就全憑套蛋者的良心和『党性』了。中共宣稱最講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可惜在實踐中，他們搞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完全運用毛澤東

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那一套，『套鸡蛋』就是最典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中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害死了多少社会精英，多少人被套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左派是中共自己人和他们可以依靠的力量；广大中间派是中共的争取、团结对象；右派同地富反坏份子一样，则是中共打击和专政的敌人了。其实，在中共执掌政权后，各路系统早就已经把中国人按照档案材料划好左、中、右了，无一漏网。中共叫作『排队』或『对号入座』，各地区、各部门只是关起门来秘密操作，局外人不知而已。反右斗争以前的历次运动，早已排过多次队。通过毛泽东、邓小平的『阳谋』，让那些内定的右派份子乖乖地自觉自愿地『自动』浮出水面罢了，便於中共分门别类地实施『群众专政』。这便是反右运动中某些不鸣不放、不声不响的人亦被划为『沉默的右派』的缘故。

广东省一百十七个县市中，有八十个县市安排九十三名民主人士担任副职。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在反右运动前早就替他们排好左中右。不管他们在鸣放中的态度如何，反右运动中基本上按照档案袋里原有名单划分极右、右派和中右份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最倒霉的是那些在反右补课（扩大化）运动中，为拼凑右派指标而生拉硬扯套进右派鸡蛋圈的『凑数右派份子』。这些右派中，有些本来是左派队伍中的党团员积极份子，同右派沾不上边。无论是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还是《关于划分右派份子标准的通知》都套不

上他们。但是为了『凑数』，凑足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不得不给他们罗织一些莫须有的『右派言行』，装进人事档案袋。接收他们的劳教部门或基层单位不知底细，不了解来龙去脉，按档案文件中作出的政治结论办事，使这些凑数右派变成了真正的右派。从此跌入政治贱民的深渊，永世不得翻身。

反右运动中还有一种打入『另册』的右派份子，他们没有列入中共有关部门的正式右派名册，是被基层党支部书记或其他小领导公报私仇而套成为右派份子的。那种套鸡蛋圈圈的方法便是最下流不过的了。使用这种方法整人的党棍就是政治扒手、垃圾人渣。

黑箱作業 分層管理

档案管理的方法青出於蓝而胜於蓝。套鸡蛋划成份，用左、中、右排队等方法源出於中共沿袭和发展了苏俄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对全社会严加控制和监视，只不过中共更胜过老祖宗一筹。一个人自出生之日到派出所上户口起，直至死亡再到派出所注销户口（不销户口不准火化，死无葬身之地），便进入了中共组织人事部门的人事档案袋中。自小学开始建立人事档案，每个人有一个规格大小一律的黄色牛皮纸档案袋。

经历複杂者和社会关係多的人有好几个口袋。这种牛皮纸袋由中共的人事组织部门掌控，你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它在无形之中伴随你终生，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调动工作，档案先行，左右着你的命运。你的升学分配、升迁调动、军人的复员退伍、组织鉴定、审干结论，甚至个人隐私、结婚离婚，样样记录在案。思想汇报、向党交心材料、检举揭

发信、别有用心者打的小报告，造谣污蔑不实之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统统都塞进了人事档案袋子里面去。

即使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保姆佣工、社会闲散人员，有街道里弄派出所的户籍制度牢牢套住你；工人有工会；农民有村镇、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儿童有少先队，这些组织都为你准备了一个人事档案袋。中共的人事组织制度宛如一张巨大无比的蛛网，一旦粘在上面便动弹不得，毕生失去自由。黑箱作业法给统馱对象套上一道紧箍咒，确保欺骗和谎言永远不会曝光。

管理牛皮袋的等级制度森严，每个部门、每个机构、每个企业只准管理属内的平头百姓和小组长之类级别的小干部；中层干部由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则由更上一级人事部门管理；省、市级和部长级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人事组织部门的办公室闲人莫入，盛放牛皮袋的铁皮保险箱戒备森严，生人勿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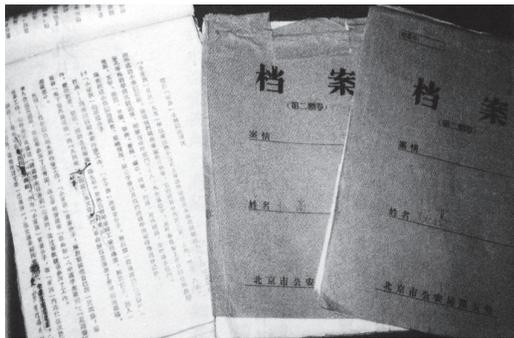
毛澤東保險箱的奧秘

中共的组织人事体制除继承了苏共的衣钵外，更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毛泽东继承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的私人保险箱掌握大量绝密档案，也有传说中扯不清楚的所谓遗嘱。接班人刘少奇、副统帅林彪、左右手周恩来、邓小平的黑材料和生杀大权都在他的保险箱里，迫使他们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一死，保险箱钥匙便成为争夺目标。江青、汪东兴之流都向张玉凤索要钥匙，演出了一场争夺保险箱钥匙的丑剧。他们谁都明白，谁拿到这把保险箱钥匙和里面的绝密材料，谁便有政治资本坐上第一把交椅，成为中共真正的统治者。

中共搞运动的手法

一党专政体制下的组织人事制度是最典型的『以党代政』现象。组织人事干部，必须是清一色政治可靠、根正苗红的党团员。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甚至不准同非无产阶级成份的人谈恋爱结婚。稍有怀疑，便逐出组织人事部门。在各个部门单位，行政方面有人事科（处、室）；党委系统有组织科（处）。表面上分属党、政二条系统，实际上合二为一，都由党委直接领导，行政首长（尤其是非党员行政首长）无权过问。

一般情况下，人事档案属于『机密级』，重要人物或事件归属『绝密级』。因此不得通过普通渠道邮寄，不得用传真、电邮传送。中共内部有机要系统，组织人事档案由经过严格挑选的机要交通员递送，並有严密的签收制度。其



在舊書攤上發現的杜高人事檔案

目的是防止外泄，尤其不准本人看閱。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一人可以洞悉全部机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都无法看到有关本人的绝密档案。周恩来为纠缠不休的

『伍豪事件』死不瞑目；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专案小组用逼供信的手法制造刘少奇叛徒、特务、工贼的伪证，置刘少奇於死地。毛氏家天下的家法高於国法。

按《档案法》规定，一般档案解密时间为三十年，最多

不超过五十年。但是中共对于解密时间也是随心所欲的，可能予以永久封存，不见阳光。反右运动已过去五十三年了，处决的右派林昭、刘文辉、冯元春、黄宗奇等人的材料仍深藏不露。可见中共执行《档案法》因人而异，目无章法。而且外加有一部《保密法》压制着《档案法》。

组织人事干部的『失误』

百密一疏。如此严密的组织人事体制也有疏漏的地方。一九九八年的某一天，青年学者李辉在逛北京文物旧货市场时，无意之中偶然发现地摊上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剧作家杜高的全部人事档案。这套完整的档案材料包括他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随后的肃反运动中被整教的记录；反右中被划入『胡祖光小家族反党集团』的材料以及他的劳动教养记录；杜高写的检讨和检举揭发他人的材料。



杜高

档案中还有其他人检举告密他的信件，使他加刑三年。

李辉仅仅化了几十元钱便买下杜高的『生死阎王账』，把它全套交给杜高。杜高回到家里，仔细翻阅那一扎扎业已发黄的案宗，那血泪斑斑的往事顿时呈现眼前，心潮起伏，感慨系之。

四川著名民间作家冉云飞也在成都市旧货市场用三百伍拾元人民币，偶然购得重达四十斤的中共内部人事档案。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有心人』，经常在内地旧货摊屡有斩获。

中共搞运动的手法

中共那些根正苗红而又不学无术的组织人事干部，往往为了替本单位小金库增加财源，经常卖掉废纸旧报刊，把某些待销毁的保密的档案材料亦混杂其中，当废品出售。

冉云飞买到的四十斤重的档案中，有一九五七年成都市佛教协会反右运动的原始记录。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刚成立的成都市佛教协会，已受中共的控制。佛协领导秉承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和成都市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处的旨意，在成都市佛教界大抓右派。冉云飞买下的档案资料中，存有牛次封、宽霖、隆莲、清定、澄济、贯通、解空、悟能、隆光等人划右派和划右后改造情况的原始笔录。牛次封居士是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其他人都是和尚、尼姑、道士。这捆珍贵的档案揭开了宗教界反右运动的一角面纱。也只有利用这种『疏漏』，才有可能揭发中共神秘的组织人事档案制度真相。

2010年4月10日

十七、挽回反右的歷史追憶

——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紀念活動追記

二〇〇七年是中国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右派的幸存者和同情者在中国大陆、美国东西两岸、澳大利亚、台湾、香港等地举办多次研讨会、追思会等纪念活动，为右派平反和索赔的艰巨斗争拉开序幕。中国人没有失去记忆，中国人並沒有遗忘历史。这一系列纪念活动从北京开始，在海峡对岸的台北结束。通过纪念活动，将右派的平反索赔与维权结合了起来。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一日，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郭书林以口头传达方式宣读一份文件：『二〇〇六年出版违规书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首当其冲。抗议这起禁书事件拉开了反右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帷幕。

胡锦涛似乎觉得光是禁几本书解决不了问题，不够过瘾，乘势提出加强网络控制，成立『中央对外网络宣传局』。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关押网络作家最多的国家。三月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内部通知，让各地书店和图书馆将涉及反右的书藉统统下架，藏进仓库或书库；禁止出版反右书藉，书报刊物不准登载反右文章；屏蔽网络上的反右条目。中共自以为採取这样的愚民政策和封杀措施可以使人民淡化记忆、忘却历史。

挽回反右运动的历史追忆

与此同时,在中共内部文件上,开始出现像『前右派份子』、『涉右人员』那一类的歧视性的污蔑字眼。充分证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继承者们对于五十年前那场浩劫,毫无反思。

公開信和簽名活動打先鋒

中共官方和民间力量之间的较量由此逐步升温。三月份在北京举行两会(人大、政协)以前,由原中央党校杜光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海天高级编审、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北京大学生物系姚仁杰教授、山东大学史若平教授、原北京大学学生燕遯符、山东大学附中教师李昌玉、原《成都日报》编辑铁流、原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众等九人联合发起的《为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得到全国各地右派的热烈响应和声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

平反索赔签名运动首先在重庆、成都和上海得到热烈的反响。上海的反右运动在毛泽东亲自『关怀』和柯庆施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上海民盟一千五百多名盟员,划了五百三十五名右派,佔盟员总数三分之一;上海电力专科学校(中等专科学校)揪出未成年娃娃右派十多位,其中有三个孩子蹈江、投河、跳楼自杀。

四月份上海有一百二十多人在申诉书上签名。可是毛泽东和柯庆施的阴魂五十年后依然在上海上空遨游。四位申诉书的发起人同时受到当局的警告、威胁和恫吓。二人打了退堂鼓,不敢吱声;一名教授的兄弟与儿子的生意受到威胁;另一位高级工程师的电话、电邮受到监控,当局四次登门『拜访』,规劝他不要外出串联。软硬兼施,打拉结合,无所

不用其极。当他受当局警告『称病』退掉赴香港出席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的火车票时，当局表扬他『识时务』。劝说他退票的人也因而『立功受奖』，奖励劝说者带家眷出国旅游一次。

四月六日，在北京的数十位右派及其家属亲友不顾当局的阻挠，举行了二〇〇七年中国大陆反右五十周年首次右派聚会。会议期间

突然停电。老人们有的打的、有的骑自行车，坚持易地继续开会。会后与会者有的被跟踪监视，有的给公安、国保找去谈话。



北京右派在反右50周年紀念日聚會

老人家个个无所畏惧，向胡锦涛上书要求平反右派冤案。以后成都和重庆右派遭受到同样待遇，一再受到打压。

六月八日，是五十年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日子，官方和民间都把这一天当作反右运动的启动日期。五十年后的这一天，中共当局可能没有估计到残存的右派还能迸发出这么巨大的力量，给中共『和谐社会』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山东史昌玉老人遭到抄家，抄走了电脑硬件和他自费出版的书籍。

美國成功舉行兩場大型研討會

在中国大陆本土受当局阻挠，举行纪念活动愈来愈困难

的时候，只好指望移到海外去举行了。第一个在海外举办的纪念活动，是五月份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中国知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出席研讨会並作了报告。中央级五大不予改正的右派之一、『党天下』理论的提出者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在研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他已在澳大利亚定居多年。有若干名大陆右派冲破封锁参加会议。

嗣后重点从澳洲移至美国。六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在美国东、西两岸举行了两场大型国际研讨会。东岸的研讨会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主持。他是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划为右派后劳改十多年。改正后移居美国，坚持不懈从事劳改研究。

西海岸研讨会由著名学者宋永毅主持。大陆右派数人冲破重重阻力，不怕回国后秋后算账，毅然远渡重洋，出席这两次会议。会后香港和海外报章杂志已有大量报道，会议组织者出版了会议专集。可是大陆的媒体在中共当局高压封杀政策下，不敢呛声。

进入九月份，香港的盛暑辱热逐渐褪去，反右运动纪念活动的高潮又从西方移向东方。九月十四日和十二月八日在香港分别举办两次研讨会。九月十四日的研讨会由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主办。研讨会主题是《被埋葬的青春》，大陆右派和亲属多人与会。由於香港紧邻大陆，更易遭到中共当局的封杀，因此有十多位被邀请的右派，被当局採用『前堵后追』的卑劣手段，阻挡在深圳罗湖和其他城市的关口之内。

可笑的是有一位年届八十的右派老人蒋文扬，在女儿陪同之下，贿赂四川当地公安来到香港出席会议。参加反右研讨会居然也可以搞腐败贿赂！老人当年是在单位里时事学习

时被指令读报，鸣放时读右派言论，结果读报读出一顶『极右份子』的帽子来。

十二月八日，一场名叫《生的权利——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暨中国生态危机和维权运动》的研讨会在香港举行。研讨会由亚太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主办，该联合会召集人林牧晨先生专程由美国飞来香港主持研讨会。虽然事先尽量做好保密工作，仍有多人被截堵在北京、罗湖、珠海的关口。有两位右派老人刚踏上香港，家属来急电，说公安、国安派人上门赖在家里不走，让老人赶紧立马回家才走人。中国民主联盟共同主席徐文立先生



讀報讀出來的極右分子蔣文揚

暨夫人专程由美国来香港出席会议，被香港入境事务处阻挡滞留香港机场二十多个小时，不得不转飞台湾而去。

香港成爲右派平反索賠聯絡站

十二月八日在香港举行的研讨会，有多位民主派人士参加。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先生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公民党，我们香港应该多参与，和中国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结合在一起。』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黄毓民、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公民党秘书长郑宇硕教授、澳门职工联盟秘书长李漫洲等出席会议並讲了话。这次研讨会离中国大陆最近，香港与内地

挽回反右运动的历史追忆

只隔了一条十多米宽的深圳河，却是民主和专制的分界线。

接近年终的十二月十八日，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举办《往事並不如烟——由转型正义观点看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五十年和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研讨会暨座谈会。会议由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李酉潭博士和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立、秘书长汪岷主持。海峡两岸和香港学者、大陆作家叶永烈以及当年反右运动受害者等参加。

会议邀请了一位退役国军中将和台北市高龄政治受害者协会常务理事陈英泰先生与会。陈老先生年青时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曾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读书会，遭国民政府逮捕，在



2007年在臺灣參加紀念反右50周年的原右派和原臺灣思想犯為陳英泰（已故）（中立者）合影

绿岛（火烧岛）『感训』三年。『感训』相当於大陆右派的『劳动教养』。大陆的『右派份子』和台湾的『感训犯』共同回忆和交流了强制性思想改造的情况。事实证明，大陆的『思想改造』和台湾的『感训』都以彻底失败

告终。

对付政治犯和思想犯，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一对难兄难弟何其相似乃尔。国民党有绿岛，共产党有夹边沟、北大荒。然而国民党已对『感训犯』平反赔偿，感训二至三年者，赔偿台币一百万；处决者六百万。而大陆的右派份子，既不

平反，又不赔偿，来个模棱两可的『改正』。

徐文立先生在会上说：『〇八年奥运会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反对派，既会给他压力，也会给他一些面子。我们不抵制，也不合作，也会给他压力，或者制造一些小麻烦。』

经过一年来的纪念活动，尤其是下半年在香港和台湾的三次活动，有关人士一致达成共识，今后要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有利条件，开展右派平反和索赔工作。香港是最贴近大陆的最后一块民主基地，中国公民可以利用『自由行』，来往於大陆香港，可以感觉香港一息尚存的自由民主气氛。其次，香港有一支来自内地的原青年右派队伍，不少人改行写作，釐清真相，还原历史。相对而言，尚具有战斗力。

他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成立《五七学社》和《五七学社出版公司》，研究『五七学』，争分夺秒地抢救历史，留住记忆，恢复被篡改、歪曲、抹掉的历史。他们正在编写四卷本《五七右派列传》和《右派名录》，计划出版一套以右派为主题的『五七丛书』，为幸存者搭起一个平台。

其次，在编写《五七右派列传》和《右派名录》的基础上，由《亚太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召集人林牧晨先生提议，将《中国人权索赔联络站》设在香港，联系人凌文秀先生，电邮：wuys088@gmail.com。通讯处：香港元朗派递局 170 邮政信箱。

第三，他们希望广泛接触和联络民运人士和各种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人士，团结一致，争取早日实现中国民主化。

经过五十多年苦雨凄风的蹉跎岁月，官称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份子中，已经所剩无几，幸存者尚有一万人左右。参加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右派老人，

挽回反右运动的历史追忆

相聚一堂，不胜唏嘘。冲破重重阻挠和封锁，得以突出重围参加会议的能有几人呢？突出重围参加聚会后返回大陆所受的威胁迫害又有谁人知晓？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响往着一个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中国，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香港五七右派老人的辛酸泪

香港右派老人，又称港右或右佬（大陆称帽兄、帽姊），他们在上世纪末陆续移民到香港来定居，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最年轻的出生於一九三九年。为数不多的十来个人，形成一支被香港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细小群体。大多数港人，尤其是中青一代，不了解和不理解他们。而中共当局依旧不放过他们，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把魔爪伸过边境来打压他们。

在二〇〇七年香港、台湾、美国和大陆各地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后，在七十九高龄的香港优秀义工南叔（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极右份子）的创议下，成立了以研究反右运动历史为主的学术团体——《五七学社》以及《五七学社出版公司》，为大陆、香港、美国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残存右佬搭起一座『鳌清真相，还原历史』的学术平台，并为平反索赔工作牵线搭桥。

港右成立的《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已出版《五七右派列传》四卷和『五七丛书』十六部，由田园书屋发行。武宜三先生编写的《右派名录》已达一万多条目。五七老人燃点着生命的余热，埋头苦干，辛勤地做着不为人知的抢救历史的工作。

二〇〇七年香港举办两次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后，厄运也降临到这些与世无争的老人家头上。在次年北京奥运和残奥期间，《五七学社》的陈老先生回大陆探亲治病，突然受到住地公安局的『关心』，接到该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电话，称要检查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性』，並通知到公安局『报到』。陈老回答：『我的证件都有效，否则进不了大陆。』严词拒绝了这种变相『传唤』。大陆公安连港右都不放过。

第二天即有三男一女身着便衣硬闯民宅。未经主人同意挤进门缝。陈先生先要他们出示证件。他们便掏出几张不知什么东西晃几晃，不让人看清楚。问他们尊姓大名？只说其姓，不报其名。他们先问几句出入境证件有效与否的废话，便开门见山地详细盘问《五七学社》的情况。诸如《五七学社》有哪些人参加？姓甚名谁？搞些什么活动？经费从哪里来？谁是你们的后台老板？一连串拙拙逼人的为什么活像审讯犯人。

陈老严正地告诉他们：《五七学社》是在香港注册登记、政府批准的合法学术团体。主要活动是『饮茶』，经费来源『AA制』，各人自掏腰包。几个便衣反来覆去盘问几个小时，归纳起来，无非三条：

- 一，《五七学社》与境外反共敌对势力有非法勾结；
- 二，《五七学社》在境内有非法活动，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大量『串联』；
- 三，你这次回大陆与许多人有非法接触。

一连串的『非法』，使陈先生很生气。义正词严地指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我是香港永久居民，我们在香港法律范围内从事合法的学术活动，而你们却认为是非

法的……。」

一位相貌端正的年青女公安粗暴地打断陈老的话说：『什么「一国两制」，只有一国，没有两制，香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蔑视法制的话出自一位漂亮的女执法人员之口，实在使陈老大跌眼镜。

话不投机，陈老客气地请他们离去，表示不欢迎私闯民宅，变相传讯。他们走到门口，甩下一句话：『我们随时会找你。下次请你去局里。』他们果然没有食言。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找到陈老的儿子（也是香港永久居民）。警告说，叫你老头识相一些，不要在境内从事『非法活动』。识相不识相，这是上海白相人（流氓）的用语，『不识相要吃辣火酱』。言外之意，如果不知好歹，将采取限制入境、限期离境、取消回乡证以及其他一切必要手段，对家属子女也大肆威胁恐吓，使人毛骨悚然地回忆起五十年前反右斗争中使用的阶级斗争语言。

中共国安、公安监视港人

为什么港人在香港的一举一动中共会瞭如指掌呢？今日之港人还有没有隐私可言呢？

中共利用一党垄断的庞大的国家资源和西方提供的先进技术严密掌控港人的举止。许多人的电话、电邮均纳入中共专政机构几十万网络警察无孔不入的监控范围之内。

今日之香港已经成为东方卡萨布兰卡。特工、间谍、告密者、情报贩子云集。《五七学社》才刚酝酿成立，便已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关注』。几位港右刚开会决定成立《五七学社》，第三天便有人受到警告。

五十年后大陆和香港的五七老人处境更加困难。他们

大多数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物，缺乏人身自由和生活保障，得不到社会关爱。五七戴帽遗毒（只改正不平反）依然，继续受到歧视，稍一发出不同声音，便严加打压。大陆当局如此『关心』港右自然有其道理，唯恐香港成为右派平反索赔的基地，大陆堵不住的一汪祸水，都流到香港来了。

正如那位女公安所言，香港是中国的，只有一国，没有两制。香港公民享受大陆同胞的同等待遇，大陆同胞没有的言论结社自由，你香港贱民也甭想要有。港右与大陆帽兄血脉相通。

右派改正后，在经济上非但不补发二十多年非法扣留的工资，而且仅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工资待遇。当年打成右派的大中学生，劳改劳教二十多年，丧失了宝贵的青春和中年时代，知识老化，政治上受歧视，享受不到同龄人的社会福利待遇，不足温饱，有的沦为『和谐社会』的政治贱民。

上海九十五岁右派老人王关仁，开除劳教后回不到原单位，每月仅领几百元救济费；四川成都黄绍甫老人，因参加印缅抗战远征军而打成右派，前后关押二十多年，没有家、没有妻子儿女，没有医疗



抗日遠征軍老兵汪崗（右）、
黃紹甫。

挽回反右运动的历史追忆

保障，没有社会福利，每月只有一百六十元低保，最后在穷困潦倒中离世。

通过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活动，右派们涓细的平反索赔声音，汇入了浩浩荡荡的中国人民维权激流之中。这股激流与日俱增，奔腾咆哮，终有一日，会埋葬专制独裁政权。

2008年2月22日

2010年2月22日修改

十八、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紀念活動花絮

一，無聲的驚雷

当年上海的反右运动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领导，毛泽东二次亲临上海指导，並调阅了大字报。上海因而成为反右派运动的重災区，佔全国人口八十分之一的上海，『揪出』右派份子佔全国的6%，加上中右和内控，几达11%。

五十年后，毛泽东和柯庆施的阴魂未散。当年的右派和右派家属继续受到迫害。比之北京、重庆、成都等地的反右纪念活动，上海的右派及其家属还是比较『克制和温文』的。他们没有聚会，没有搞纪念活动，却照样令当局神经紧张，坐立不安。他们仅仅由四个人带头，发起了一个『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申诉信，要求国家为右派份子正式道歉並给予经济补偿』的维权签名活动，有二百二十多人签了名。这四个带头人分别受到各种方式的警告、监视和迫害。

受到当局各种方式的警告，有二名发起人蔡先生和吴先生先后打了退堂鼓，不敢再出来活动。原民盟上海市委副主

任、中国民主党派上层五名不予摘帽子的右派之一彭文应教授的公子被工作单位的领导『请去谈话』，警告他要『自重』，



中央級五位不予改正的右派之一的
彭文應夫妻

不要同海外媒体联系，不许下载海外敌对势力的网站。彭公子反问：『什么是海外敌对势力的网站？请给我一份名单。』他的电话受到监听。反右派运动过去五十多年了，至今还要搞『株连九族』。

另一名签名活动的带头人原上海电力专科学校的大右派叶教授的兄弟和儿子分别受到警告，如不规劝叶教授收敛行动，势必影响他们的『生意』。並通知叶教授，彭某某已受到『严密监控』。叶教授与人谈话要请派出所参加旁听。但他对於发起参与签名运动，却永不言悔。

五十年前由上海押送青海和安徽省白茅岭劳动教养的右派份子已所剩无几。难友们偶然相聚，追忆往事，引起当局的高度紧张。不久前，曾在青海省劳动教养的三十几位右派难友为庆贺某难友生日的宴会，当局以停电示以威胁，迫令他们停办。

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严禁任何形式的反右纪念活动。上海各家公私书店、大小书摊一夜之间凡是涉及反右的小说和书刊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反右和六四是中共的死穴

二〇〇七年六月一日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前夕，我专程走访了中国著名科幻和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他年近七十，身体健康，喜好旅游，近年来走遍世界各国和大江南北。他对反右运动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历史的悲歌》、《反右派斗争始末》等有关反右派斗争专著多种，而且他是中国最早发表反右专论的作家。他透露，准备把《反右派斗争始末》扩充重写后再出版。我衷心祝愿他早日实现这个夙愿。

叶先生深入研究反右运动的历史，如起因、后果、导火线等。他研究了主要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反右文件三十五篇，他认为毛泽东的『阳谋』是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善于利用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卢郁文收到匿名信事件，不失时机地转入『战略反攻』；他走访了匿名信事件的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深入研究；他搜集了鸣放时几乎所有的大字报和发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文章，却发现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可言，这些言论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只不过当时有些超前罢了。

叶先生认为，『反右』和『六四』都是中共解不开的死结和死穴。这和邓小平有关。他反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却搞自己的『两个凡是』；他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却他要一个人说了算。他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和毛泽东共同领导和策划了『阳谋』，因此他坚持不认错，死不悔改。他后来的第三第四代领导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反右和六四逐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和死穴，生怕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五月份，叶先生和夫人应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大学有关反右派运动的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上他遇到



彭文應墓園中的銅像

了储安平的儿子。他说，储安平的『党天下』没有错呀，一党专政不就是中共一党的天下吗！

叶永烈先生是个多产的作家，著作等身。仅人家冒用他的大名出版的书便有四十五种之多。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唯有论述反右派运动的专著成为禁书。他是一位尊重历史的专家学者，中共当局禁他的书，可见中共

对历史真相害怕到何种程度。

三，毛澤東和海瑞

反右运动后的一九五九年，万马齐喑，全党全国陷入谎言吹牛的汪洋大海。这一年的四月，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凯歌声中，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缺点，『大胆陈言』。他说：『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也可以嘛。』态度极其诚恳，言辞极为坦陈。

但毛泽东两面三刀，对自己提倡的『海瑞精神』另怀鬼胎。他不久前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反右补课期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又提醒大家讲真话了。但是提醒大家讲话要善於选择说话的

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毛泽东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

在上海会议开会期间，毛泽东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果真如此，当反右积极份子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出《海瑞罢官》之后，毛泽东立即组织文痞姚文元等人围攻，成为以后文革浩劫的导火线。

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实际上还是害怕出『海瑞式』的尖锐人物。在同一年的庐山会议上，揪出了直言不讳的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以及党内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搞大跃进，三年内饿死中国三千七百多万人。这就是反右运动造成的直接恶果。

2007年5月

十九、早期海歸派的命運

——三錢的故事

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北京以九十八岁高龄逝世。中共开动一切宣传工具为他树碑立传，称他为『中国航天之父』和『中国导弹之父』，给予他种种荣誉和桂冠。在十一月六日举行的追悼会上，他的遗体覆盖着中共党旗。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第三、四代领导核心，前去他墓地凭吊，享尽了国家领导人待遇。

海内外华人對於钱学森的为人、学问、成就和贡献的正面评价是一致的。可是中共给予他的荣誉和桂冠，却有许多不实之词。必须拨开中共为他泡制的种种迷雾，还钱学森本来的清白面目。

海内外中国人说起钱学森，总会想起『三钱』。学术界『三钱』是一代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三钱几乎是同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中国士大夫思想品格，同样的学术成就，对中华民族有着同样的贡献，三钱都是中共宣耀世界的『两弹一星』的功臣。钱三强和钱学森几乎在五十年代於同一时间加入中共，钱伟长则参加民盟。可是中共對於钱三强、钱学森和钱伟长三位早期从海外归来的海归派却给予不

同的政治待遇和评价。三钱海归后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反差极大，恰恰是这一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真实写照。

中國原子彈之父—内控右派

其中鲜为人知的钱三强一生最为坎坷；钱伟长曲折多乖，先辱后荣；而钱学森最为『幸运』，一帆风顺。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钱三强划为内控右派；钱伟长划为右派；只有钱学森『幸免於难』，逃过一劫。

曾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1913-1992）出生於浙江绍兴，与出生於浙江杭州的钱学森是近邻。三钱均出身於名门望族，诗礼传家。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享有盛名的国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钱三强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曾经是钱穆的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三钱放棄在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响应中共号召，返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钱学森、钱伟长在美国留学，钱三强留学法国，师从居里夫人，从事放射性元素研究工作。他们在回国不久，便难以避免地遭遇反右风暴，三钱中，二钱覆舟沉没，一钱巧渡难关。

一九五六年，钱三强和钱学森率领四十多名中国科学家在苏联实习考察，並参加杜布切克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联合研究工作』。进入一九五七年，中共号召『鸣放』，动员各行各业向中共提『意见』，帮助共产党克服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驻苏大使刘晓奉命专程来到原子能研究中心，拜访钱三强和钱学森，征求他们對於『助党整风』的意见。鼓励他们消除顾虑，大胆鸣放。

钱学森『立场坚定』，胸有城府，明明有一肚子的意见，

早期海归派的命运

不管你刘晓怎么苦口婆心地动员，也不愿吐露真情。曾经当过居里夫人学生和助手的钱三强心直口快，坚持科学家的良心，向刘晓倾吐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科学研究的管理和领导，毫无保留地向中共的科研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十分尖锐，切中时弊。



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

钱三强说，法国科学家每年有笔固定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由科学家自己制订实施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加干预。科学院由科学家自己领导和管理。苏联从俄国彼得大帝时代起，就吸取法国的经验，即使在斯大林时代，党组织在科学院只做思想和后勤工作，不干涉科学家的研究，十分尊重科学家。

钱三强明确而认真地提出建议：『中国应当吸收法国和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份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

耿直的钱三强自认为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为改进党的工作献计献策，纯属善意。但是某些中央领导人认为钱三强蔑视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认定他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共产党在科学技术界的领导地位，与储安平的『党天下』如出一辙。用毛泽东的香花毒草六条标准一套，显然是反

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钱三强中了阳谋圈套，头上这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帽子便这样被草率地定了下来。由於钱三强属於中央级保护对象，时任负责军工生产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因此他的右派帽子要由毛泽东和邓小平亲自拍板。毛泽东搞原子弹心切，欲圆原子梦，少不了钱三强。周恩来和聂荣臻也力主保护，他才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帽子。然而同马寅初、张奚若、华罗庚、傅鹰等知名人士一样，逃不过中右份子和内控右派的命运。

经过『批评教育』，钱三强並沒有吸取教训。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划归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所长仍是钱三强。人们夸奖他所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一九六二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份子会议上，周恩来宣佈『知识份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陈毅行鞠躬礼，为知识份子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

钱三强参加了这次会议，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天真地想：周恩来和陈毅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周、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但是他不清楚，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后，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发挥了个人『独立思考』，也许仅仅征得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同意，便大胆地在知识份子问题上另辟蹊径。钱三强则出自内心地拥护周恩来和陈毅的观点。

参加广州会议后，钱三强回到北京，立刻向中国科学院传达。他心情激动地在传达大会上宣称：『聂荣臻元帅说，

早期海归派的命运

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他乘机借题发挥，宣泄积郁在胸中的不满情绪。

此话一出，再次引起中共各级政工人员的愤懑。毛泽东很快批评了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非但重新给知识份子戴上



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國文藝界精英

『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且追加几道紧箍咒，强调知识份子必须『脱胎换骨』。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陈毅不断检讨。钱三强『本性难移』，继续公开放毒，攻击党的英明领导，非严加

批判不可，这一回再也不可给他溜掉。

检讨多次没有通过。而且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卫道者们指责他比反右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更为严重，更露骨、更嚣张地反对党的领导。难道这种右派份子还能留在军工保密机要单位二机部领导岗位吗？

不仅如此，中共政工人员还有一条更充分理由，足以把他逐出二机部。钱三强的海外社会关系异常复杂。在宁左勿右的阶级斗争年代，仅凭他复杂的海外关系，也不宜领导绝端机密的原子弹攻关工作。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阶级立场问题。

事情闹大了。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拉了国防科委主任、分管二机部的聂荣臻副总理一起到二机部听取了一整天汇报。保、贬二派争论不休。周恩来有外事活动，请聂荣臻继续主持会议。最后聂荣臻宣布：『你们连钱三强都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周恩来是和事佬，暨批评了中共二机部党组不尊重科学家，又批判了钱三强不尊重『党的领导』。但是他总算勉强保住了钱三强在中共原子弹攻关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当然他是请示了毛泽东以后才敢於这样做的。毛泽东心急如焚地要圆他的原子梦，少了钱三强，此梦难圆。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泽东圆了原子梦，便要过河拆桥，解决钱三强的『阶级立场』问题了。就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晚上七时，中共二机部党组召开了一个钱三强批判会，强迫他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美其名曰『接受党内帮助』，因为他还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批判一通后，即刻押送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为对他进行思想改造。这颗攻克量子力学和原子弹的伟大科学脑袋，屈辱地用来计算河南信阳地区农民的工分和生产队干部多吃多佔的小学生都会计算的最简单不过的数学题。

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为邓稼先等一大批立功人员的庆功大会。而真正的功臣、中国原子弹之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二机部副部长、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博士却被排除在外，另案处理，接受批判。

再也无人提起他为毛泽东的『两弹一星』立下的丰功伟绩，他和钱伟长一起销声匿迹，默默无闻了。三钱中只有

早期海归派的命运

钱学森被中共树为旗帜，享尽荣华富贵。按照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要捧一个人，可以捧上九霄，欲仙欲醉；要贬一个人，可以贬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钱三强和钱学森便是这两种极端。

从青年时代起钱三强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去法国求学，拜居里夫人为师。老父临终都未见上一面。四十多年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一心为了『两弹一星』。仅仅不愿违背科学家良心，敢於讲真话，落得如此下场。别人问他：『原爆功臣上的照片怎么没有你？』他心胸坦然地回答：『有几个人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二个人不算什么。』

可怜憨厚的钱三强至一九九二年逝世都不知道，自己是个被中共内部控制使用的内控右派，亦即中右份子。按照毛泽东的政治术语，叫作『帽子拿在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手里』。一九七九年中科院和二机部改正右派的名单中，没有钱三强的名字。二〇〇七年第六期《炎黄春秋》发表署名春江的文章，披露了中国原子能事业创始人钱三强的遭遇后，有一位作者认识的曾任中科院党组成员的离休老干部感慨地透露，连钱三强都划过内控右派呀！

力學家錢偉長—右派份子

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拉了一批有名望的知识份子加入中共。中共准备把他们拉进党内再继续改造他们的思想。可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组织入党了，思想並沒有入党。钱三强的所作所为充分表现了中国自由知识份子不畏强暴、坦诚敢言的独立性格。他与马寅初、张奚若、傅鹰、华罗庚一样，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对国家

民族有贡献。中共对他们是又气又恨，又拉又打，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创造发明了一顶『内控右派』的帽子，专门送给这一类人。

三钱中的力学家钱伟长则是另一种情况，虽然他出生於一九一二年，却是三钱中唯一在世的寿星。他出身於江苏无锡的诗礼之家，是国学家钱穆的亲侄子。三钱中他回国最早，一九四六年自美回国后即任清华、燕京等大学教授。在学术上，曾在美国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方程』。政治上积极靠拢中共，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

反右时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参加民盟组织的六教授会议，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科学纲领』起草人之一。此外他反对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按苏联模式将大学办成一所只有单一工科的『工程师摇篮』，主张和鼓吹西方式综合性理工大学。蒋南翔毫无根据地批判他的综合性理工大学思想是『想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到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老路上去』，钱伟长『不要苏联，要英美德日』。《人民日报》点名批判钱伟长，称他为『章罗联盟在科技界的掮客』。

戴上右派帽子后，钱伟长的处境比别的右派好一些。因为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专门提到钱伟长的处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毛泽东在最后处理时放他一马。

钱伟长先辱后荣。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后担任过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享受国务

院副总理级待遇，享尽荣华富贵。然而对于他的晚节，人们也有不同评价。一九八七年北京的前右派举行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他参加。他与费孝通两人却向当局作了『请示汇报』，致使纪念活动半途夭折。人们怪罪於他们。可是一旦达到他们那样的权高位重，恐怕也是出於自保与无奈罢！

導彈之父錢學森一漏網右派

拨开中共的障眼法，看看钱学森的『真面目』。中共最爱津津乐道的是钱学森在韩战中毅然回国的爱国壮举。中共的确托人带信劝他回国，他没有回覆。与此同时却申请入籍美国，因韩战和美国奉行麦卡锡主义而被拒，移民局开始进入递解出境程序，並禁止他接触机密。在此情况下，他被迫离境。中共制造了用韩战被俘的一名美国陆军准将把他交换回来的神话。

钱学森在加洲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有一位要好的同窗徐璋本（1911-1990）。两人在一九四〇年左右先后获得博士学位。钱学森的专长是导弹制导；徐璋本专攻反导弹。而在理论力学方面，徐璋本要比钱学森的造诣更高一些，回国也早一些。先在上海交大任教，院系调整后，调到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

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徐璋本教授逆风而上，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建议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建议成立劳动党，走赫鲁晓夫中间路线。他说到做到，在清华园发表三大文件：登记启事、劳动党发起宣言和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说，他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

这位与钱学森齐名的清华一级教授，顿时被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捏成齏粉，戴上现行反革命份子和极右份子二顶大帽子，判处十五年徒刑。徐璋本家属顿时陷入困境。三年饥荒时期，徐妻王锡琼向徐昔日同窗好友钱学森求助，钱立即去信表示同情，每月接济四十元人民币和几十斤粮票。

钱学森另一反常之举，是在反右高潮钱伟长痛遭批斗的时候还去探望他，安抚有加，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立场。

不久，此二件事被人揭发。称钱学森表面上拥护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暗地里同情右派份子，支助反革命右派份子家属，暗通款曲，沆瀣一气。同情帮助右派与右派同罪。钱学森因此遭到严厉批判，在向党交心的材料中作出多次检讨，勉强过关。钱学森究竟是人性大於党性，还是党性大於人性？读者自然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说钱学森在反右中逃过一劫的真实原因，而不是中共强加於他的『立场坚定，坚决拥护毛泽东发起的反右派运动』的桂冠。

在政治高压空气下，钱学森亦做过一些违心的事。『大跃进』中，他为亩产几万斤粮食寻找光合作用的科学根据，反遭毛泽东当众奚落道：『原来你也冒叫一声。』一九五七年苏联运来六十车皮的二枚 P-2 导弹连同全部图纸。中共仿制为东风 I 型导弹，大肆宣传为自力更生的结果，这是对导弹专家钱学森最大的侮辱，他只好忍气吞声。

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几次登门拜访钱学森，迫他表态反对伪气功。钱坚持认为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都属於人体科学的研究范围。始终没有表态支持中共镇压法轮功。

早期海归派的命运

如同中共在知识界树立的另一面旗帜地质学家李四光一样，中共用抬捧李四光的办法，打压与李四光齐名、但耿直敢言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教授（与妻子一起自杀的右派份子），甚至把发现大庆和胜利油田的功劳，也张冠李戴地从谢家荣头上移到李四光身上。中共也用抬捧钱学森的办法、打压其他真实坦言的像钱三强那样的专家学者。这种胡萝卜和大棒交替使用的政策，用来降服知识份子，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拨开钱学森身上的迷雾，恢复钱学森自由知识份子的本来面目，才是对钱学森最真诚的悼念！

2009年11月6日
写於钱学森追悼会后

二十、三代黨內右派

縱論中共內鬥

二〇一〇年春节期间一个霪雨绵绵的下午，我相约沙尚之女士同去探访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现年九十四的右派老人周克。他是尚存右派中的高龄前辈。与他相比，我这个七十四岁的当年学生党员右派只能充作晚一辈的第二代右派了。沙尚之女士是著名党内右派、原浙江省长沙文汉和原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极右份子陈修良伉俪的独生女。她承袭了双亲开明睿智的民主意识，其敢说敢言的行事作风，与其双亲何其相似乃尔。她的父母和叔叔在地下党活动中，曾是周克老人的直接领导。虽然尚之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中共喜欢论资排辈，因此从辈分上讲，她只能在我们三人中权充第三代『右派传人』了。

周克老人一九三四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三七年转为中共党员，享受省部级离休干部待遇。在阴冷的冬天，住进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专为离休高干所设的一座高雅的别墅内。这座名叫『余庆别墅』的哥德式小楼位於市中心衡山路地铁站旁，闹中取静，当然门卫森严，闲人不得入内。尚存的寥若晨星的山省部级离休干部，自然要像『国宝』似地保护起来。



采访时的周克与沙尚之

走进周老的套间，一股暖意袅袅袭来，顿时令人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硬朗的身板和敏捷的才思，使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至少小三十岁。坐定以后，我禁不住『恭

维』他说：『周老您看上去比我还年轻呢！』他爽朗地笑道：『我第一看破红尘，第二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沙尚之原先就与他十分相熟，因而我们『三代党内右派』之间显得没有隔代鸿沟，无拘无束地聊将起来。虽然我们事先不曾确定谈话的主题，却自然而然地归结到一点：『咱们党的党内你死我活残酷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

『得罪了市委第一书记，就大祸临头了』

我们的谈话从我送给他四卷《五七右派列传》开始。他戴上老花镜，略为翻阅一下，问道：『里面没有写我吧？』我说：『还没有呢……』他敏锐地从我的眼神中察觉了疑惑，便解释道：『不要写我。许多对立面今天还在台上。』轻轻一语，挑明了根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向前，政治滞后，像个跛足老人蹒跚而行。四人帮余孽盘根错节。究其原因，便是改朝换代几个『皇帝』，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换来换去都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的信徒不时出来作祟，兴风作浪。

我首先自我介绍，五十年代初我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念书时，我是团总支书记、学生会主席。我叛离家庭、叛离父母，追随中共，是共产革命狂热信徒。我参加过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先队。而他当年曾任上海市团市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青委书记，我直接受他的领导，听过他的报告，依稀记得他年轻时英俊潇洒的模样。所以说我们应当是故交了。

我懊丧地说：『我仅仅传达了彭真的一篇报告，就被错划……』他打断我的话笑着说：『你说当年哪一个是划对的！有没有呀？』於是大家相视而苦涩地大笑不止。当然他自己更加是划错的。周老的右派非但错划，而且反右运动尚未开始，已落进『阳谋』圈套，就事实上已经划定右派了。他划右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得罪了市委第一书记，就大祸临头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那时他已辗转调任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局长。上海市有第一和第二轻工业局，二个局之上有轻工业党委；再上去是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和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最后归口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马天水领导。他对这种层层叠叠的官僚架构和各级领导颐指气使的官僚作风很有意见。

陈毅已上调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次他专程返回上海，在党内的大会上号召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各级领导宣称要『高价』征求代表们对市委工作的意见。周克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倾吐了郁积心头的意见。他批评市里有三种不好的工作作风：一是『将军』、二是『限时限刻』、三是『不许回嘴』；他又批评

市委内部民主作风不正常，第一书记柯庆施对第二书记陈丕显吆五喝六，极不尊重；他对下一届市委领导候选人名单发表意见，直接向主要领导柯庆施提出批评意见。

周克引用了列宁批评斯大林的例子。列宁在遗嘱中曾经批评斯大林：一个共产党人粗暴是不允许的。作为党的总书记，粗暴就更不能容忍了！柯庆施的脾气特别大，训斥起人来毫不留情。许多好心人为周克捏把汗，批评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柯庆施，不啻老虎头上拍苍蝇。

一九五七年，他奉调到中共上海市委担任工业部副部长。自上年党代会后他埋头苦干，根本没有参与整风鸣放。反右运动开始，九月初秋毛泽东视察上海。周克也去聆听毛泽东那次著名的讲话。毛泽东说：『老柯啊，人们叫你柯老吧，是老柯啊还是柯老啊？你们上海人才很多啊，你们现在献宝献得还不够。上海不是有龙卷风嘛？你们今年还没有刮龙卷风吧。』

当时周克与许多在场的人一样，根本听不懂毛泽东讲话的深刻内涵和寓意。毛泽东实际上在暗示，你们上海打右派打得不够，『你们上海人才很多啊』，还没有刮龙卷风呢！可是其他人没有听懂，柯庆施听懂了。毛泽东走后不久，柯庆施决定在上海进行党内反右补课。这一补，翻开周克的陈年旧账，把他补进了『右派行列』。

周克在这场『政治龙卷风』中遭遇灭顶之灾。别有用心的找出他在党代会上的讲话，严加批判。一位对他怀有敌意、主管反右运动的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周老叮嘱不要点名）别有用心地指出，上海一九五六年党代会上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九五六年国际阶级斗争在中国党内的反映。

柯庆施、马天水（以后沦为四人帮成员）把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赫鲁晓夫挂上钩，上纲上线，诬指他是国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 and 应声虫。

中共内斗残酷无情。一旦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你，你就成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任何罪名都可以加到你的头上。周克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取消行政十级高干待遇，下放大隆机器厂当工人，还株连了家属亲友。中共党内也盛行封建株连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遭殃，株连九族』。

他指着我调侃道：『我们都当过党外布尔什维克！』关于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不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始。自中共建党起，没有停止过一天内斗。周克在他撰写的四十二万五千字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周克和他夫人丁瑜一家人在地下党时期的经历亦充满惊涛骇浪。使他难忘的是他的一位情同手足的战友、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金华地委书记的汪光焕、程为昭夫妻，在一九四二年抗战烽火中，忽然双双成为『党的内奸』，惨遭作风专横、嫉贤妒能的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兼浙南特委书记的处决。为了『节省子弹』，汪、程二人是被绳子活活勒死的。四十年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委才作出『为汪光焕、程为昭两同志平反的决定』。直到今天，每当提起这件事，仍令周老痛心疾首。

尚之插嘴道，地下党和起义人员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她举出重庆号起义的例子。重庆号起义有多头领导，弄得起义人员无所适从。中共大吹特吹重庆号起义成功，起义人员却遭到打击迫害。她说：『现在描写地下党的电视剧只有上

半部，写到斗争胜利为止。不写地下党和起义人员在解放后如何受到迫害打击，成为叛徒、内奸、特务』。周老气愤地说：『这种戏我看都不要看，实在太假了』。

胡耀邦爲我『三恢復』，李銳把我『扶上馬』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中国走上艰巨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道路。胡耀邦执掌中共中央组织部后，开始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周克弟弟也是老地下党，虽然自己在文革中的政治审查尚未结束，仍从北京打来



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

电话提醒哥哥：该是申诉的时候了。周克借出差的机会，将申诉材料送到中央组织部。他想见见胡耀邦，接待他的干部说，不必

了，我会向耀邦报告的。

第三天，周克就收到胡耀邦对他申诉信作出的批覆：『申诉收到，不需面谈了。由我们中央组织部负责办！』。周克又去拜访了中组部办公室主任，不无担心地告诉他：『我的问题是有对立面，因此在上海是有阻力的，所以我特地到北京来上访。』办公室主任回答道：『耀邦同志已经看了你的申诉，他说：「这是一九五六年的事嘛，怎么算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大鸣大放的账上去了？这是在党代会上的发言，是在党内向组织提的意见，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怎

么是向党进攻？！」』

这位主任告诉周克，要他放心，一个月内会直接通知他经办的情况。周克把家里的电话、地址告诉对方。按照中共组织原则，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直接通知本人，必须通过组织层层下达。但是中组部的安排煞费苦心。上海是四人帮老巢，处理冤假错案必有阻力。况且那个时候，上海处理右派问题尚未启动。胡耀邦已经多次提出：『上海有「四大明星」。怎么到现在还不动呀？』

『四大明星』系指反右运动中上海打出的四位党内最大右派和反党份子：王尧山、薛尚实、周克、黄浩。王尧山（1900 - 1995）一九三一年入党，曾是左联领导人，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在潘汉年事件中敢於说真话，不投井下石，被打入『潘汉年集团』，一九五九年开除党籍，但没有戴帽，下放上海市淮海中学。王的夫人赵先，是上海市妇联主任，为丈夫鸣冤叫屈，打成右派；薛尚实（1902 - 1977）一九二九年入党，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因指责柯庆施是上海『一霸』，犯下与周克同样罪行而划为右派。黄浩则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曾在二十年代到苏联留学，其资历与柯庆施不相上下。党内亦称他们四人是反党『四大金刚』。

应当说，柯庆施在反右运动中对属下干部还是比较保护的。薛尚实、周克向他提意见，敢於在老虎头上拍苍蝇，那就对不起啦，请君入瓮！王尧山则算是潘汉年线上的人。胡耀邦多次督促上海解决四大名星的问题，六月底，中组部将挂号信直接寄往周克家里，通知他，已正式列为XX号案件，由中央组织部直接负责覆查。最后，由胡耀邦亲自插手解决

了他的『三恢复』——恢复党籍、恢复级别、恢复原职。

一九八一年，周克去北京参加中共各省市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期间，胡耀邦接见了。一见面就说：『你吃苦了！总算还好，你已经又在工作了，这就好！这就好！』接着说：『是的，项南和你当年都是团干部中精干的。现在项南在福建干得不错。你也还可以多干些工作的！你的身体不错就好办了。』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王照华、项南、周克等人可以称得上是中共最早的老团派了。

胡耀邦思路非常开阔，非常活跃，说道：『中央急需选拔一批年轻的优秀干部。「四人帮」耽误了一批干部，摧残了一批干部，也毒害了一批干部。这个创伤是巨大的哟！』

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四人帮余毒很深，三种人（打砸抢、造反起家、幕后策划和制造反革命舆论）盘根错节，因此组织工作特别重要。中共上海市委陈国栋、胡立教、王一平等准备选拔周克出任市委组织部部长。报到胡耀邦那里，胡说：『我同意呀！』陈云也问起，说道：『那好呀，他做组织部长好呀，那你们报嘛！』

此后的申报过程却是一波三折，报几次退几次，拖了二、三个月。直到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在上海呆了约一个月，虽然没有找周克谈话，但事后才知道，李锐是专程为考察周克来上海的。过了一年，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李锐又来到上海，临走时约周克谈话，开门见山说：『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王照华同志去年是来考察你的；我今年又是来考察你的。现在听下来，你成了矛盾的焦点！——反对你的人很多，但赞成你的人也很多。我们现在的结论，你是好的，我们赞成你！我回去报告。』正因为李锐的考察和报告，

一九八三年春节，中央下达任命周克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批覆。

爲王申酉冤案覆查平反

右派改正后不久，那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全市局级以上干部参加。周克的『老毛病』又犯了，一口气讲三个小时，一吐胸中积郁为快，阐明自己观点。他说，这座小楼我已经二十一年没来了，今天来了，我的感慨很多。我来此以前，很多老同志关照我说，你还得小心些，能讲的讲，不能讲的不要讲；可是群众对我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为什么大家还心有余悸？因为汪东兴同志还是党的副主席，他还在阻挠干部的平反工作。……我的问题主要是得罪了柯庆施同志，因为我当时感到市委民主生活不正常，主要是看到了柯庆施同志对陈丕显同志的态度很专横，对我们下面干部更不用说了。我想，一个第一书记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第二书记呢？

他又谈到在党内会议上的发言，怎么算到大鸣大放账上？一九五六年前的事怎么算到了一九五七年以后？党代会上正常的民主生活发言，对领导提点希望，怎么叫作反党？在学习会上发言，怎么叫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他说搞运动用推理分析代替事实——敢於反柯庆施就是敢於反党中央；引用列宁批判斯大林的话就是反马列主义、反列宁，如此等等。他尖锐地指出，定右派按比例，根本不是实事求是。敌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多少就是多少，怎么可以预先定个比例？

回到家里，他把这件事告诉夫人丁瑜，她也是三十年代入党的地下党老干部。她说：『啊呀，老周，你真是打不怕，

又去发言了。』他说；『我实在忍不住，还是讲了。』说到这儿，周老回头笑着对沙尚之说：『你妈的个性比我还要刚直，拍桌子，摔椅子，谁都不卖账。』

我与沙尚之问他，在重新登上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岗位后，做过自己认为满意的事吗？他略一思忖道，三中全会后，已经六十多岁了，到了下岗的年限，仅仅做了几年。在众多的工作中，有三件事他觉得有意义。一是审查清理了二千多名干部，其中不乏三种人和四人帮余孽，以及不称职的人；其次向中央输送了几十名第三梯队，包括李源潮、孟建柱、赵启正，他点了几个人的名字；第三是覆查平反了王申酉冤案。

王申酉冤案他讲得最多，似乎想说明什么问题。『我没想到，参与王申酉冤案的覆查工作，使我承担了新的风险和压力，对我后来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为了坚持原则，为了为这样一位政治成熟、见解深刻的追求真理的革命好青年覆查平反，我义无反顾！』周老仿佛又回到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为革命理想赴汤蹈火。

一九八〇年三月，陈国栋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胡立教为第二书记，周克进入市委担任副秘书长。王申酉案是以彭冲为首的前市委班子定的，成为后来新班子面临的一道难题。周克参与了这个案件的覆查，在市委常委会的争论中冲在最前面。李锐对他说：『你成了矛盾的焦点。』

王申酉（1945 - 1977）出身於上海工人家庭，一九六二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一九六七年参加炮打张春桥，被抄家毒打。一九六九年一月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三个月后释放回校监督劳动。在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认定犯有『恶攻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破坏『一打三反』运动，定性敌我矛盾，押送苏北大丰农场劳动。期间写下一百多万字的日记。一九七二年返校监督劳动。

他参与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在四人帮倒台后居然又被诬指犯下『恶攻罪』，关押进上海市普陀区拘留所。判他犯有的九项『恶攻罪』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文革、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收缴他的日记和情书。普陀区公检法和上海市高校党组判处他死缓和死刑两种方案送呈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市委常委会否定死缓，批准死刑。於一九七七年五一节前处决。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依旧没有法治，只有党治——执行死刑不由法院而由党委批准。

从周克接触的材料看，王申酉在政治上很成熟，研读了大量政治理论书籍。他和张志新不一样，非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误区。毛泽东的做法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在中国行不通。他认为从历史进程看，否



王申酉（1946-1977）上海人。工人家庭出身，17岁考入华东师范大学。1966年因质疑『文革』入狱。1976年，以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倾』运动，『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为彭德怀、邓小平翻案等罪名，再次入狱。1977年4月被判死刑。

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不对的。他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分析具有顾准（党内极右份子）的水平和深度。

施平调去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后，有一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写信给施平，指出王申酉案有错。施平报告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夏征农和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他们二人支持施平，施平便在一九八〇年春天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来了，引起全场轰动。怎么？上海也有张志新，而且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性质更为严重与恶劣。

新市委决定成立覆查组，法院院长关子展任覆查组长，周克任副组长，共有七位成员。覆查组发现，原先上报的是『有期徒刑』，被原市委退回六次，每退一次，上面批示：『你们思想右倾』、『你们要很好作检查，思想右倾』。指令层层加刑，最后市委批示『死刑，立即执行』。

覆查平反过程的艰巨曲折简直难以想象。有人提出王申酉在日记中有反动言论，有人认为王申酉是『持不同政见者』、『异见份子』，更有人以为是小题大做。市委内部争论了无数次，有多次争论得异常剧烈。最后申报中央同意后，以市委名义召开王申酉平反昭雪大会，肯定他是一个勤奋学习、追求真理的好青年。

王申酉的平反昭雪过程和最后的决策权，跟判处死刑时的情况一样，证明在中国只有党治，没有法治，用政策代替法律，又无制衡机制；其次，周老也想说明，四人帮（实际上五人帮）的势力是多么强大，至今阴魂不散！

『搞革命絕對不能當地下黨』

周老谈话中一再提到尚之母亲陈修良的刚烈性格，我们谈论的主题渐渐进入周老和尚之父母那段共同经历的地下党惊心动魄的历史。周老回忆起这么一件事。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在他家秘密聚会，部署工作，迎接解放。会上，地下市委领导人张执一郑重地将一份通过安插在国军内线冒着生命危险偷来的《国军上海军事佈防图》和国府在上海重要军事、经济据点分佈交给他，要他立刻亲手交给三野粟裕副司令员。

他立即秘密渡江，亲自把图交到粟裕手里。粟裕称赞和感谢上海地下党同志，及时送来这么重要的资料，这一情报对解放上海地区很有用。现在这份资料还保存在上海博物馆里。

沙尚之说，她妈妈在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时，组织领导全市数千名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心脏，出生入死偷取了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佈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存及数量表》、《一九四八年国军后备军力量》、《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情报，送过江去，交给攻城部队。

仅南京和上海两地的地下党，在领导组织学生运动、全方位的情报工作、国军海陆空三军大策反、大起义中立下了功不可没的汗马功劳。陈修良多次受到中共中央表扬和嘉奖，誉她为『策反主帅』。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她领导和指挥下，策反空军四架 B 24 型轰炸机、海军『重庆号』、大校场机场塔台、431 电台、国府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的起义，

三代党内右派纵论中共内斗

偷取密码、军事地图。陈修良与张露萍、朱枫並称为中共三大女谍，张、朱两位被国府破获处决，只有陈修良一人盼到了『解放』。

中共一贯鼓吹毛泽东熟读孙子兵法，神机妙算、用兵如神。用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奠定了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事实上，中共夺取胜利、巩固政权主要靠的是第五纵队——潜伏在对手阵营中的间谍、特工、地下党、中共特别党员。过去如此，今天依旧如此。

我请教周老：『中共向来对中共特别党员一说讳莫如深，你是怎么看的？』我说我与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的儿子是中学同学，一同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他亲口告诉我，他父亲在解放前夕亲自发展了荣毅仁（民族资本家、原国家副主席）、吴耀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两位特别党员。周老点点头，证实了我的看法。而且补充道：『宋庆龄也是呀！不过她是共产国际发展的』。



原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和他的妻子陳修良

得死去活来。毛泽东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首先把打天下的功劳归於自己，其次是解放军，地下党游击队忝居末位。他秘密制订了处理南京地下党的政策：『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

地消化、逐步淘汰』，下达到四大野战军的首长一级。毛泽东一直认为以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城市贫民和工人为主体的地下党成份复杂、动机不纯，存在严重问题，靠不住，亟待整顿。

周老著的《风雨七十年——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已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上面登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照的上海、南京地下党劫后余

生的领导人。从右起赵先（原上海妇联主任、右派份子）、陈修良（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极右份子）、王尧山（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受潘汉



上海與南京地下黨領導人在1979年11月11日重逢於上海錦江飯店

年牵连开除党籍的

反党份子）、张棋（原总工会主席、批判工会福利主义）、张承宗（原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降级安排』）、周克（右派份子）。六位地下党领导人，二位右派，一位极右，一位开除党籍，尚存二位也受不同程度迫害。

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角的原型，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政府枪决。张困斋是地下党，随同哥哥一起参加革命。可是在后来，这笔功劳却算到延安派来的谍报员身上。电影中孙道临演的主角已经不是张困斋了。这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伎俩使多少地下党员的鲜血白流了，更何况受冤屈遭迫害。

三代党内右派纵论中共内斗

刘、邓二野刚开进南京，邓小平就做报告，严厉批评南京地下党无组织无纪律，不服气解放军，居功自恃。刘伯承取代陈修良，出任南京市委书记，陈降为组织部长。后调往上海、杭州，反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代宣传部长。人家宣传部长不加『代』字，她要加个代字，说明中共对她不信用。到了反右，戴上极右帽子，发配嘉兴农村劳动。过去为中共抛头颅、洒鲜血立下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邓小平为什么要整顿地下党呢？原来中共正规军与地下党之间的关係，形同国军中的嫡系与地方部队。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说过：『解放初期，中央提出要依靠大军，依靠老解放区干部建立新解放区的工作』，『由大军和南下干部卦帅』。地方干部若不调走，至多当个副职，此为其一；其次，从极其落后和艰苦环境中出来的正规军与南下干部以农民为主体。进城后环境的巨大落差，像《红楼梦》中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顿时使接管产生问题，违纪和腐败风气有所弥漫。陈修良和地下党批评了这些现象，引起反弹。只有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态度明确，支持这种意见。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邓小平在南京作的《论忠诚与老实》报告中说，南京地下党，『有一条心、半条心、两条心三种人』。他提出在地下党中要清洗两条心的人，更指出这些两条心的人是受『半条心』的人掩护的。因此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南京地下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至次年一月进行了整风，全市二千多名地下党员开除党籍、取消候补期、劝退、停止党籍待审者达三、四百人之多，差不多佔南京地下党全体成员的20%。他们都是『两条心』和『半条心』的人。

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处理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也为以后毛泽东大反地方主义留下了伏笔。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把反地方主义作为党内反右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九五八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

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长谢富治，於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在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恶狠狠地叫嚣道：『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边纵』是指上世纪四十年代活跃在滇东北的一支地方游击队，谢富治要在战功卓著的地、师级（支队）干部中大抓地方主义右派份子。陶铸则在广东省大反地方主义，广东全省揪出的右派份子中，居然有三分之一是由中共党内的地方主义份子『兼任』的。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巡视各地，在党内揪出十多个省一级的地方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沙尚之说，她父亲是其中最早揪出来的一个。他的罪名之一，便是拉帮结派，搞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

所以沙尚之说，她母亲陈修良在晚年右派改正后，心情十分沉重地总结自己坎坷的一生说：『搞革命绝对不能做地下党』。陈修良在改正后落实政策时，她只要求把她和女儿调回上海，什么东西都不要，随身只带四大箱珍贵的资料，包括书信、地下党文件、她和沙文汉写的检查。我去尚之家的时候，她指给我看已被她分门别类放进书橱里那些泛黄的资料。她说，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宝贵财富，我要把它们整理出来，釐清真相、还原历史。这是她退休

生活中的主要工作。

『搞革命绝对不能当干部』，这是陈修良对女儿说的另一个交代。沙尚之毕业於北京大学化学系，从事技术工作。落实政策后，要调她到市里担任市妇联的领导人。她母亲得知后，坚决反对，於是向女儿说了这句肺腑之言。两个『绝对不能』，即是这位曾经当过向警予秘书、並由向警予介绍入党的老革命家，对她毕生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所划上的休止符。

沙文漢的思考：『國族奴隸主義』

沙尚之父亲沙文汉（1908 - 1964）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党员，但他始终保留着可贵的民主意识，是中共党内早一代的民主派。当然为毛泽东和他的忠实信徒所不容。一九五七年在他浙江省省长任上，成为第一个揪出的正省级高干右派。戴上右派帽子后，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由行政六级降为十二级，仅保留省政协委员虚衔。

他被从省长公寓逐进一间陋室，日夜受人监视。夫人陈修良划为极右份子送往嘉兴劳动，女儿远在北京上学，缺医少药，生活起居无人照顾。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拖着因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而日益衰弱的病弱之躯，起早摸黑查阅大量古籍文献，以及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做出大量笔记。他还精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经典著作，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弄清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特点，进而找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内斗不息的根由。

一盏孤灯、一间陋室、一身病痛、一把蒲扇，不分春夏秋冬，他给妻子写信道：『简直像发疯一样进行持续「苦斗」』。

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在临终前完成八万多字的《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他睿智的思考成果和明确的民主意识。在一九六三年七一前夕，他恭恭敬敬地送到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作为给『党的生日』献礼。

他当然知道，右派份子禁止出书的。他生前看不到出版，可是他尽了自己『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心意。他在逝世



沙文汉遗著《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

前写出『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的绝唱。二十多年后，《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首先发表在《浙江季刊》，一九八〇年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然而颀颀的中共审查官员能看得出沙文汉所表述的真意吗？

这本书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他们指出，沙文汉在深层次上认识和理解了中国传统上为什么一直实行专制与集权统治？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总可以用『集中』、『统一』为由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为

什么中华民族常常表现出对上盲目服从的奴性，非常缺乏独立思考与自由精神？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的等级差别制度如此森严，难于破除？通过史料他论证道，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的。中国私有制的特点，主要是氏族或称『国族』所有制，

即以国家的名义拥有一切。

这种发展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只能形成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 -- 自由民』，即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必定是『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中国社会的这种特点，究其原因，一切政治现象都与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不可分割。而封闭的、家族式的农耕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

中共党内的内斗不息不是偶然的，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因素外，中共党内乃至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专制独裁的土壤。反右后陈修良问沙文汉为什么在检讨中说了违心的话，如『主张党政分工是与党唱对台戏』。沙文汉回答说：『这是照顾省委的威望。皇帝把大臣推出午门斩首，被害人必须跪在地上，朝北向皇帝叩头，口称罪该万死』。事实上，他始终不承认『党内民主』、『党政分工』是错误的。历史证明，真理在他手中。

一九六三年底，沙文汉受寒生病，因体质太差，转入不治。沙尚之闻讯匆匆自北京赶回。在弥留期间，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长用电话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代表中央同意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当将这个决定告诉他时，仅仅说了声『谢谢！』从此再没开口，於翌年一月四日阖然长逝。那一年，这位杰出的民主斗士正当五十六岁英年。

我们为他的英年早逝唏嘘不已，他的思想光芒刚崭露头角，尚未被世人所认识。谈话是没有主题的。顺着尚之介绍他父亲晚年研究成果，我们最后的话题转入中共实行的等级

森严的官本位制。我淘出笔记本，翻开最近从网上下载的几个数据，念了出来。据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老干部局公布，到二〇〇七年五月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主席、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中顾委主任一级离休干部十二人，公费开支三亿二千六百万，人均二千七百二十五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含享有同等待遇的老一辈遗孀）离休干部一百〇五人，公费开支六亿七千一百万，人均六百三十万；省部级离休干部（含同等待遇的知名人士）五千五百三十七人，每人每年公费开支七十万至六百万不等。京、沪、粤、浙、闽省部级离休干部每人每年开支五百万以上。以上三类共五千六百六十四人，总开支二十亿左右。在职政治局常委每人每年开支预算超过五千万。他们这些人的子女享受的特权，更加无法统计。

官本位制度形成特权阶层和权贵资本主义，官本位制促使贪污腐化、争权夺利盛行，官本位制是中共内斗不息的根由之一，也是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专制独裁的根本原因。沙文汉研究发现的『国族奴隶主义』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呵！

周老臨別贈言：保護自己，注意策略

离休后，周老仍要参加离休干部活动。他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张会议通知给我们看，韩正明天为离休干部作报告。周老说，我在一般情况下不发言。如果一定要我说，我也说上几句，但不说违心的话。他笑着举例道：『有一次讨论胡锦涛

三代党内右派纵论中共内斗

涛的科学发展观。我说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说明过去的发展不科学。周老正如季羨林所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窗外天色逐渐转暗，已经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了。漫无边际的交谈不觉已经进行了近四个小时，周老打开电灯，他依然炯炯有神，毫无倦色。他要留我们吃晚饭，他的保姆返乡过节还未回来，他需要自己照顾自己。我和尚之怕打扰他太久，便告辞出来。

沙尚之意犹未尽，她说：『中共患上了恐惧症，恐惧历史，恐惧人民。对于不同意见，不是打压，就是封杀。最怕人民了解真相，强迫人民遗忘过去，篡改历史。』周老送我们到门口，针对沙尚之的那一番话，谆谆叮嘱我们：『要保护自己，注意策略』。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我想，这也就是他对晚辈的呵护和希望吧！

2010年3月8日

二十一、轉型正義和 右派平反索賠

轉型正義已形成世界性潮流

『转型正义』是指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在实行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独裁政体的政治压迫，以及因压迫而导致的政治、种族或族群社会的不公、虐待、歧视和分裂，所做的善后处理工作。转型正义业已形成轰轰烈烈的世界性潮流。其主要任务包括：

一，对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给予正义，归还被没收的财产。遭受肉体自由和生命损失的人或其家属，还必须加以赔偿。

二，对从事政治迫害的个人、团体或政党，必须在法律上和道德上予以追究，给以合理合法的惩治。

三，对过去政治迫害的真相和历史，必须完整地向公众公开地加以呈现，不得隐瞒。

不同的国家因为历史和政治环境的不同，经常用不同方式处理以上工作。如果处理不当，会引起社会分裂和危及社会稳定。转型正义是一项高度政治敏感的工作，必须谨慎行事，循序渐进。

转型正义的重要性在於，一个民主社会如果不处理极权

政体遗留的以上工作，其民主体制将很难在和平稳定的民主文化中健康运转。因为一个民主社会应从赔偿受害者、追究加害者的实际行动中向人民展示民主正义和人道的价值。如果对过去的的不义与暴行选择遗忘和忽视，意味着不愿对防止将来的不义与暴行负任何责任。

透过真相和历史的呈现，一个社会应提醒它的后代，警惕独裁政治对人道的摧残。只有透过历史重现，才能真正建立民主文化。如果不赔偿受害者，追究加害者，社会裂痕不可能消弥，仇恨不可能消除。欺骗和谎言是暴力的继续，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

政治迫害经常造成社会大规模分裂。假如不赔偿受害者，追究加害者，社会裂痕不可能弥合。强迫或故意迫使人们遗忘，非但不会带来和解，而且会造成新的社会分裂。真诚地面对过去，面对真相，才是社会和谐的唯一途径。台湾在威权统治时期，强迫人们遗忘『二·二八』，不准公开讨论和传播，产生了族群关系紧张的局面。

世界上轉型正義的國家

世界上目前有五十四国家和地区在进行转型正义的工作，主要有美国、德国、波斯尼亚、波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津巴布韦、菲律宾、乌干达、智利、乍德、尼泊尔、加拿大、萨尔瓦多、南非、宏都拉斯、危地马拉、斯里兰卡、布隆迪、海地、澳大利亚、北爱尔兰、摩洛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科特迪瓦、中非、刚果、加纳、伊拉克、阿富汗、巴西、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前独联体各国、台湾等，无法

一一列举，仅选择几个典型事例，介绍如下：

德國，『前东德社会统一党（即德共）独裁时期历史评价与影响研究委员会』，调查清算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德共统治时的人权侵犯和人身迫害事件，听取目击者证词，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完成报告十八册。

美國，『战时公民遭逼迁与拘留委员会』由国会设置，调查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间美国公民与移民被强迫迁移与拘禁的情况。『Greensboro 真相委员会』调查和处理猖獗一时的 3K 党和美国纳粹党种族杀戮事件。

阿根廷，『失踪者国家委员会』，调查一九七六——一九八三年军政府统治时期，近九千人下落不明的情况。审查八千九百六十位失踪案与不计其数的凌虐和拘留案，确认三百六十五座凌虐和集中营。其成果报告《永不重蹈覆辙》於一九八四年公诸於世。

津巴布韋，总统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 Metabeleland 地区一千五百名政治异议份子和平民惨遭杀戮的情况。但政府害怕引起报复，迟迟不敢公布事实真相，引起各界非议。

菲律賓，『总统人权委员会』，调查一九七二——一九八六年期间马可斯政权违反各种人权的情况。因军方反对而流产。

乍德，『前总统哈布雷及其党羽罪行司法部调查委员会』，调查哈布雷在位期间非法禁锢、暗杀、失踪、绑架等戕害人权案件以及侵佔国家财产的状况。证实了三千四百二十八人的死亡、任意拘禁和凌虐，政治谋杀四万多人。

薩爾瓦多，『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资金由联合国会员国募集和管理，调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二万二千件处死、凌虐与绑架案。一九九三年在美国发表调查报告《从疯狂到希望：萨尔瓦多十二年的战争》。

加拿大，『皇家原住民委员会』，调查自一五〇〇年以前至一九九六年的加拿大原住民社群的情况，並向现政府作出建议，共有五大卷之多。

南非，『前非洲议会成员囚犯投诉委员会』，由曼德拉建议成立，调查前南非国民议会(ANC)利用拘留营滥权 and 一九七九——一九九一年间发生的罪行与失踪案。『ANC成员涉嫌苛待遭拘留者且违反人权调查委员会』，检视一九七九——一九九一年ANC滥权和拘留营中凌虐的案件，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发佈报告，但未公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种族隔离期间人权迫害事件，收集二万一千份证词，二〇〇三年开始做财务赔偿。

危地馬拉，『历史澄清委员会』，调查过去三十六年来国内武装冲突中侵犯人权的案件，最终报告题名《危地马拉：沉默的记忆》。另一个『回复历史记忆委员会』，自一九九五年运作至今。旨在促进国内和解，治愈在长达三十六年的内战中因各种暴行受到伤害的人。冲突中有二十万人丧生，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委员会访谈七千多位受害者，公佈四册调查报告《危地马拉：永不重蹈覆辙》。

斯里蘭卡，『非自愿迁徙或失踪者下落调查委员会』，调查自一九八八年开始的失踪案件，並找出负责者。一共查出一万六千七百件失踪案，赔偿家属损失，超过四百名国安部门成员被起诉。

布隆迪，由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釐清一九九三年 Ndadaye 总统遇刺及相关暴力真相，『九三事件』造成五万人丧生。委员会作出法律、政治和行政措施，惩治肇事者，严防重蹈覆辙，促进国内和解。

北愛爾蘭，『北爱尔兰受害者委员会』调查过去三十年战争中对人权的迫害事件真相，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做平反赔偿工作。

東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一九七四——一九九九年发生的戕害人权案件，估计超过二十万人遇害，佔东帝汶七十一万人口的 35%；其次，让罪行比较轻微的施害者通过程序设计，重新融入社会；第三，釐清受害者需求。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在国际社会压力下，成立『人权特别法庭』，审理东帝汶独立公投前后戕害人权的暴行。

韓國，『总统可疑死亡案件真相委员会』，由金大中当总统时成立，调查过去专制政权期间，异议份子的死亡事件，指认並起诉加害人。『为求真相与和解之过去史整理委员会』，根据国会通过的《为求真相与和解之过去史基本法》，调查从『日帝强佔期』到韩战前后，以及从一九四五年光复至威权统治期间，残杀、失踪、离奇死亡等人权迫害事件。

墨西哥，『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调查在过去的政治或社会运动中，遭受国安部门直接或间接迫害的人。由一位特别检察官和十五位检察官分成三组，一组调查从『肮脏战争』以来迫害失踪的案件；二组负责一九六八和一九七一年屠杀抗议学生的案件；第三组调查上述二组以外的案件。

前南斯拉夫，『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过去十多年来发生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的战争罪行。由於缺

乏少数群体代表和资源，在二〇〇三年失去功能。

伊拉克，『伊拉克特别法庭』，二〇〇五年起更名为『伊拉克高等刑事法庭』。调查自一九六八年以来种族灭绝、违反人道与战争犯罪。由五百多名伊拉克国民组成。设有审判庭、上诉庭、起诉部、行政部等。审判和判决了前独裁者萨达姆等战争罪犯。



劉海粟為藍萍作模特兒素描而戴上右派帽子並在文革中被判無期徒刑

阿富汗，『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是监督人权状况的常设性政府机构。研究调查阿富汗人民的转型正义问题。研究调查表明，90%的人希望开除行兇者的官职；40%的人要起诉加害者；69%的人曾是违反人道罪的受害者。二〇〇五年公佈的报告《呼喊正义人权迫害史的国家评估报告》，建议成立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建立战争罪行审判、检验政府官员的人权记录等措施。

海峽兩岸的轉型正義

台湾在转型正义方面做得並不彻底，虽然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和『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但暂没提及补偿金额是否合理，某些损失没有得到赔偿，政治犯没收的财产没有发还或赔偿。转型正义的其他二项任务则未进行。

其原因是台湾在民主化以后，国民党的李登辉执政了十多年。国民党是威权体制的执行者，当然没有任何动机去检讨与追究自己的错误和压迫，失去了转型正义的黄金时代。民进党执政后又把转型正义引入兰、绿之争的歧路，沦为民进党的政治与选举工具。

除了台湾以外，大陆和香港的中国人对於『转型正义』颇为陌生。儘管转型正义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但是在中国大陆，转型正义的时代远未到来。转型正义的前题是在强权政体在完成

向民主政权转变后方可实施。欧盟於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在北京两会结束前派员前往北京，鉴於中国维权人士和冤民、访民走向世界四出申冤，建议中国政府成立转型正义性质的『中立申诉委员会』。

『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在欧盟作证时，向欧盟提出，没有民间维权人士参加，这个委员会毫无用处。天真的欧盟



零八憲章

官员不明白，向一党专政的威权政体建议『转型正义』，此举等於向刽子手刀下讨人，与虎谋皮。中国政府告诉他们，冤民问题和冤假错案是中国的内政，中国自己有信访部门处理，不容许他国干涉。碰一鼻子灰后，欧盟官员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欧盟与中共在人权方面没有共同的语言，坐不到一起。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日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提出对国家政体、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基本主张。其中第十九条基本主张为『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



《零八宪章》作者劉曉波與張祖樺

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釐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

和解。签名赞同者海内外已逾万人，支持者众多。

《零八宪章》字字句句触动中共神经，击中要害。中共恼羞成怒，判处刘晓波博士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其他《零八宪章》的签着署者也受到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警告处理。

右派的平反索赔

由於中共当局的封锁打压，许多历史问题乱成一笔糊涂账。右派改正、平反便是其中之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搞不清楚，右派是平反还是改正？一九七七年底，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锐为常务副部长。当时文革刚破产，一切需要拨乱反正。對於一九五七年打击迫害这么多知识份子的反右派运动，人民群众的意见最大。

早在右派大改正工作开展以前，胡耀邦大胆地改正了全国第一名右派、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人称『报春第一燕』。胡耀邦在看了温济泽的申诉信和胡乔木、廖承志、吴冷西、熊复的旁证后问道：『对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平反」还是「改正」？』不一会儿，有人向他汇报说：『小平同志说，右派不能叫「平反」，应叫「改正」。』胡耀邦听罢，十分无奈地说：『好吧，改正就改正吧。』因为他生怕邓小平连『改正』都要反悔。

胡耀邦立即成立右派改正办公室，中组部副部长杨仕杰为办公室主任。同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成立『五部右派摘帽办公室』，先后召开『烟台会议』和『北京民族饭店会议』。因受『两个凡是』影响，對於反右运动看法和右派摘帽问题，分歧仍很严重。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改正的范围，全部还是部分？2，改正后如何安置？3，把几十万人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当改正名额突破五十万时，有人担心会不会太多？胡耀邦反问道：『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亦有人担心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右派不好改正。胡耀邦说：『毛主席

主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错了就改。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这样他扫除了一个个障碍。

一九七八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 55 号》文件『中共中央批复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份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即有名的五十五号文件。但是留了二条尾巴，一是邓小平不同意『平反』；二是『右派份子改正后，一律不补发工资，以减轻国家负担，生活困难的予以补助，不登报宣传。』有人说右派大改正的功劳要归於邓小平，其实五十五号文件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个月已经发出了。那时候邓小平尚未复出。

在右派改正工作接近尾声时，国务院曾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发出国务院（落）字第 68 号文件《关于错划右派补发工资的通知》。文件在指导思想、补发范围、补发方法、补发标准和补发时间等五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并指出要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调动知识份子积极性，做好右派工资补发工作；未分配的大学生、性质转变、未改变、外逃的、死亡的不补发；在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后发 30%，其余的五 - 七年内付清，企业单位由公积金支出，机关、事业单位由国库支出；华侨和五千元以下者一次性补发，未调级的一律上调一级；责成上海市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份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进行试点。

在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期，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文件甚至规定补发工资后不叫改正，今后一律叫平反。可惜当时虽然胡、赵当政，实际上实行的是政治老人垂帘听政。陈云闻讯借口国家财政困难，暂时难以执行，强令上海市政府停止试点。把这个国务院 68 号文件扼杀掉了。宋庆龄闻

讯十分气愤，她要用自己的钱来补发右派工资。

大陆民间自发的五七右派索赔平反运动是自一九九五年开始的。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云南、山东、济南、广州、沈阳、武汉、新疆等地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后人，纷纷站出来，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各级政府以及中共党组织发出平反索赔呼籲书或向法院提出平反索赔诉讼。签名者动纒上百成千人。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燕遯符、陈奉孝、博绳武等八人，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北京大学八百多名学生右派全部改正，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二〇〇八年二月，有上千名右派份子或家属签名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出申诉信，坚决要求贯彻执行国务院加[落]字68号文件，彻底平反右派冤案，发还被扣工资。

右派平反索赔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宪法》序言列明：『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法律准则，並且负有保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五条规定，『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宪法》是中共自己起草並提交全国人大通过的，显然也适用於中共本身。可是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带头践踏和破坏壮严的宪法。《宪法》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由於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今天右派提出平反索赔完全符合中共自己制订的宪法和法律，

也符合世界性的转型正义潮流。

右派平反索赔缘起於一九七九——八〇年右派改正工作的不彻底，不伦不类、不尴不尬。为了证明邓小平『改正』的结论是正确的，全国留下若干名右派不予改正。虽然对右派的人数有几种不同统计，而且中共做事向来报喜不报忧。好事夸大其词，坏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官方大大缩水了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为基准，不予改正的仅九十六人。改正率为 99.96%，『搞对的』仅佔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八。可是邓小平硬着頭皮说：『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祇是给划错了的改正。』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说的更透彻：『毛泽东说过，右派问题不能解决。』

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九五七年反斗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分扩大化了。』邓小平当时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与毛泽东沆瀣一气，负有直接肇事责任。事隔二十多年，又当起了法官。刽子手与法官是同一个人，有违悖论。难怪作出如此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结论。

中共中央统战部官员在探望中央级五位不予改正之一的章伯钧妻女时，不得不承认：『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

邓小平自有他的苦衷。反右运动好比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牌，这张牌一倒，全盘皆输。中共的专制统治，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邓小平心知肚明，毛泽东的神龕一倒，中共的统治就会垮台。而在中共政权垮台之前，反右同

六四一样是不可能平反的。

二〇〇七年三月，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置人民群众的强烈意见於不顾，坚持邓小平的错误结论。即便是不予改正的九十六人，也不过是维持邓小平或者中共的面子，留下九十六人为邓小平错误作牺牲品。中共好大喜功，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保住颜面，好搞欺世盗名的面子工程。

中国右派及其家属的平反索赔要求，完全符合转型正义的三条基本原则。可惜中国仍处在中共一党统治的专制政体下，尚不具备转型正义的条件，因此右派的平反索赔也无从谈起。北京大学校庆一百周年，反右运动中受害校友返校向学校当局提出平反索赔的正义要求。党委书记、校长支吾其词，避而不谈。中共中央不予认可，书记校长斗胆敢表态。

历史巨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我们深信，建立在欺骗和谎言基础上的独裁政权，靠经济奇迹维持不了多久。五七右派老人虽然纷纷离世，然而他们第二、三、四代传人高举前辈手中的火炬，继承先烈们的事业、循着先烈们的足迹，釐清真相、还原历史，冲击专制独裁，迎接光明未来。

《〇八宪章》及其提出的基本主张，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2009年8月

追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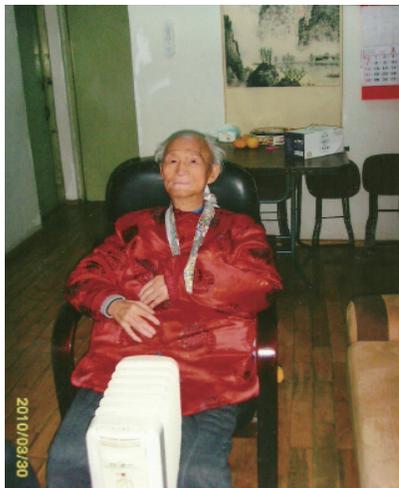
《中国右派知多少？》中提及的两位在世百岁老人之一的抗战英雄李温平，他的三位女儿和女婿以及外孙们在五月三日为他举办了九十九岁寿宴。席间女儿为他宣读了拙作《五七右派列传》第二卷第一编《修建滇缅公路的抗战英雄李温平》一文。老人听得热泪盈眶，最后流着泪说：“总算没有人忘记我”。事后田圻畅先生告诉我，他于三月底专程去北京拜访了李老，并摄下一组照片。田先生来香港时，与我一起同李老的大女儿李希露（郑州黄委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退休）通了电话。田先生原来同李希露是邻居，与李老家是世交。《五七右派列传》也是他寄给李老的。

我听后十分感动，原计划在本书完成后，下一步打算同田先生合作撰写他的传记。书名也想好了，暂定为《光风霁月—抗战英雄李温平百年沧桑》，已拟定写作大纲。听闻老人感染肺炎住院，我很焦急。决定立刻去北京，抢救老人的记忆。他的一生就是一页宝贵的历史呀。

我带着录音和摄像器材於五月十九日匆匆抵达北京，马上打电话给李希露教授。不料她咽唔着说，她父亲刚刚过世。前两天她见父亲病情好转，才返回郑州，听到噩耗，便立即赶赴北京料理丧事呢！

在《五七疑云》撰写过程中，陆续有右派老人离开人间。据我所知，除李温平老人外，至少还有另二位抗战英雄右派分子四川的汪岗和黄绍甫、原北京林学院学生极右分子苏州的李衍德、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党员极右分子徐洪慈、原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右派学生陈象哉。由于本人信息资源有限，在此期间一定还有许多我不知情的离世难友。中共暴政的亲历者和历史见证人愈来愈少了，我们那些幸存者的责任也更重大。

2010年7月10日



離世前不久的李温平老人



李温平博士雖是國家卓有貢獻的工程專家，但一直居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蓋的原國家建設部簡陋宿舍內——西直門內北順城街11號院2號樓201室。

附 錄

資料來源和參考書目

第一部分 資料來源

一，中共文件

县委书记以上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59）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

關於今后接收党员工作的意见（1958.11.7）

中共中央组织部

關於清除党内的右派份子决定汇编（1958-1960）第一至五卷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

關於地方民族主义份子摘帽问题的指示（1979.10.13）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關於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的说明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右及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简介

新疆建设兵团

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团籍、留党察看处

分的决定汇编

共青团中央组织部

二，采访记录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昆明、成都、重庆、苏州、南通、内蒙、兰州、杭州以及美、加、欧、澳等地采访笔记。

(1995-2010)

三，报刊杂志

- 北京日报 2004、12、7《理论周刊——文史》
2008、12、1《理论周刊——文史》
- 苹果日报 2007、9、16A18版
苹果日报 2009、9、22A18版
- 信报 2007、11、28副刊
- 报刊文摘 2004、12、29第四版
- 辽沈日报 2003、1、18
- 炎黄春秋 2006、11第18--19页
2008、7第26--31页
2009、2第73--76页，79--82页
- 往事微痕 2008、7--2010、3第2--44期
- 收获 1989、6第172-176页
- 开放 2007、6第40页
- 争鸣 2007、9第44--47页
- 粤海风 2005、9
- 观察 2010、5第52--58页
- 新华日报 1957、7--1958、8

四，地方誌

甘肃、宁夏、青海、云南地方誌

第二部分 參考書目

- | | |
|------------------|------------|
| 毛泽东选集 1-5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毛泽东文集 1-8 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宗凤鸣 记录 | 开放出版社 |
| 改革历程 赵紫阳 | 新世纪出版社 |
|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 龚育之中央编译出版社 |
| 七十年的经历 千家驹 | 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
| 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 叶永烈 | 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
| 沉重的 1957 叶永烈 | 香港明镜出版社 |
| 揭开历史的迷雾 叶永烈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一九五七年的血泪花 叶永烈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 反右派始末 上下 叶永烈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 离人泪 叶永烈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 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 戴 晴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储安平与《观察》 谢 泳 | 中国社会出版社 |

- 陈铭枢回忆录 陈铭枢 中国文史出版社
- 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 薛建华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与民主人士 卢之超 主编 华文出版社
- 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 1-4 彦奇 主编 华夏出版社
- 统战密章——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 胡治安 天地出版社
- 零八宪章 李晓蓉 张祖桦 主编 开放出版社
- 零八宪章与中国的改革 中国信息中心 劳改基金会
- 反右研究文集 劳改基金会 中国信息中心
- 鸣放——革命实录史 二二七反共革命联合会
当代出版社
- 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 二二七反共革命联合会
当代出版社
- 中国的反右运动 [英] 达斯 华夏文艺出版社
- 鸣放回忆 展望杂志编 自联出版社
- 阳谋 丁抒 开放出版社
- 五十年后重评反右 丁抒 田园书店
- 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 朱地
山西人民出版社
- 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 华民 明镜出版社
- 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 钱理群
牛津大学出版社
- 经历我的一九五七 和凤鸣 敦煌出版社
- 中国一九五七 尤凤伟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中国百名大右派 姚杉尔 潮华出版社
- 失态的季节 王蒙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王蒙自传三部曲：半生多事 王蒙 花城出版社

附录

- | | | |
|----------------|-------|------------|
| 五七右派列传 1-4 卷 | 申渊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沙坪茶场 | 汪孝直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梦幻春秋 | 上下 彭宜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回眸一笑 | 杨泽泉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我的母亲 | 孔令平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走过冰山 | 孙立勇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滚爬血腥路 | 万耀球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红狗 | 齐家贞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陈毅是好同志吗 | 武宜三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雨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纪实 | 吴永良 |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
| 天地良心三部曲 | 申渊 | 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 |
| 北京桑拿天 | 申渊 | 亚洲艺术出版有限公司 |
| 夹边沟纪事 | 杨显惠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 告别夹边沟 | 杨显惠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 风雪夹边沟 | 赵旭 | 作家出版社 |
| 天劫 | 赵旭 | 甘肃文化出版社 |
|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 | 赵旭 | 劳改基金会 |
| 大饥饿 | 赵旭 | 作家出版社 |
| 熙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 | 赵旭 | 兰州大学出版社 |
| 血泪惊魂夹边沟 | 提钟政 | 兰州人民出版社 |
|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 刑国义 | 兰州大学出版社 |
| 乌泥湖年谱 | 方方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天府悲歌 | 李才义 | 国际港澳出版社 |
| 二十一年 | | 作家出版社 |
| 北大荒日记 | 曾延庆 | 作家出版社 |
| 大镇压——反革命归案伏法纪实 | 白希 | 金城出版社 |

- 曲折发展的岁月 丛进 河南人民出版社
反右派斗争始末 上下 朱正 明报出版社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 朱正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 朱正 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1957新湖南报 朱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朱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往事並不如烟 章诒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
顺长江，水留残月 章诒和 牛津出版社
五十年无祭而祭 章诒和 星克尔出版社
伶人往事 章诒和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章诒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记忆—往事未付红尘 章立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君子之交 章立凡 牛津出版社
流放与直言 黎焕颐 百花文艺出版社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温济泽自述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大1957 张元勋 明镜出版社
百年人生 林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刻骨铭心的爱 林希 中国工人出版社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 戴煌 中央编译出版社
林昭——不再被遗忘 许觉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昭之死 傅国涌 开放出版社
忆林昭 甘粹 劳改基金会
昨夜雨骤风狂 吴弘达 劳改基金会
苦难的历程 文彻赫恩 劳改基金会
红尘白浪 叶少华 劳改基金会

附录

- | | | |
|---------------|------------|------------|
| 赤海漂零记 | 曾石荣 | 劳改基金会 |
| 阳谋下的人生 | 胡显中 | 劳改基金会 |
| 沉思录 | 杨子立 | 劳改基金会 |
| 最后的地主 | 廖亦武 | 劳改基金会 |
| 中国冤案录 | 上下 廖亦武 | 劳改基金会 |
| 一生说真话 | 江棋生 | 劳改基金会 |
| 劳动教养与留场就业 | 吴弘达 | 劳改基金会 |
| 劳改手册 | | 劳改基金会 |
| 劳改——中国特色的罪与罚 | | 劳改基金会 |
| 燕园风情铸人情 | 王书瑶 | 劳改基金会 |
| 盛世幽明 | 孙民 | 劳改基金会 |
| 梦断未名湖 | 陈奉孝 | 劳改基金会 |
|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 | 徐庆全 | 中文大学出版社 |
| 人生百味话沧桑 | 郝天魁 | 香港天马出版社 |
| 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 | 茆家升 | 远方出版社 |
| 六月雪 | 牛汉 邓九 | 经济日报社出版社 |
| 荆棘路 | 牛汉 邓九 | 经济日报社出版社 |
| 原上草 | 牛汉 邓九 | 经济日报社出版社 |
| 草地集 | 史若平 |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
| 生死沉浮 | 叶思九 | 华夏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 鸦雀有声 | 尚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
| 暗潮 | 赵明义 | 中华文化出版社 |
| 沪上法制梦 | 何济翔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杨兆龙法学文选 | 杨兆龙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 上中下 白石 冯以平 | 作家出版社 |

- 追寻黄万里 赵诚 书海出版社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诚 长江文艺出版社
风雨人生路 刘文忠 崇适文化出版社
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 刘文忠 崇适文化出版社
六十余年家与国 张成觉 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在那遥远的地方 张成觉 上海书局有限公司
笔底风云 纪卓立 富达出版有限公司
时代风雷响笔端 张成觉 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当秀才遇着秀才 张成觉 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追寻 李蕴晖 甘肃人民出版社
蒙恩历程 李景沆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禅机 胡平 广东旅游出版社
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 邵燕祥 牛津出版社
沉船 邵燕祥 上海远东出版社
找灵魂 邵燕祥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不再是我——一个右派的精神死亡档案 杜高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纸沧凉——杜高档案 杜高 中央文献出版社
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 潘大逵 成都出版社
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年 郭罗基 明报出版社
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龙卷风 兰翎 上海远东出版社
往事並不苍老 赵熙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 李新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走向混沌三部曲 丛维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附录

- 虽九死其犹不悔 叶笃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和民主同盟 叶笃义 中国文史出版社
徐铸成回忆录 徐铸成 三联书店
狰狞岁月愁 高兆忠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出版社
负笈燕园 1953-1957 风雨北大 马嘶 群言出版社
难得清醒 李壮 人民日报出版社
风雨平生——萧干口述自传 萧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树与林同在 刘心武 山东画报出版社
往事如烟 梅溪 长江文艺出版社
往事杂忆 朱伯康 复旦大学出版社
逝者如斯 王觉非 中国青年出版社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大学生与盲流 章文岳 中国文联出版社
真相 刘秀臣 中国文联出版社
劫灰絮语 陈斯骏 自费出版
劫海风波 吴容甫 自费出版
人、鬼、人 刘皓宇 自费出版
品味人生——反右蒙难五十年 王玉林 自费出版
只有云雀知道你 陈瑞晴 自费出版
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 自费出版
历史伤口——二十年寻访右派实录 李泥 自费出版
重新站起来 宋家模 自费出版
郭堡，你可曾记得 周永熙 自费出版
我们曾相逢在郭堡 影集篇 自费出版
风波万里——铁流诗选 铁流 自费出版
走错房间的右派 铁流 夏菲尔出版社

- 风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纪实 吴永良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 张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舒芜口述自传 舒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回首残阳已含山 殷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赤子岭 陈炳南 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
 寻找家园 高尔泰 花城出版社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陈为人 溪流出版社
 沉思集 倪艮山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青春、北大 胡伯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相依 王火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 武汉出版社
 聂绀弩刑事档案 寓真 明报出版社
 在阳谋的祭坛上—天山深处一个小右派的苦难生涯
 朱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北行小语 曹聚仁 三联出版社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 袁冬林 大象出版社
 朱镕基传——从反党右派到邓小平接班人
 高新 何频 新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悔余日录 冯亦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滴泪 巫宁坤 允晨文化出版社
 暴风雨中一羽毛 巫一毛 明报出版社
 《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 姚小平 见二闲堂
 林希翎自选集 林希翎 顺景出版社
 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 中国电影出版社
 思痛录 韦君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附录

- 刘宾雁纪念集 黄河清 北明 明镜出版社
炼狱人生 张强华 三峡出版社
左右春秋 陆福清 天马出版社
右派情纵 周素子 田园书店
想念启功 钟少华 新世界出版社
姚雪垠传 许建辉 湖北人民出版社
储安平文集 储安平 东方出版社
冲出劳改营 徐洪慈 文化艺术出版社
沙文汉与陈修良 泰栋 亚平 宁波出版社
百年缱绻 沙尚之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爱无疆—沙文汉陈修良百年追思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
风雨七十年 周克 文汇出版社
菊海竞渡—李万春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永远在初恋 张志才 陈桂英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苦太阳 庞瑞琳 贾凡 中国戏剧出版社
蓦然回首 艾以 香港语丝出版社
一个老记者的沉重脚步 徐行 香港语丝出版社
邓小平与毛泽东 冯治军 堂福图书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历史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李辉 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文革受难者 王友琴 开放出版社
共产中国五十年 金钟 主编 开放出版社
第五纵队—中共情治帝国的变革 何雨文 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中国秘密战 郝在今 作家出版社
国共间谍战七十年 郑义编 夏菲尔出版社

-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戎 Holliday 开放出版社
白崇禧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 姚兰 邓群 中共党史出版社
战争状态 胡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法西斯主义 [保] Zhelyu Zhelev 台湾民主基金会
中共党内的自由主义——从陈独秀到李慎之
冯崇义 明镜出版社
国共伪造历史 芦迪 明镜出版社
正在进行的谍战 闻东平 明镜出版社
命运的祭坛 上下 魏光鄴 作家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上下 杨克林 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